5061/5600.1

Zhōngguó Yǔwén

中國語文

总第68期

APR 16 19[illegibl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BOYLSTON HALL
CAMBRIDGE, MASS., U.S.A.

2

1958

1958年2月号(总第68期)目录

大家来推行汉語拼音方案(社論) ……(51)
汉語拼音方案和語言教育 ……張志公(52)
汉語拼音方案与語言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高名凱(54)
应該讓拼音文字的試驗和普通話的推广齐头并进 ……史存直(57)
汉語拼音方案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郑懿(59)
努力發揮拼音字母对推广普通話和識字教育的作用 ……周定一(60)
曲艺演員們热烈拥护汉語拼音方案 ……白鳳鳴(62)

苏联語言学的發展道路(苏联《語言学問題》社論) ……(63)
介紹《語言学結構主义和方言地理学研究》 ……岑麒祥(71)
关于設計和制造信息机器的会議 ……苏联И·梅里楚克(75)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音档 ……吳宗济(76)
近年来朝鮮語言学的發展情况 ……朝鮮 宋瑞龙(78)
日本最近的汉語研究动态 ……日本 香坂順一(80)

閩南方言的虛字眼"在、着、里" ……黃丁华(81)
关于連动式和兼語式的取消論 ……唐啓运(84)
从动謂句的动詞重复談起 ……赵荣普(85)
"然"和"气"不是構詞标志 ……林文金(86)
"上、下"等的趋向动詞性 ……陈迪明(87)

怎样处理声調在音位系統中的地位問題 ……周耀文(88)

現代汉語中从日語借来的詞彙 ……王立达(90)
談現代汉語中的"日語詞彙" ……郑奠(95)

我們应該建立"文字理論"这門科学 ……繆錦安(96)
略談文字的簡化和繁化 ……明之(98)

动态
湖北省大力开展宣傳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話的工作 ……向陽(56)

啓事： 1)"語文短評"自1958年起每逢單月刊出；2)本期稿挤，"書刊評介"、"問題解答"暫停；3)为便于查閱合訂本，自1958年起，本刊頁碼逐期連續順排，每年自成起訖。 編輯部啓

社論　大家来推行汉語拼音方案

汉語拼音方案已經为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議批准了，这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一个国家制定的汉語拼音方案了。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設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因为这个方案的推行將使新的一代和人民大众更快地掌握祖国的文字，加速普通話的推广，消除方言間的隔閡，創造使用文字和符号的种种便利条件。我們大家都有責任推行这个方案。語文工作者的責任特別重大：凡是已經能够使用这个方案的，要尽可能騰出时間教会別人；还沒有学过的，要尽快学会使用这个方案。

首先，我們要結合着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推行汉語拼音方案，特別是給汉字注音并作为推广普通話的正音工具。第一，要給小学課本注上拼音字母；第二，要編印用拼音字母注音的兒童和少年讀物；第三，要給北方話地区的扫盲課本注上拼音字母；第四，要編印用拼音字母注音的通俗讀物，供扫盲后使用；第五，要給字典、詞典注上拼音字母；第六，今后訓練普通話教师要一律使用拼音字母；第七，今后教学普通話要一律使用拼音字母；第八，要編印用拼音字母拼写的普通話讀物；第九，要用拼音字母来表达当地語音和北京語音的对应規律，并根据这些規律編写給当地人用的普通話手册。

其次，我們要用汉語拼音方案作为少数民族創造文字或者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关于这个問題，国务院全体会議第六十三次会議曾經通过了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五項原則，明确地規定："少数民族創制文字应該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原有文字进行改革，采用新的字母系統的时候，也应該尽可能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少数民族語言和汉語相同或者相近的音，尽可能用汉語拼音方案里相当的字母表示。"

又其次，在業务上和日常生活里，我們要尽量使用拼音字母来編索引，編卡片，編排研究資料，編列名單、住址、电話号碼，等等。

最后，我們要用这个方案来研究和实驗拼音文字，如詞兒連写、詞的定型化，等等。

上面已經說过，我們語文工作者有特別重大的責任来推行汉語拼音方案。結合着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語文工作者要努力在兒童、青少年和工、农群众中傳播拼音字母，并为他們編写字母課本和注音讀物。这項工作可以通过当地的报刊和出版社来进行，特別要結合着兒童和青少年的課外活动，以及工厂、矿山和合作社的文化活动来进行。

如何使拼音字母在扫盲中發揮作用，是一个極重要的問題。扫盲必須結合着当地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在中、小学里教学拼音字母和在扫盲中推行拼音字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时間和生活情况的不同是十分明显的。最主要的差别是語音的要求。在目前情况下，我們不能普遍地要求用普通話注音的課本来扫盲。在北方地区是可以的，只要我們在語音方面不作严格的要求。但是在吳語、閩語、粤語等地区，用普通話注音的課本来扫盲，会使进度慢。因此，如何使拼音字母适应当地語音来扫盲，是一个应該加以研究的問題。

另外一个应該加以研究的問題，是用拼音字母拼写詞兒和句子来扫盲。我們可以先在北方話地区做小規模的試驗，也就是試点工作，然后总結經驗加以推广。我們建議扫盲教师和其他語文工作者进行以上的研究和試驗。

語文工作者还要进行拼音文字的研究和試驗工作。首先，我們要研究詞兒連写問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們已經积累了一些經驗。我們要在已有經驗的基础上，繼續进行研究。詞兒連写的研究就是構詞法的研究。要解决詞兒連写問題，必須从語法方面研究汉語構詞的規律，并根据这些規律来确定詞的連写。由于汉語構詞法的灵活性很大，詞的連写也要灵活。

其次，我們要研究詞的定型化問題，包括如何区别不同声調的詞和同声調的詞等問題。国語罗馬字用字母的变換来区别声調，但是对同声調的詞不加以区别。拉丁化新文字不标注声調，而用特殊拼法来区别極少数的詞。我們可以在这兩种办法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比方說，我們可以研究能否使国語罗馬字的办法簡單化；能否在文字上不标声調的原則下，把特殊拼法的范圍扩大来区别容易混淆的詞。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个国家制定的汉語拼音方案了，这就为文字改革的逐步实現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讓我們語文工作者动員起来，全力推行汉語拼音方案，在今年生产大躍进的鼓舞下，也来一个文字改革的大躍进，为完成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并为將来文字的拼音化准备必要的条件而奋斗！

汉語拼音方案和語言教育

張志公

語言教育在普通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語言是交际的工具，兒童、少年、青年無論学習哪一門科学知識或者劳动生产的知識，都要用語言作为媒介，因此，語言能力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学習的效果。語言也是思維的工具。思維能力的發展和語言能力的發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發展学生的思維能力是普通教育的一項重要的任务。

向学生进行語言教育有好些方面的工作要做，例如詞汇教学，語法教学等等。但是，一件根本的工作是要学生知道語言是怎么回事。所謂“語言”，指的是有声語言，它的物質材料是語音。那么，要学生知道語言是怎么回事，要学生能够很好地学習語言，就必須讓学生懂得語音。

語音是人的發音器官發出来的，發音器官長在人的身上，从小就用，毫不陌生。照道理說，語音知識应該是不难学的。可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語音知識在我国很不普及，就連知識分子，也常常視語音的学問为畏途。《鏡花緣》上描写那兩位自命“天朝”学者的多九公和唐敖被黑女考問音韵考得出了丑，正表示小說的作者諷刺当时的一般讀書人不懂音韵。其实，就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語音知識普及的情况跟别的学科比起来，还是相当落后。

語音知識的不普及，对于語言教育工作是很不利的。不理会語音，只在詞汇和語法方面兜圈子，許多問題就不容易得到解决，甚至于鑽到岔路上去；而目前，有些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行語言教育工作的。还需要指出，今天說語言教育，跟推广普通話和促进汉語規范化有密切的关系。这样，語音教学在語言教育中就更有重要的意义。

語音知識不普及的原因有种种，其中之一是以往缺少一套合用的注音工具。所謂合用，指的兩个方面。一方面要比較科学，另一方面还要比較通俗。比較科学，才能正确地描写一种語言的語音結構，大家使用这样一套工具使用慣了，自然而然地懂得了發音和拼音的一般道理；比較通俗，才能便于广大的群众使用，不至于成为少数人專用的、高深莫测的东西。古人用直音或讀若的办法注音，可能比較通俗，但是显然是不科学的。后来用反切，比直音、讀若科学一点，但是仍旧不够科学，因为只能分析到声母和韵母，声母、韵母本身的結構就不管了；而另一方面，可以說很不通俗，所以多九公在受了黑女的教訓之后，跑到另一处，听見白字先生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念成“切吾切以反人之切”就吓得不敢进去了。再后来用注音字母，在科学和通俗兩方面都前进了一大步，近若干年来語音知識略微普及了一些，可以說得力于注音字母者不少。但是，注音字母在兩方面都还有不够的地方。它基本上仍旧是只分析到声母和韵母的，而对韵母的描写又有些牽强的地方；在写法上，跟汉字大体上一样，不像字母符号，写起来不簡便。如果單从給汉字注音这一个角度来考虑，注音字母的缺点可以說还不显得太严重。要是考虑到通过給汉字注音来普及語音知識，从而提高語言教育的質量，那注音字母就远远地不够了。（这里还沒說到少数民族制定文字和学習汉語的需要，譯写科学技术的术語的需要，实驗汉字进一步改革的需要，等等。）

汉語拼音方案恰当地解决了这个問題。方案用的是拉丁字母，这套字母学習起来很容易。我們只要想一想10个阿拉伯数碼，兒童們学習起来有多容易，就不难想到这26个拉丁字母也沒有什么难处。从科学性方面看，那显然比注音字母好得多了。ㄢ—an，ㄣ—en这种区别，从語言教育的角度来考虑，是不能小視的。甲兒童只知道“彈”是一个囫圇的音节，乙兒童知道这个音节是由一个声母ㄊ和一个韵母ㄢ拼成的，丙兒童知道这个韵母是由一个元音a和一个輔音n合成的。我們不能不注意到这三个兒童对于tan这个語言現象的認識能力有差别，而这个差别不能說跟他們对于客观事物的一般的分析理解能力無关。在語言教学的具体工作中，拼音方案的用处更显著。以前使用注音字母的时候，教給学生“来啊”念lai-ya，“天啊”念“tian-na”很費事，小孩兒們总不明白，为什么ㄌㄞ Y会念出来ㄧY，ㄊㄧㄢ Y会念出来ㄋY。——不要以为这个困难不大。作家的笔下就有写成“来哪！”“天哇！”的例子。

如果我們設想一下，几年之后，我們的小学学生，中学学生，以及初学文化的成年人，都学会了拼音字母，学会了拼音，对于汉語普通話的語音有了基本的了解，我們就不难想見，那时的語言教育將会有多么显著的提高！

为了提高語言教育的質量，除去需要普及語音知識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改进識字教学工作，而

識字教学是和語音教学有密切关系的。

进行語言教育，不能不借重記录語言的工具——文字。我們的方塊汉字，学習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們的小学語文課一开始要用相当長的一段时間进行識字教学。方塊汉字之所以难学，根本的原因是它不用字母表示讀音，因此必須一个一个地学，一个一个地記。至于笔画多，写着难，那恐怕还在其次。这样，識字教学用的时間多少，教学質量的高低，首先决定于怎样教学生記住字的念法这一步工作。因为，只有当学生会念那些字的时候，書面上的字才跟口头上的語言联系起来，而文字必須跟語言联系起来才能懂得透徹，記得眞切。要学生学会字的念法，而且学得好，学得方便，就必須有合用的注音工具，單靠教师耳提面命是不行的。汉語拼音方案旣然是比較合用的注音工具，它对改进識字教学当然有很大的作用。識字教学的質量得到提高，就为改进語言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語言教育的角度考慮，建立詞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語言的最小的自由运用單位是詞。要学習語言，必須学習詞，学它的意义和用法，学它的語法变化，学它怎样跟别的詞組織成句。方塊汉字和以往为汉字注音的办法(包括注音字母在內)，对于建立詞的观点都有不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一般中、小学生对于"詞"这个观念还是相当模胡的。当然，要解决这个問題，必須从好些方面进行工作，單靠注音工具是不行的。但是，汉語拼音方案考虑到了詞的連写問題，規定了一些拼写方式，例如隔音符号的运用，y w 的运用等，这就为詞的教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小学生学会了拼音字母，学会了一些汉字之后，教师就可以运用拼音字母来拼注生詞的念法，不再單独注字音，这样就会在閱讀教学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建立了詞的观念。同时，学生总是一个詞一个詞地学習，就更容易把書面上的文字跟实际語言联系起来，掌握詞的用法和变化，这比長时間地学習單个的字，效果一定会好得多的。

从上述的几个方面来看，汉語拼音方案的推行对于語言教育的發展將有很大的推进作用，而語言教育的發展又將为普通教育的改进打下良好的基础。摆在語言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認眞地学習方案，掌握它的精神，进而研究在各級各类学校的語文教学中具体运用的原則、步驟和方法，使它很好地为語言教育服务，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設事業服务。

(上接89頁)

仪器測驗)的正确性以前，我还是坚持'音位的归納是建筑在严密的有系統的語音分析的基础上"的观点的。至于如尹仲賢先生所說："…在处理音位时，只能把它(声調)看作是識别一个音位諸变体的条件之一。这样处理是符合音位理解的。它在音位系統中的地位仅是作为識别音位变体的一种条件。"①我們認为这种含糊其詞，不举出具体例子来証明的說法，是很难使人想得通的。尹先生說"声調是識别一个音位諸变体的条件之一"，究竟声調在汉語(如北京話)中是屬于哪一个音位呢？这个音位的声調变体条件是什么呢？怎样識别呢？如果尹先生还不能答复这几个問題，那我們便很有理由說：尹先生的"这样处理是符合音位理論的"的結論，尙缺乏足够的根据。尹先生这种把声調的音位功能(結合在元音上)貶低为音位变体的观点，实質上就是抹煞声調在汉藏語系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排除声調在音位系統中应有的地位的作法。

第三种看法的論据是：

1. 声調有区分音位功能，"長短"旣然可以区分音位(如我們說長元音、短元音是不同音位)，構成声調的"高低"当然也可以区分音位。

2. 声調不能單独發音，主要跟元音結合在一起才能發音，虽然它可以影响輔音的發音，和个别的輔音有关系，但是本質上还是和元音結合在一起的。②

我完全同意这种看法。1955年，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語言学顧問謝尔久琴柯教授在講課和討論汉藏語系語言問題时候，提出"声調是不能憑空發出来的，必須憑借元音或濁輔音的物質基础才能發音，而主要是憑借元音"③ 的新論点，并指出把声調当作独立音位的錯誤看法。其后，傅懋勣先生写了一篇«拼音汉字中的声調問題»，④ 詳尽地引証"声調是結合在元音上的，是区分元音音位的成分"的論点，(我同意这种論点，在本文上面評論第一第二种論点时，实际上我已补充了这种看法，所以这里不再贅談。) 虽然傅先生的提法目前还不能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意，但是因为他眞正接触到声調的实質，能够应用音位原理把"音高"归納到音位系統中去，所以引起許多語言学者对"声調的音位問題"的注意。我認为今后大家对此問題还需要更深入地展开討論。

---

① 見«中国語文»1957年6月号«汉語的声調在音位系統中的地位»。

② 見«語言調查常識»第3講，69頁。

③ 見«中国語文»1955年9月号。

④ 見«中国語文»1955年9月号。

汉語拼音方案与語言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

高名凱

作为語言科学的教师和科学研究工作者，我热烈的欢迎汉語拼音方案的公布。

这几年来，我在語言科学的教学工作过程中，常常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尽管我想尽了方法来使学生对語言科学發生兴趣，然而总有一部分学生对語言科学仿佛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厭惡，厭惡的結果，就是心里对語言科学的学習根本上就加以拒絕，自然也就談不到有什么領会和心得了。一般的情形，講授語言和社会的关系时，学生們还覚得津津有味，但是一談到語言的內部結構，他們就会立刻蹙起眉头，漸漸的反感起来。講授別的科学时，举例是理論結合实际，学生听来容易了解，然而在講授語言科学的时候，特別是講授語音学的时候，举例往往反而会引起批評，反而会使学生們瞪着眼睛，連声不絕的說："不懂！"学生們甚至于把語言学說成"天書"，忍耐一些的人悶在肚子里不好受，急躁一些的人就干脆不听了。据我的了解，这情形是全国性的，不只是一个地方如此。

按理說，語言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人們無时無刻不在运用的交际工具，沒有一个正常的人可以不会說話而能愉快的生活在社会当中。除了啞巴之外，沒有人不懂得說話，不掌握語言的材料，不会發音。然而講到語音的时候，甚至于像"P是双唇閉塞音，双唇閉塞音的意思就是說，这个音是由于上下唇的緊閉或緊閉之后由口腔中的空气冲破这閉塞而發成的声音"之类的命題也会引起学生們的搖头，說是不懂。如果你像舞台上的演員似的当众表演一番，閉住双唇，再由口腔中的空气冲破这閉塞，發出P音，讓学生們看，他們仍然搖着头，說是不能体会。如果你請学生們自己試發一下他們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在發的这个P音，他們的熟練的發音动作竟至于反而失去了机能，反而在理論的指导之下，發不出这个音来。至于講到語音的变化，必須举出一兩个外国語的事例时，学生們更是見而生畏，說是不懂外国語，理論無法联系实际。其实，講解語音变化，目的只在說明語音的演变規律，举出外国語的例子也只是为的汉語里沒有这种現象，不能不如此，然而具体的例子却反而使学生見而生畏，当教师的人也就無法設想了。这就仿佛講到繪画的透景法，拿出苏联繪画的实例来說明，竟至于因为它是苏联的繪画作品而無法使学生了解什么是透景法似的。到了这个地步，語言学的教学可以說是走到了絕路。

这情形說起来，仿佛不可理解，其实不然。学生們之所以如此厭惡語言科学，害怕語言科学，原因在于他們沒有接触过語言科学，缺乏一般的語言学常識，沒有必要的基础，乍听起来心里首先就覚得"不对头"，漸漸的就覚得厭惡，一旦覚得厭惡，你就越講得起勁，他們心里就越覚得"难受"，結果什么話也听不进去，于是說他們的理解能力不允許他們領会最簡單的命題，例如"塞擦音是一个塞音和一个擦音結合在一起的語音結構"，"音質是一个音所特有的而不同于其他的音的本質特点"，"前元音是發音区域在口腔前部的元音"之类的命題。

語言既是人們的交际工具，又是記录社会文化的工具，又是人們交流思想，交換意見，傳授知識接受知識的工具。沒有語言，科学知識的發展，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各国人民都以語言的教学作为国民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尽管語言科学只是十九世紀初年形成的，但是各国人民对于語言知識的講授和学習則是由来已久，因为全面的掌握語言，了解語言，运用語言，是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知識分子所必須做到的。不通曉語言，既不能接受古代的文化遺产，也不能接受近代的科学知識，更不能將自己的科学知識对別人解說，因而阻碍了知識的傳布。我国古代的知識分子也都是以語言文字的訓練作为学習其他知識的先决条件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社会的原因和語言科学本身的原因，在解放前的一段时期里，一般知識分子或多或少地認为語言文字只是一种"小学"，加以輕視，社会上的風气也把研究人們日常生活中最常运用的交际工具（語言）的語言科学看成神秘的"把戏"，因此，一般人就对語言科学生疏起来了。这种历史的后果就使得今天的一部分学生，無論是中学生或是大学生，缺乏学習語言科学的信念，不覚得有学習語言科学的必要，缺乏語言科学的基本常識，跟語言科学缺乏必要的接触。在他們看来，語言科学是"毫無用处"的东西，是"無足輕重"的东西"，是"不必学"的东西，同时又是"神秘"的、"高不可攀"的东西，总之，"討人厭"的东西。

我們暫且不論社会的原因，在語言科学本身的原因之中，过去缺乏一套合适的标音符号（拼音方案）显然是这种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壳，而語音又是語言的物質部分，不能掌握語音，就不能掌握語言，不能全面而正确的掌握語音，就不能

全面而正确的掌握語言，这是理所当然，無須多說的。語言的学習和傳授不能不注意語音的傳授也是必然的邏輯結論。然而，因为我国过去缺乏一套合适的語音符号，語音的教学竟至于成为語言教学中的末流，不被重視，就是重視也苦于無計可施，而一般人因之也就缺乏語音学的基本知識。我国古人不是不注重語音的学習和傳授，我国的古代学者也曾發揮智慧，創造过許多"語音符号"，但是，不幸的是，后人沒有繼續他們的工作，沒有在先人所奠定的基础上加以發揚光大，因之，我們原有的一些"語音符号"用起来并不合于理想，而运用的困难也就使得人們在心理上把它放弃了。我們古代的学者所發明的"讀若"、"反切"等都是語音符号之一种。这些符号在当时曾經起过很大的作用，并且用起来，也比較合适。然而时过境迁，这些"語音符号"就产生了許多困难，久之，就漸漸的失去了它們的作用。比方說，"讀若"是拿当时某一个字的讀音去作为另外一个字的讀音的符号，这在当时是比較合适的，然而由于历史的演变，这两个当时讀音相同的字后来可能讀音不一样，再根据这"讀若"来讀就不对头了，何况在运用"讀若"的时候，首先要先学会这个"語音符号"的讀法，而这門語音符号又可以由許多不同的字来代表，事先要学会許多字的讀法，才能拿它們来做桥梁去学会另外一个新字的讀法，再何况这些"讀若"也帶有过分"若"的成分，只指出大概相若的讀法，并不是指出正确的讀法。"反切"也曾經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后人沒有加以發揚光大，就漸漸的成为神秘的东西了。汉語音节的結構由代表声母的"切上"和代表韵母的"切下"来拚切，应当說是很合适的。但是，由于历史的發展，"反切"也产生了許多困难。代表同一个声母的"切上"字却有多至几十个者，代表同一个韵母的"切下"字也是同样的情形，再加上这些"字"后来由于历史的發展，可能各有各的不同讀法，再依照它来讀新字就会把字讀錯了。結果翻閱字典，依照"反切"来讀音，往往会和实际的語言事实不符。不符的情况，又由于各"切上字"和"切下字"不同發展而極复杂，这正是人們所以觉得"反切"是神秘的把戏的一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知道"切上字"和"切下字"的正确音值就非專家不可。这就使得从前的音韵学成为"高不可攀"的神秘的学科，而一般人的語言学習也就因之而缺乏一套合用的語音符号。影响所及，語音学的常識和語音学的訓練事实上已不是社会上一般人所能掌握的。因为对于語音学的常識一無所知，对于語音学的訓練几等于零，现在到高等学校里来学習語言学，特别是与語言学各部門都有联系的語音学，就觉得是"天書"，难于接受。由于一时的困难，就产生了厭惡的心理，既对它生了反感，無論如何也都听不进去，語言学的教学工作于是就不能不陷入困难的地步。

当然我們也曾經發明过国語注音字母，也曾用国語注音字母来进行过語言教学。国語注音字母也曾起过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国語注音字母本身还存在着某些音理上的缺点，又由于国語注音字母能标少数的音，不能用来进行較精細的科学研究，写起来也有困难，不足以作为一般語音学教学的語音符号，因之还沒有被社会普遍采用，也沒有能够使一般人有足够的語音学常識，一般人对于語音学的認識也沒有因此而提高到足够的水平。所以，語音学并不因此而成为一般知識分子的应有常識。

汉語拼音方案的公布首先就給我国社会一个刺激，使我国全体人民了解語音学的知識是如何的重要，打破了多年来語文教学方面輕視語音訓練的思想。这方案是根据现代的語音学原理，以世界各国人民所長久运用的拉丁字母为基础制定的，字母数目旣不多，拚切起来又可以正确的代表語言中的詞，每一个字母都有一定的音值，沒有用許多符号来代表同一个音的复杂情形，并且和較精細的科学研究所运用的国际音标以及其他許多語言的文字可以联系起来（国际音标也是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所以是合适的、方便的方案。这种方案学習起来極其容易。清华大学的一个理工科教授說他只花了两个鐘头的时間就学会了。当然这是因为他已学会英文字母，再学起同样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語拼音字母要容易些，但是如果沒有学过英文字母，学習起来也不至于太費事，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由于汉語拼音方案的运用，我国人民在很短的时期之內就可以普遍的具有必要的語音学常識，就可以不至于把原来極其平常的关于日常生活中所运用的語言声音的知識看做"高不可攀"的神秘的把戏，就可以不至于把語音学的学習視为畏途。只要大家熟悉了語音学的一般知識，在社会上养成对語音学的一般常識的重視的風气，那末，在高等学校里学習語音学就不至于發生什么困难。說句老实話，像"双唇閉塞音是由上下唇的緊閉或緊閉之后由口腔中的空气冲破閉塞而發成的声音"这一类的命题就像是"学生是学習的人"似的，都是三尺兒童听了也会了解的，然而竟至于使大学生們听了搖头，連声不絕的說"不懂"；这旣不是教学工作的毛病，也不是学生的智力有缺点，而是学生一向不了解語音学，缺乏学習信念而生的心理反作用的結果。有了汉語拼音方案的公布，社会上的風气有了更改，学生們对語音学有了一般的常識之后，这些困难就可以克服。所以，汉語拼音方案的公布对高等学校的語言科学的教学所要起的作用，將是很大的。

当然我們不是为着学習語言学而学習語言学。高

等学校之所以进行語言科学的教学工作，一来为的是培养語言的教学人材，使語言的訓練在我国的知識分子中成为“合乎規格”的，一来也是为更进一步地进行科学研究，使日常生活中的交际工具更有效的运用成为可能。語言科学的研究在任何国家都是文化教育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之一，然而过去在上面所說的社会風气之下，我們的語言科学几乎成了只有極少数人能够进行研究的所謂“冷門”，認識了一套国际音标（这原不是什么难事），在人們看来仿佛就是一个專家，这情形正是我国語言科学还沒有到达应有的水平的一个証据。所以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一般人对語言科学的漠視和莫名其妙，而这后者的原因之一也正是我們缺乏一套一般人都了解和运用的語音符号。像高等学校的初步的語言学功課进行起来都有極大的困难，更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自然也就受到了影响。現在，国务院既公布了一套汉語拼音方案，由于这一方案的普遍运用而生的一般人对語音学常識的关怀和爱好，語言科学的教学工作和語言科学的研究工作之將获得長足的进步和宏大的結果，是我們所能預料到的。

总之，汉語拼音方案的公布对我国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無疑的將起着極大的推动作用；只就其对高等学校語言科学的教学工作以及語言科学的研究工作来說，它的重大的推动作用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作为高等学校語言科学的教师和語言科学的研究人員，我只能够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庆祝这一方案的公布，来預祝我国高等学校的語言科学的教学工作和語言科学的研究工作的成功。

湖北省大力开展宣傳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話的工作

湖北省推广普通話工作委員会于1958年1月15日在省人民委員会召开了第二次工作会議。会上，委員們听取了省教育厅普通話推广处作的关于前一阶段推广普通話工作报告，并对湖北省1958年推广普通話工作計划要点进行討論。最后，会議通过了这个計划要点。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大力开展宣傳工作: 1)省市教育厅、局于1—2月間举行报告会、座談会，組織武汉地区各級学校教师及社会人士参加宣傳汉語拼音方案。2)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于3—4月間轉播“拼音字母教学广播講座”，号召全省教师收听学習，其他机关团体也可以組織所屬單位人員收听。3)以3月或4月为全省推广汉語拼音方案宣傳月，由省教育厅及有关部門通过报刊、电台、电影院、广播站、文化館站等进行宣傳，使广大群众了解汉語拼音方案的用途和推广普通話的重大意义，以便利普通話的推广和拼音字母今后的广泛推行。4)編印湖北人学習普通話的教材和拼音字母的資料。5) 1958年底評选推广普通話的先进單位和积極分子。

第二、积極訓練骨幹: 1)省教育厅1958年將举办兩期普通話語音講習班，培养推广普通話和汉語拼音方案的师資和幹部。2) 各市县教育科局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采取各种方式訓練教师及机关团体幹部。各市县应在1958年內把师范学校及附小的語文教师訓練完畢，并給每一所初中訓練一个或几个語文教师。(1959年爭取把各市县中小学語文教师全部訓練完畢。) 3)各师范学校，各有条件的中学，应爭取从1958年秋季起教学生学習汉語拼音字母（通过汉語課），师范生必須会說普通話。4) 小学一年級学生应該結合語文課学習普通話。5) 在各級学校，特別是师范、小学，师生在課堂內应尽可能說普通話。6) 剧場、电影院、碼头、車站等公共場所的广播、宣傳，应尽可能用普通話。

第三、繼續完成方言調查工作: 省教育厅組織省內各有关高等院校完成全部74个点的方言記音工作，并爭取在1958年年底編写好大部分县市的学話手册。

第四、总結經驗，匯报工作: 1) 各市县教育科局年底应总結推广普通話和宣傳汉語拼音方案工作报教育厅。2) 省教育厅于1959年初总結全省1958年推广普通話工作，报中央推广普通話工作委員会及教育部。

第五、加强領导，健全机構: 1)各市县教育科局应該有幹部專管或兼管推广普通話的工作; 各市县教育科局的教研室或負責学校教育的幹部，应該重視并切实指导所屬学校的普通話的教学。2) 省教育厅、市县教育科局应該把推广普通話的工作列入經常工作計划中，并結合視导，对所屬單位进行督促、檢查。3)各專区、省轄市、武汉市应該成立推广普通話工作委員会（有条件的县也可以成立），以便于全面开展工作。4)各学校及有条件的机关、团体，应該成立推广普通話小組，組織本單位人員学習拼音字母，說普通話。

这次会議，对湖北省的推广普通話工作和宣傳汉語拼音方案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預計本省的推广普通話工作，將会掀起新的高潮，宣傳和推行汉語拼音方案，將会得到群众的支持，順利地开展工作。（向　陽）

应該讓拼音文字的試驗和普通話的推广齐头並进

史存直

全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汉語拼音方案新草案的公布，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六亿人口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將間接影响到六亿人口的物質生活。無疑問的，它將为語法教学、为推广普通話和汉語規范化运动、为有关文化生活的某些技术工作帶来难以数計的利益。因此，我首先要对这件事表示我的欢欣喜悅的心情。

可是在欢欣喜悅之余，却也發現了一个問題，想提出来和大家商討一下。那就是拼音方案在目前有哪些主要用途的問題。吳玉章同志在"八大"会上的發言指出："拼音方案，在目前主要的用途，是为了給汉字拼音和用作教学普通話的工具，同时用以进行拼音文字的試驗工作。"①在吳玉章同志的意見中，显然是拿拼音文字的試驗工作当作拼音方案的主要用途之一，和帮助汉字教学、推广普通話并列的。可是在这次公布"汉語拼音方案草案"的时候，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所做的說明却說："这一套字母是帮助教学汉字和推广普通話的重要工具"，并沒有把拼音文字的試驗工作当作拼音方案的主要用途之一，拿来和帮助教学汉字、推广普通話并列，只在后面补了一句說："此外，語文工作者还可以用这套拼音字母研究和实驗中国文字的进一步改革"。②这已經是把拼音文字的試驗工作稍稍放松了一步。而在人民日报的社論中，拼音文字的試驗工作似乎就更不是当务之急了。人民日报的社論說："当然，研究語文的專家可以使用拼音字母来研究中国文字的进一步改革，但这是学术性的工作，不屬于政府当前所推行的文字改革工作的范圍，不应該也不会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混淆起来。"③在这里，"語文工作者"已經变成了"專家"，同时"研究和实驗"也变成了單純的"研究"，变成了"学术性"的工作，这几种文件的互相对照，足以証明各方面对于拼音方案在目前的主要用途是有不同理解的。如果不經过討論把大家的理解統一起来，則今后在工作中就很可能發生步調不一致的現象。因此我現在把这个問題提出来和大家討論。

且来說說我个人对这个問題的看法。誠然不錯，推广識字运动和推广普通話都是目前的当务之急。那么，拼音文字的試驗工作是不是目前的当务之急呢？我以为也是的。我这样講，也許有人会說我对于推广識字运动、推广普通話和拼音文字的試驗这几件事的緩急輕重理解得不够正确，其实，对識字运动和普通話用"推广"字样，对拼音文字用"試驗"字样，用詞不同已足以表示其間有緩急輕重之别，如果要認为在目前連試驗也还不是时候，那么拼音文字的推行要待到何年何月，眞要令人感覚遙遙無期了。

大家还应該想清，我們說推广識字运动和推广普通話运动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乃是就識字运动和推广普通話运动自身来考虑的，如果联系到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公布来考虑，問題又是另一个样子。例如推广識字运动，誠然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但如果專为識字运动，是否一定要制定拼音方案呢？就識字运动而論，注音字母大致已可以滿足需要，本無須再另制什么拼音方案。拼音方案的制定主要是为了另外兩个目的：便于推广普通話，并作拼音文字的試驗。因此，联系到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公布来看問題，拼音文字的試驗工作倒是必須提到的。

况且就实际情况来着想，推广普通話运动原是与拼音文字的試驗工作有相輔相成的关系，是割裂不开的。为什么呢？大家試想，推广普通話为什么要利用拼音方案呢？为什么不可以利用注音字母呢？那就是因为注音字母形体不便連写，所以只能为汉字注音，不能离开汉字而独立。既然不能离开汉字而独立，所以用它作为正音工具，就只好注在汉字旁边，于是人們的注意力就常常为汉字所吸引，容易联想到汉字的方音，这样就不能迅速的把方音糾正过来。要想提高正音練習的效果，最理想的办法是有一套能离开汉字而独立的拼音方案，这时候人們就可以集中全部注意力按照拼音方案所拼写的来發音，这样練習久了，就可以自然把方音去掉，学好普通話。但这种正音方法还必須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拼出来的东西要能讓練習的人看了懂得意思，看了不懂得意思就不能念出自然的語調，念不出自然的語調也就学不好普通話。要看了能懂得意思，就必須这套方案的拼法在各方面具备拼音文字条件(例如詞兒連写、大写規律、标点符号等)。旣具备了拼音文字的条件，又离开了汉字而独立，豈不是在用它作正音練習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同时做了拼音文字的試驗嗎？所以我說推广普通話运动原是与拼音文字的試驗工作有相輔相成的关系，是割裂不开的。

① 見《教师报》1956年10月1日。

② 見《解放日报》1957年12月11日。

③ 見《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1日。

不但从理論上来說，用拼音方案来推广普通話必然也同时做了拼音文字的試驗，而且如众所周知，拼音方案的制定本来就是为了推广普通話和作拼音文字的試驗。現在如果只談推广普通話，不談拼音文字的試驗，就很容易造成一些誤会，以为用拼音字母来学習普通話，只好像用注音字母那样附在汉字旁边，为汉字注音。如果是这样，效果也就难比注音字母好多少，又何必放弃現成的注音字母不用，要兴师动众特意另制定拼音方案呢？如果讓拼音方案脫离汉字而独立，那么，当学生發見这套东西可以代替汉字，用它来写信、記笔記的时候，教师是否要加以禁止，說这套东西还未到当作文字使用的时候，不能随便使用呢？我以为不但不应該禁止，反而要加以鼓励。又例如当目前农業合作化运动飞躍發展，农村中極需要用速成的方法訓練一批記賬員之类的人員，当然就要用拼音方案来对农民进行識字教育，这时候如果农民發見拼音方案可以代替汉字，用它来記賬或写別的东西，我們是否要加以阻止呢？不待說，也是不应該加以阻止的。想到这些具体情况，自然就可以了解，不讓拼音文字的試驗和普通話的推广齐头并进，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層也应該想到。推广普通話的目的何在呢？固然不錯，語言統一自身也是社会主义建設所必要的。但它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为改用拼音文字創造条件。可是仔細想来，推广普通話固然可以为改用拼音文字創造条件，可是反过来大力發动群众来做拼音文字的試驗也可以帮助普通話的推广。王力先生說："拼音文字的推行，对普通話的推广能起很大的作用。只有拼写慣了，然后記得最熟，久而久之，会使人們对普通話的語音系統更加清楚，运用起来也就更加熟練。"①我非常同意王力先生的这段話。

也許有人会向我說，拼音文字的試驗固然可以帮助普通話的推广，但在目前这样方言十分分歧的情况下还不宜立即开始，必須待普通話相当普及后才能进行。其实这样的想法也不过是"想当然"的。我从前也有过同样的想法，但教学的經驗使我的想法改变了。我認为，尽管目前方言十分分歧，拼音文字的試驗仍然可以进行。現在把我的教学經驗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在华东师大教現代汉語語音部分，去年同时教了三个大班，兩个普通班，一个函授班，一共六百个同学。我用汉語拼音方案原草案的代用式拼写了一些正音練習材料，因为我早就理解正音練習必須擺脫汉字的影响，所以这些材料都是脫离汉字而独立的。这样也就自然而然的做了拼音文字的試驗。当作拼音文字的試驗，一开始我并沒有把"字調"全部标出，只标了一部分，因为过去我虽在理論上認識到字調是汉語的語音構成要素之一，但心理上总感到每个音节都加調号，有損拼音文字的美观。在練習中同学向我提出了意見，要我把字調全部标出，我还向同学做解釋說，練習久了自能从上下文看出屬于哪一类字調，不必全部标出，要标的話，也可以在我領讀的时候自己加上去。但是提意見的同学愈来愈多了，我冷靜的思考了一下，覚得同学們的意見是对的，因为他們从正音观点出發，必然会要求教师标出全部字調。我接受了同学們的意見。到学期終了进行考試的时候，我在試題中安排了一道"朗讀題"，用拼音方案拼写了一段話，約80—100个音节，全部标調，要求同学讀出来，看他們正音功夫做得如何，是否能懂得題目的意思。(兩个普通班用口試，要求朗讀，函授班用笔試，只要求把所拼写的話譯成汉字。)結果每班只有一兩个人或兩三个人考得很坏，可以說不懂題目的意思，另外有一小部分人有个別錯誤；其余絕大多数的人都能把意思理解得不錯，虽然他們的發音未必合乎标准。在这里要附帶說明的是：1)大多数同学的普通話基础并不好，他們多半是江浙人，其次是福建人，此外安徽、山东、广东等各地人都有。2)作正音練習的时間并不多，一学期中只用了二十几小时做正音練習。而課外練習則由于同学們对普通話的学習不够重視，所以多半未做。函授班的練習更少。3)領导練習的方法还有缺点，例如沒有从一开始就把字調全部标出，也影响了練習的效果。考虑到这些情况，上面所說的結果就格外值得注意。

自从有了这次經驗之后，我就改变了我对于1)拼音文字是否要标調、2)拼音文字是否能立即推行这兩个問題的看法。

在过去，我主張字調不必全标出，只在必要的时候才标出，凡是靠上下文可以看懂的地方可以不标。現在我的看法不同了。我認为，在目前，旣然是以推广普通話为主，拼音文字的試驗是附帶的，那么就应該把字調全部标出，等到普通話相当普及，大多数人使用拼音方案使用慣了之后，再逐漸省去一部分調号。我希望大家注意，"逐漸省去一部分調号"和"只在必要的时候才标調号"是兩种不同的主張，不能相混。

在过去，我对于拼音文字是否能立即推行也有几分怀疑。怀疑的原因也不外是"方言分歧"和"同音字太多"。可是我現在認識到，如果把字調全部标出，这兩項疑虑就可以同时解决。标出字調，拼音讀物就可以一气順利讀下，不必再反复猜想，标出音标，讓普通話差的人經过短时期的学習也就能看懂。这样，拼音文字的試驗也就馬上可以开展，無須再等待什么了。

① 王力：《方言复杂能不能实行拼音文字？》，見《中国語文》1957年10月号。

汉語拼音方案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邓　懿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員会报告会上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提出目前文字改革方面有三大任务：在簡化汉字、推广普通話之外，他特別詳尽地提出了制定和推行汉語拼音方案的这一任务。汉語拼音方案的用处很多，周总理特別提出它"可以帮助外国人学習汉語，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現在想就这一点簡單地談一下我們在对外国留学生进行汉語教学的体驗。

由于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留学生的数目不但日益增加，国别也越来越多了。这些学生要学習汉語，首先要有一套注音的符号；因为我們尽管在課堂上有許多时間"口耳相傳"，这总不是最有效的办法。开始兩年，我們用威妥瑪式方案給教材注音，就是因为它是一种比較能为外国学生所接受的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但是，英国人拟的这套方案，到底不是我們自己的东西，有的地方不能很好地反映汉語語音特点。加之在国內不够通行，学生很难找到用这个方案的工具書，后来就改用注音字母了。

汉語拼音方案草案公布以来，大家对注音字母的优缺点談得很多了。总起来說，缺点最突出的有兩个：一个是本身的科学性不强。字母总数有三十七个之多，而其中一部分还不能作到一音一母，必須用其他單音字母来注音才能表示出它們的語音結構（例如ㄞ==ㄚㄧ、ㄢ=ㄚㄋ等）；就字形来看，很多字母彼此容易混淆（例如ㄑ和ㄥ、ㄋ和ㄗ、ㄢ和ㄞ等），这又是第二个缺点。在优点方面，有人喜欢它和汉字放在一起比較調和，因为它本身就是汉字或汉字的偏旁（見《語文学習》1958年1月号周有光《正确地認識汉語拼音方案的重大意义》）。对外国留学生說来，上述的缺点固然造成他們学習中的困难，上述的优点也造成他們学習中的困难。用汉字或汉字偏旁給汉字注音，我們看着調和的，正是他們看着別扭的地方；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我們从1953年起就迫切地希望快些产生一个新的拼音方案；所以在1956年2月文字改革委員会發表了汉語拼音方案草案（目前通称为原草案）以后，我們就無限兴奋地把它用于教材編写和課堂教学上了。

周总理报告中提到"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專修班采用了汉語拼音方案的第一个草案进行教学，很有成效，說明汉語拼音方案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越性，汉字和注音字母是远不能跟它相比的"。"第一个草案"就是原草案，它和汉字及注音字母相比是有很大的优越性的；但在这里我們更想說一下新草案对原草案的优越性——当然只限于我們在教学工作中突出地感到的几点。

第一是取消了原草案中的新造字母，現在把 ȥ ꞔ ş ŋ ɪ 改为 zh ch sh ng i 了。原草案的几个新造字母看起来固然眼生，写起来尤其困难。現在用双字母代表 ȥ ꞔ ş ŋ，虽然增長了詞形，但是为了看着清楚写着方便，仍然是值得的。更何况字母总数的减少也是很經济的呢？

第二是取消了斯拉夫字母 ч。这个字母与全套拉丁字母不調和，而且手写体和 u 或 y 相近；所以在去年春天文字改革委員会組織大家給修正方案投票的时候，我即提出把ㄐㄑㄒ改为 j q x 的意見。現在新草案的变动，連用斯拉夫字母的同学都会欢迎的。

第三是有关調号的修正。旧草案規定陽平調号是从右上向左下（ˊ），这是和語音的实际情况悖逆的；現在改为从左下向右上（ˊ），不但是順理成章，便于学生接受，而且非常形象化，也便于学生記忆。旧草案規定了陰、陽、上、去、輕五种調号，同时說明陰平可以不标；新草案則改为取消輕声符号，这也是一个改进。原来的輕声符号和 i 上的一点沒有分別，标起来也很容易把詞形弄得更乱；取消輕声調号而以沒有符号表示輕声，这是个干净俐落的办法。虽然我們为了教学的方便，在教材里还要用"。"来表示輕声，但这一修正無疑是明智的。

总而言之，我們是拥护这个新草案的。我們認为它在形式上采用了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便于外国留学生的接受；在作用上又服从了汉語的要求，給我們的教学帶来了許多方便。这是一套我們自己的字母，也是一套很得力的字母。

既然这个方案还是草案，也就是說它还有修改、补充的余地。因此，我願借此机会向文字改革委員会提出兩点希望：第一，新草案是制定出来了，下面就是周总理所提出的推行工作了。我們希望文字改革委員会这次能把宣傳、組織的工作提高一步，不要象上次一样地在原草案公布以后，热潮很快地凉下去，給人一种虎头蛇尾、有始無終的感覚。我們也深切地感到新草案的公布是"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周总理語），

（下轉99頁）

努力發揮拼音字母对推广普通話和識字教育的作用

周定一

方言之間的隔閡給社会主义的經济建設和文化建設都帶来某些不便，这是無可否認的事实。我国現在有了空前統一的政治局面和經济生活，这有利于語言的逐漸統一，也是無可怀疑的。但是，社会經济制度和政治狀态只可能影响語言集中或分散的方向和速度，語言却不可能随着社会制度或大或小的变革而起相应的平行的变化。我們不能不承認，汉語方言紛歧的現象仍然会長期存在。虽然我們可以訂出計划来推行普通話，却無法訂出計划来消灭方言；普通話所到之处并不等于方言絕迹之乡，方言和普通話在一定的时間和空間內是可以并存的。"我們推广普通話，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①我們得首先肯定这个原則，才能准确而有效地利用拼音字母去推广普通話和进行識字教育。

推广普通話和帮助識字是汉語拼音方案的主要任务，这兩个任务互相关联而又有所区别。推广普通話的任务是利用拼音字母編写普通話的讀物，使普通話的教学有書面上的依据，不光憑口耳相傳。帮助識字的任务是給汉字注上标准音，使"超方言"的汉字讀音統一，使表意的汉字安上表音的"拐棍"，旣便于"正音"，又便于克服識字的困难，縮短学習期限，加速扫除文盲。推行普通話也好，給汉字注音也好，拼音字母都是"以北京語音为标准"而执行任务，都能起到溝通方言之間的隔閡的作用。可以說，推广普通話同时是为造成与識字教育有利的語言环境，識字教育同时也是为打好便于推广普通話的教学基础，而一套用来拼写"标准音"的字母，就是把这兩項任务密切联系起来的桥梁。但是，对年龄較大的一般工农群众和职务上与使用語言無直接关系的干部并不要求学習普通話；識字教育的对象除了学龄兒童之外，却包括好几亿的文盲和半文盲。所以拼音字母服务的对象在推广普通話方面和識字教育方面不是完全等同的。而且，推广普通話着重在口耳的訓練，目的是要使各个方言区說得出或听得懂普通話的人日漸多起来，从而逐步加强語言統一的因素。学習普通話除了依靠注音讀物，还可以依靠不用讀物的口傳面授、听广播、看电影、看話剧等等方式。識字教育的目的却是普及文化，要使人人掌握文字工具，逐漸做到对文字的"四会"。識字教育虽然也可收溝通方言之效，却不是它惟一的目的，而且不是它的主要目的。目前大約只能在小学語文課本和北方話区域的扫盲課本上要求比較严格的标准音，在北方話区域之外的广大农村中进行扫除文盲工作則不宜死死抱住标准音不放，只要能加快扫盲的速度，在这些地区适当地采用方言音来配合标准音为汉字注音，也应該是切实可行的办法。

用拼音字母来推广普通話和进行識字教育，我們認为首先要做的事是傳授拼音知識，要使兒童和成年人都学会一点拼音的本領，才便于学習普通話和識字。死記字音的办法費力多而見效慢，却是傳統的办法，現在要改进它就得下定决心，堅持下去，才能轉移風气。过去在小学和扫盲工作中注音字母虽然起过注音的作用，撒过拼音知識的种子，可是影响不大，死記字音的办法还被看成是最正常的。学習普通話也只憑口耳相傳和無意識的感受，很少人能够或願意利用拼写普通話的讀物，而且事实上这样的讀物还很稀少，有的又編得不很高明或不切实用。据我所知，北京有許多小学生在一、二年級的时候学習注音字母的成績并不坏，看見几个字母拼在一起就能够馬上讀得出音，听見音就能用字母拼写出来，而且連声調都不会錯。然而这一套本領到了三、四年級就生疏下来了，原因是老师多半不再使用注音字母来教学生識字，开始要学生死記。有些学生就难免以馬馬虎虎的态度去对待課本上的生字，只求眼睛看得懂，却不一定每个字都讀得出音。况且老师教生字的时候旣然脫离了注音，就很难保証每个字音都合乎标准，尤其是那些"乡音"很重的老师。这样一来，学生的讀書音以至說話都受到了語音不純的影响。有位朋友說："小孩子一进学校反而說不好話了。"这話除了指語音方面的不純現象，还指因課本的詞句有缺憾，不够生动活潑，以致影响兒童的語言表达能力。

因此我們覚得，如果能够把傳授拼音知識列为拼音字母对推广普通話和識字教育开宗明义第一章的任务，是能够改进上述的缺点，轉移一下語言教育的風气的。我們要使学龄兒童和成年文盲首先很熟練地掌握这一套拼音字母的發音和基本拼写法，为識字和学習普通話打下良好的基础，以便进一步做到"見音唸字"和"据音拼写"的要求。而且这种要求必須貫徹到

① 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3日人民日报，2版。

推广普通話和小学語文課以及扫除文盲的整个教学过程中去，不要認为学会了几句普通話或認識了千多个汉字就可以过河撤桥，丢"拐棍"。

首先学会拼音还有許多好处。比如說，可以系統地了解这套拼音字母所拼写的普通話語音：知道哪些音是自己的方音里有的，哪些是沒有的；哪些只是与方音近似，要注意区别；自己哪些方音通普話里沒有，要避免相混。虽然不一定人人都能在口舌之間分辨得很准确，但只要心知其意，知道普通話語音与自己的方音大体上有些什么区别，也就行了。有了这样的基础，再进一步閱讀注音的讀物，就比較容易領会标准音与方音的对应关系，有举一反三的便利。

总之，拼音知識是学習普通話和識字的一把灵便的鑰匙。有了这把鑰匙，老师教起来省力，学生学起来順当。学拼音的时候，当然可以配合着汉字来学，但不宜喧宾夺主，使汉字超过为解說拼音所需要的数量。至于有关学習拼音的具体要求和步趋，伯韓同志在《文化下乡和汉語拼音字母》①一文里談得很好，請参看，这里就不多說了。

我想再談談在工作中怎样看待方言的問題：

我們是在方言土語的汪洋大海里进行工作的，可以說，推广普通話和进行識字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和方言土語打交道的过程。推广普通話和正音固然不是要消灭方言土語，但是方言土語畢竟会逐渐縮小它的使用范圍，或者說，会逐渐融合在普通話的洪流里。这种演变虽然是長期性的，但是普通話的推广和正音教育可以加快演变的速度。因此我們用拼音字母进行这兩項工作的时候，要使这套字母尽量發揮溝通方言的作用，避免某些对方言土語反而有巩固作用的做法，不管这些做法是有意的或無意的。

比如說，我們編写普通話讀物最好从重要的政治文件或語言比較純潔而生动的文学作品里取材，避免采用方言色彩过于濃厚的作品。要逐詞注上标准音，每个音节都标上声調，不要因貪圖省事只注那些不習見的詞，習見的詞就不注。而且最好將拼音部分放在相对汉字的上一行，用比汉字大一号的鉛字印。教学时可以直接唸拼音部分，不一定每个音都要看下行印的小汉字。这样免得受汉字方音的束縛。

我們也未嘗不可以因地制宜編些普通話的讀物，与《××人怎样学習普通話》專談語音"对应規律"一类的小冊子相輔而行。这些讀物可以談談本地的生产知識、建設情况、風土人物，等等，使普通話的学習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密切結合。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習普通話的兴趣，又可以使普通話的根在方言区札得深一些。編写这类性質的普通話讀物的时候，必然会碰到許多不好用普通話来代替的方言詞語。这些詞語有的是可以勉强折合为普通話語音的，虽然夾在普通話里显得特別，本地人外地人說起来都会感到別扭，但久而久之也許就習慣了。例如"像煞有介事""拆爛汚""癟三"之类，就是通过汉字讀音的折合办法跑到普通話里来的方言詞語。有的方言詞語却向来沒有固定的汉字写法，很难折合为标准音，而又無从使用翻譯手段的話，也就只好注上方音，加以特別的标志。这样的普通話讀物里偶然夾杂几个方音詞也不要紧。要特別注意的倒不是上面所說的这些特殊的方言詞，而是一般的方言詞，即可以用普通話里相当的詞去翻譯的方言詞。这些詞每每容易被編写的人所忽略，以为就是普通話里的詞，其实不然。例如"弄堂""洋油""水門汀""單車""来不贏"，等等。这些詞虽然間常出现在書面語里，但并不能当作普通話詞彙看待。也有些作家和記者特別喜欢方言土語，有些詞分明可以用普通話里的，却故意要用方言，以为不那样不足以使文章大众化，其实并不尽然。解放初期地方报刊濫用方言的現象很常見。例如那时的長沙《大众报》就过多地采用了長沙方言，如"沒有"用"冒得"，"幸亏"用"搭帮"，"很多"用"蛮多"，"出了事"用"出了咯喨"等等，以为这样合乎群众胃口，"結果群众反而不懂"。② 过后这种偏向被慢慢糾正过来了，然而少数作家和記者至今仍坚持己見，笔下对方言还是有癮。我們編写适合地方用的普通話讀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尽量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方言成分。我們要隨时在心里存着这么个观念：我們是为了推广普通話才把某些方言詞設法引进来的，而不是要拿普通話去"改造"方言。方言自然也会把普通話里的某些詞句慢慢吸收进去；但那是方言自己的事，我們用不着考虑怎么样在方言的底子上尽量容納普通話，而是应該考虑怎么样在普通話的詞句中尽量避免方言。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所編写的普通話讀物，才能起到溝通方言的作用。

在扫除文盲的工作中可不能提出像上面所說的要求，得多照顧方言一下。即使在北方話的区域內，也不一定能处处要求标准語音。祁建华同志的速成識字法开始推广的时候，在石景山鋼鉄厂参观他亲自教課。記得有一位大約是山西籍的女同志把 ji、qi、xi 这三个音讀成 jiê、qiê、xie (tɕiɯ, tɕʻiɯ, ɕiɯ)，不管怎样也糾正不了，在輔导員面前急得直冒汗，紧張極了。其实祁建华同志本人倒不这么严格要求，只要能依靠注音"拐棍"認識"鷄""欺""希"这些汉字就行，实际的發音如果因方音而有差別并不要紧。我們現在要

① 見《中国語文》1958年1月号。

② 見1951年4月15日《人民日报》"書报評論"；又可参看同年5月20日該报"書报評論"，同年10月26日該报"文化生活簡評"。

曲艺演員們热烈拥护汉語拼音方案

白 鳳 鳴*

汉語拼音方案已經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公布了。我們曲艺演員和大家一样，衷心地、热烈地拥护这个为促进汉語規范化而采取的新的措施。

曲艺演員所从事的艺术形式本身就是說唱，所以我們的業务和語言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个曲艺演員要想掌握好这門艺术，必須首先掌握語言技术，然后才能够表現这門艺术的特点，因为曲艺主要是靠語言来表达思想感情和故事內容。更因为声音造形和語言形象都是曲艺使用語言当中的重要問題，而这些問題又都和語言中音素、音長、音高以及重音、間歇等等專門知識和技巧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学習語言就成为我們曲艺演員的重要課題。

我們祖国是一个地大人多的国家，方言情况相当复杂，但是在过去从来沒有一个統一的标准(旧社会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就給我們在日常生活上和業务工作上帶来过不少的困难，这样的困难对于曲艺演員，尤其显得突出。具体說来，北方曲艺的活动范圍还是比較广闊的，可是也只能在华北、东北和長江下游附近地区的大中城市里演唱；演唱的人要了解情况，也要有自知之明，否则單是由于語言的关系就有挨"窩"的可能。我从事曲艺工作四十年，过去虽然在長江下游跑了十几年，但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我想其它地方的曲艺演員們也一定会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和体会。

解放以后，曲艺这門艺术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視和大力推广普通話，語言的运用上，在全国各地确实是已經收到了很大的效果。1957年我帶領中央广播說唱团做巡迴演出，就曾到从前北京曲艺演員很少到过的(确切地說，是过去所不敢去的)長沙、南昌等地公演。当时我心中沒底，确实有些担心；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当地听众不但能够听得懂，而且还特别感到兴趣。同时，广西桂林和湘西中小城市也来信、来人約我們前去演出。这不就是推广普通話給我們帶来的好处嗎？因此，这就增强了我們的信心和勇气，我們打算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把北京曲艺送到福建和广东等地区去。这的确是推广普通話和汉語拼音給我們的鼓舞。

汉語拼音方案公布以后，必將会給推广普通話和学習汉字帶来更多的方便，同时，我們曲艺演員在提高語言技巧上也获得了正音指南。我們艺人多少輩子都是文盲多，現在有了拼音字母，学起汉字可就方便多了，記詞也就好办多了。瞻望將来，瞧着新生一代青年曲艺演員們無限的發展前途，我們特别兴奋。同时也認識到我們有責任做好普通話宣傳員的工作。我們曲艺演員，無論老少，都衷心地热烈拥护汉語拼音方案，并且計划做有系統的学習。最近，中央人民广播說唱团派出相声演員馬季参加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学習語音学，就是我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的具体行动。

* 本文作者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說唱团团長。

利用拼音字母去进行扫盲工作也不必首先严格要求正音。在北方話的区域內，只需要在每个汉字下面注上标准音，不必注方音，学的人發音能合乎标准固然好，發音不完全合乎标准也不必斤斤計較。只要使学的人看見拼音就讀得出音，使他通过拼音認識这就是自己語言中的某一个字，就算达到認識汉字的目的。在北方話之外的方言区，除了每个汉字下面注上标准音之外，还要注上相对的方音，教学的时候不妨先从方音入手，以便联系当地的語音实际，免去同时学習标准音的負担。只要学的人能充分利用拼音字母，再慢慢轉入学習标准字音以至于学習成套的普通話都不会有多大的困难。当然，这办法还要看具体情况变动。例如在方言区較大的城市进行扫盲工作就不一定需要先从方音拼音入手，可以直接教标准音，方音注音只給教学参考。

至于怎样在汉語拼音方案的基础上設計各个方言区的方音拼音字母，作为輔性的拼音教学工具，这是需要語言工作者共同去解决的問題。袁家驊先生在上一期的《中国語文》里初步提出了一个方音字母匯通方案，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是我学習汉語拼音方案的一点体会，写出来向大家求教，尤其是向有实际經驗的語言教育工作者求教。

苏联語言学的發展道路

——苏联《語言学問題》社論——

一

我国語言学的發展道路，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决定于下列三个社会-历史因素：

(1) 我国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和發展。

(2) 苏維埃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形成苏維埃国家的各民族在这个国家中的狀况和它們之間的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变，从而給这些民族的文化發展开辟了嶄新的道路。

(3) 俄語担負着特殊的文化作用，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俄罗斯文学、文化、科学的語言。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提高了俄語的国际意义和族际意义；学習俄語巳經成为苏联各族人民切身的事業，俄語在国外也越來越普及起来。

基于上述的因素，語言学就在制定科学研究的新的(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条件下發展起来，同时受到过去遺留下来的科学遺产和独立發展的外国語言科学的影响。假如我們不領会这些社会-历史原因和条件，就不能理解苏联語言学發展过程中深刻的独特性，也不能理解它的內容和現狀的各种特点。

苏联各族人民文化的提高(其中旣有各族共同的特点，也有各族專有的特点)，祖国科学的繁荣，全民性識字教育的普及，以及随之而来的俄語和其他民族書面标准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使用范圍的扩大——所有这些引起了苏联語言学家們的紧張工作，其目的在于深入地从理論上和实踐上研究我国大大小小民族各种不同語言的結構及其發展的規律性。在苏联語言学家面前提出了語言学中为数众多的新的任务和極其重要的問題。

二

在我国社会的多民族的成員当中，革命以前有些部族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沒有發展到旧俄时代俄罗斯民族和其他某些民族所达到的社会和文化水平。这特別涉及到一些較小的部族——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北方居民，亞洲部分的西伯利亞和远东的居民。其中有許多部族和人种集团沒有自已的文字。因此，在苏維埃国家面前立刻提出了給上述各族人民創造文字的任务。对于用本族語言开办学校、普及教育、創办刊物、發展本民族文学，以及通过掌握鄰近各族人民的标准語的途徑来加速这些部族文化的發展过程来說，这項任务是必需的。

苏联語言学完成了这項任务。从前沒有本族文字的那些部族如通古斯族 (тунгусы)，赫哲族 (гольды)，薩莫第族 (самодийцы) 等获得了适应于本族語言的文字。而且，这种文字制訂工作是由俄罗斯語言学家和这些部族人士共同进行的，这是这一过程的特点之一。

革命后不久，在使用阿拉伯文字的各族人民即諸突厥族人民(塔塔尔族，阿捷尔拜疆族，哈薩克族，吉尔吉斯族，烏茲別克族，土尔克明族，卡拉卡尔帕克族等)中間，北高加索山区各族人民中間，以及伊朗-塔吉克各族人民中間掀起了一个改用以欧洲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起因是：

1) 文化革命的基本要求——必須扫除革命前在上述民族中間普遍存在的文盲現象；在保留阿拉伯的輔音文字(它的輔音性質决定了用阿拉伯字母来記录另一种結構的語言的詞不可能精确而且过于繁杂)的情况下要在最短时間做到这点是有困难的。

2) 在尽量扩大苏維埃教育的情况下，尽可能徹底地努力擺脫革命前在突厥各族和伊朗各族人民中間流行的宗教教育体系，而阿拉伯文字被認为是跟这种教育体系紧密地联系着的。

上述运动的結果是：过去使用阿拉伯文字的各族人民改用了以欧洲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体系，初期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后来又以俄罗斯字母为基础。苏維埃国家中使用蒙古文字的一些部落也追随了这些民族的范例。

可見，苏联語言学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为苏联各族人民的將近五十种語言創制了文字。其中許多語言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是沒有文字的（如列茲金語 лезгинский，塔巴薩蘭語 табасаранский，达尔金語 даргинский，阿布哈茲語 абхазский，阿第盖語 адыгейский，楚科特語 чукотский，那乃語 нанайский，柯米語 коми，汉蒂語 хантыйский 和其他許多語言）。另一些語言只有文字的萌芽。还有許多語言原来有旧的文字傳統，但是

为这些語言也創制了文字,因为这些文字(阿拉伯文字)沒有反映出它們的語音特点(如阿捷尔拜疆語,烏兹別克語,塔塔尔語,塔吉克語等)。

为沒有文字的各族人民創制文字的工作,以及为过去使用阿拉伯文字和蒙古文字的各族人民制訂新文字体系的工作,必須同时詳細地研究这些語言的音系,結果我国的語音学便获得了最广泛的發展。这种發展之所以順利,不仅决定于大批新材料的研究,而且还决定于我国語音学的高度水平,特別是由謝尔巴和他的許多学生(波里瓦諾夫 Е. Д. Поливанов 教授,阿赫夫列吉阿尼 Г. С. Ахвледиани 教授,巴蘭尼柯夫 А. П. Баранников 院士,拉林 Б. А. Ларин 教授,奔什坦 С. И. Бернштейн 教授等)所組成的博端·德·庫尔泰納学派的高度水平。該学派結合了分析法和綜合法,前者用于揭露語言的發音-听覚要素的所有音阶(гамма),后者則用于从这种音阶中找出或發現那些稳定的、具有社会意义的語言中的語音結構單位——音位。

这一学派使我国音位学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尤其是在特魯別茨科依(Н. С. Трубецкой)教授的著作的影响下,在国外音位学已經进一步發展成了世界語言科学的最强有力的部門之一。同样,也应該估計到:我們在上面提到过的关于为沒有文字的各族人民創制文字和为过去使用阿拉伯文字和蒙古文字的各族人民制訂新文字体系的工作,同样也是一种音位学——行动中的音位学。結合着上面所談的,不能不指出雅柯夫列夫(Н. Ф. Яковлев)教授和日尔科夫(Л. И. Жирков)教授在探索音位学的一般和具体問題上的巨大作用,特別是应用于高加索諸語言的音系上。

在創制字母方面,早在20—30年代已經明显地表現出来的实际成就是跟音位学理論的迅速發展有关的。雅柯夫列夫的研究«字母結構的数学公式»,給我国音位学的發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它使这門学科摆脫了庫尔泰納及其学派的心理学主义。跟随雅柯夫列夫的有另一些莫斯科的音位学家(阿瓦涅索夫 Р. И. Аванесов,西多洛夫 В. Н. Сидоров,庫兹涅佐夫 П. С. Кузнецов,列福尔瑪茨基 А. А.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在音位学領域中,一些不同的学派之間确实有区別,然而还不是經常表現得那样明显和肯定的(試比較下列作家的音位学著作:一方面有津杰尔 Л. Р. Зиндер 教授,奔什坦教授和馬圖謝維奇 М. И. Матусевич 講师,第二方面有斯米尔尼茨基 А. И. Смирницкий 教授,第三方面有阿赫夫列吉阿尼教授等等)。

三

改用新文字体系,就要求語言学家長期地、艰苦地下工夫探索那些用文字来表达有声言語的一般方法,制定具有普遍意义的、实用上方便的文字表达的正字法規范。这样的工作自然而然地結合着对各种各样語言的詞的重新研究,即对它的界限,它同語言中其他單位的关系,它的結構性質的研究;后者引起了構詞成分的广泛研究。

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的發展,使以前甚至在学校里从不談論語言学的許多人对本民族語言应有的观念随之有所發展,并加强了人們对苏联各族人民諸語言的語法構造的研究。这項工作的結果是:目前我国所有的民族不仅有了普通教育用的本族学校語法,而且还有师范教育用的本族学校語法;苏联語言学为苏联各族几乎所有的語言都編有科学的語法。其中有許多語言还是初次編制詳細的科学語法(如巴什基尔語 башкирский,庫慕克語 кумыкский,卡拉卡尔帕克語 кара-калпакский,阿瓦尔語 аварский,列兹金語,阿巴津語 абазинский,柯米語等)。特別应該指出的是过去很少被研究的一些語言也出現了科学語法,例如古亞細亞諸語言,通古斯-滿洲諸語言,芬蘭-烏戈尔諸語言,高加索山区諸語言。近七年来,只是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就为苏联各族人民三十多种語言編写了共四十余种科学語法。

編写苏联各族人民諸語言的語法,需要預先解决該語言的規范問題,即选擇一种作为或可以作为标准語基础的方言,因而編写工作就复杂起来。因此,牽涉到許許多多从前在科学研究上沒有被注意到的方言和土語的方言学研究就获得了很大的發展。另一方面,对苏联語言学来說,又提出了一个具有社会和科学意义的关于民族語言是历史范疇这样一个專門的問題。

为了編写語法,需要解决語言規范問題,然而这个問題不仅仅归結为确定一种按其社会意义和活动領域自然能成为民族語言基础的方言;建立語言規范也和标准語問題有联系,在某些場合下,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問題。在这一基础上,苏联語言学中又出現了一个專門研究称为"标准語"的現象的語言本質和历史本質的部門。在历史方面研究标准語的实踐和理論,是在俄語的專家們首倡下發展的。

在苏联各民族共和国里,有相当多的俄罗斯居民,他們需要掌握該共和国主要居民的語言,因此編写了俄罗斯人用的这些語言的語法。同时,俄語的重要作用要求每个民族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居民必須掌握俄語,因此人們意識到也有必要專門为我国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編写各种俄語語法。对比研究發展不同的語言純粹是由教学实

践的需要引起的，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發展，已表明它在科学上是有价值的，就是說对比研究目前拥有足以成立語言学中一个重要部門的全部材料，这个部門的研究对象不仅是語言类型学，而且也是語言構造的一般問題。

四

除了編写苏联各族人民諸語言的語法以外，我国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广泛地展开了編纂各种辞典的工作。

初期編纂的辞典几乎全是双語言对照辞典，其中有一种是俄語。现在苏联几乎所有的民族語都有了这种辞典，并且都有兩类的：民族語-俄語和俄語-民族語。

除了我国各族人民的語言的辞典之外，近十年来还出現了大量其他語言的翻譯辞典，其中包括各种东方語辞典：阿拉伯語，土耳其語，波斯語，阿富汗語，印地語，汉語，蒙古語，朝鮮語，日本語。其中許多語言的辞典都有兩种类型——东方語-俄語和俄語-东方語。某些語言有各样大小类型的辞典：大型的，中型的，簡明的。这些由外文与民族文辞典出版局(某些場合下同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合作)編成的辞典是苏联語言学最大的成就之一。

其后，开始編纂民族語詳解辞典，目前我国許多民族(比如格魯吉亞，阿尔明尼亞，立陶宛等)已經有了本民族語言的够份量的大型辞典。在語言学的这塊园地上起領导或指导作用的是俄語辞典学的理論和实踐，俄語辞典学的原則和方法在(各种类型的)俄語詳解辞典的編纂过程中形成和發展起来，并在繼續發展着。

編纂辞典的工作具有双重的意义。

在許多場合下，民族語-俄語的双語言辞典，一般就是該民族語言的第一部辞典。所以在編纂这样的辞典以前，尽可能应該預先进行詞彙的搜集工作，并且在某些場合下主要应該依据活的口語材料。例如尤达欣(К. К. Юдахин)的吉尔吉斯-俄語辞典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用这种方法編成的。因而，这类辞典实質上最初描写了某种語言的有效詞彙。这种情况賦予辞典編纂工作以特殊的意义：詳解辞典揭露了某种語言的詞彙，并且考慮到各种意义的所有特点。这样一来，辞典編纂工作就跟詞彙学工作結合起来，而进一步对这些語言作詞彙学研究就有了大量和可靠的材料来保証。

第一种語言或第二种語言是俄語的那些双語言辞典，除了它的直接意义之外，还有另一种意义：它提供了对照的詞彙。因而給詞彙学提供了丰富的多种多样的材料去研究語言对比时發生的最重要的現象之一：一种語言的詞彙滲入另一种語言的詞彙里去的現象。在苏联各民族語言和俄語紧密地接触的情形下，这种現象具有特殊的意义。双語言辞典明显地表明了詞彙滲入的范圍，使我們可以看出該現象的界限，理解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一般地估价語言体系中各个不同方面的所謂滲入性(проницаемость)問題的实質。在这一方面最能作为例証的是俄語-卡拉卡尔帕克語辞典。

苏联各族語言辞典所收的詞彙，特别是教育和科学在十月革命前極不普及的各族人民的語言的辞典所收的詞彙，給詞彙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关于这些語言的詞彙發展以及这种發展的道路和方式的非常尖銳的問題。当时明显地出現了兩种傾向：第一，借用外族語言的詞(在这样的場合下主要是借用俄語的詞)；第二，創造本族語言的詞，在这种情形下，不仅要依据本族語言的詞根詞彙，要按照自己的構詞类型，而且还要依据長时期以来用作該語言的古典标准語的另外一种語言的詞根。比方：古典阿拉伯語，对于苏联突厥族和伊朗族人民来說就是这样的語言，它直到現在仍然是国外突厥族和伊朗族人民創造現代經济、社会、政治、哲学、科学术語的基础。

在苏联各个突厥語共和国中曾經有一个很長的时期进行了关于补充詞彙的道路問題的討論，討論中証明上述問題跟思想体系的一般問題有联系，甚至跟現今的政治派别有联系。

五

作为俄罗斯人民的語言、偉大的十月革命的語言的俄語的社会政治意义，作为偉大的文学的語言、發达的科学的語言的俄語的文化意义，对俄語进行分門别类的和联系古代斯拉夫傳統的全面研究，俄語構造和历史方面各种問題的研究的高度科学水平——所有这些决定了俄語科学在苏联其他各族語言的科学研究上的巨大作用。

俄語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苏維埃时代获得了特别广泛的規模。苏維埃語言学家在發展俄罗斯口头和書面言語修养的斗爭中作出了貢献。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就完成了一項推行新正字法的巨大的工作，这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間普及識字方面起了积極的作用。1956年批准了确定的和統一的《俄語正字法和标点法規則》，出版了适应于这些規則的参考性的《俄語正字法辞典》。也出版了一本詞彙手册《俄語标准音和重音》。

在革命后的年代里，語言学領域中形成了一門新的学科——俄罗斯标准語史，它综合了历史語法学和历史詞

彙学、方言学、文学史的各种材料，幷且联系着历史过程的一般規律性确立了标准語發展的規律性。在苏維埃时代以前，研究俄罗斯标准語史的具体著作很少，而一般的概論如果越出了語音結構和形态結構的描写，就只能提供一些偶然性的語言事实(試比較布杰 Е. Ф. Будде 教授的«俄罗斯标准語史概要»)。最早系統地探索这一新学科的有下列学者的著作：維諾格拉多夫(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院士，奥布諾尔斯基(С. П. Обнорский)院士，烏克蘭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布拉霍夫斯基(Л. А. Булаховский)院士，雅庫宾斯基(Л. П. Якубинский)教授，維諾庫尔(Г. О. Винокур)教授，等等。

兩卷本現代俄語科学院語法已經編成，它最充份地包括了事实材料，幷概括了革命后时期俄語語法科学上的各种成就。許多專題論文、学位論文、学术論文闡明了历史發展中的俄罗斯标准語形态学、結構学、構詞法的各种各样的局部問題。

在俄罗斯語文学的历史上，头一次編成幷將出版一部普希金(近代俄罗斯标准語的奠基者)的語言的科学院大型辞典。在普希金辞典的編纂过程中，以及对已經問世的該辞典的第一卷的評論过程中，广泛地展开了編纂这类辞典的理論原則的討論。

苏維埃語言学家銘記着列宁关于編纂現代俄語各种詳解模范辞典的遺言，展开了編纂各种类型辞典的巨大工作。近二十年来，已經編成的辞典有烏沙柯夫(Д. Н. Ушаков)主編的四卷本«俄語詳解辞典»，奥哲果夫(С. И. Ожегов)的單卷本«俄語辞典»，出版了五卷科学院十四卷本的«現代俄罗斯标准語辞典»和新的四卷本«俄語辞典»的第一卷。編纂俄語各种辞典的工作对于各民族語辞典学的發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最近十年来，形成了一門新的科学部門——語言地理学。目前正在編繪一部大部头著作——俄語民間土語地圖集。参与調査諸土語的有全国許多高等学校。苏联俄罗斯学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現了搜集方言材料的重大工作，此項工作目前仍在繼續着。在从事于俄語方言地圖集工作的实踐中，不仅形成了俄語語言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的原理，①而且也形成了一种通过直接观察法搜集地圖材料的方法論。②

繪制地圖的原則和方法論已經制定，幷且准备出版关于各种类型的語音、形态、詞彙等地圖的文章，而主要的是最近要出版一部«莫斯科以东中部各省俄語民間土語地圖集»。在这部地圖集上根据一定的材料不仅解决了繪制(反映完整的、通常是極其复杂的語言現象的)專題地圖的可能性問題，而且还解决了繪制孤立語言事实分布界限圖和整个語言系統上的局部現象圖的可能性問題。

目前在四部俄語地圖集的地圖上描写了下列各省土語的材料：列宁格勒省，諾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維里科魯克省，加里宁省，斯摩林斯克省，卡魯日省，莫斯科省，符拉基米尔省，高尔基省，梁贊省，布梁省，奥尔洛夫省，庫尔斯克省，別尔哥罗德省。因而，也用語言地理学方法收集和整理了远古东部斯拉夫居民住区(大俄罗斯部族就在这里形成)的土語材料。这样一来，就有可能集体着手撰写有关个別土語群形成史的專題論著，同样也有可能重新探索俄語历史語音学和历史語法学中的一系列問題。第一次有可能根据俄語的基本方言群来探溯語言現象的后期历史的某些过程。繪制地圖集的工作也为建立新的、分化的、比較符合于历史事实的俄語民間土語分类法創立了一种必要的基础。

六

理論密切联系实踐是苏維埃科学的基本特点之一，它对俄罗斯語言学中与文艺学有关的那些部門的發展也起了影响。內战結束后的最初几年中，苏維埃文学对标准語問題及風格問題給予密切的注意，因而促使詩歌語言方面出現了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中，不仅奠定了标准語理論和标准語史的基础，而且也奠定了語言修辞学的基础。

精神文化的急遽成長表現在語言的变化里，同时它也产生对詞，对文学創作的迫切要求和兴趣。在生活完全革新的时代，作为語言、文学、口头文化的科学，作为闡明文学作品的方法，語文学的社会作用显得特別深刻和广泛了。

苏維埃語文学中，过去处在黑暗狀态或某种蒙昧狀态中的那些研究部門現在燦爛地發着光輝。文献的理解

---

① 参看«繪制俄語方言地圖集的材料搜集綱要»的緒言和有关这个問題所發表的一些論文，特別是發表在«語言学問題»杂志上的論文。

② 参看«"繪制俄語方言地圖集的材料搜集綱要"的教学指导»，主編阿瓦涅索夫和奥尔洛娃(В. Г. Орлова)，莫斯科，1957。

和闡述是語文学的基础，也是研究精神文化的基础，部分地还是研究物質文化的基础。历史、語言学和文艺学，这三个亲近的語文学学科以及它們之間相互的协調，指出了并决定了达到充分而又准确地理解文学作品的道路。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的基础上，俄罗斯語文学的一个新部門，即俄罗斯标准語史，就在苏維埃时期扎下了根，并且迅速地成長起来。大家知道，俄罗斯标准語史，特别是近代的标准語史，主要是以最偉大的俄罗斯作家們的作品里的語言材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是很自然的，列宁就拿普希金、高尔基兩位偉大的俄罗斯作家的名字作为标志，来确定俄語模范詞典的結構和組成。

按沙赫馬托夫院士的說法，俄罗斯标准語史就是"俄罗斯教育的發展史"，它和俄罗斯社会思想史、俄罗斯科学史、俄罗斯口头文艺史是分不开的。

在研究作家語言时，文艺学也是被密切注意的。作家的創作、作者的个性、作品中的主人翁、主題、思想，以及形象都体現在語言里，而只有在語言里和通过語言才能表达出来。对作家的語言沒有深刻及細膩的知識，就無法研究他的語言風格、詩体，以及他的世界观。只有对一个作家的語言知道得很清楚，或者研究得很透徹的人，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讀懂这个作家的文章內容。

苏維埃时期以前的俄罗斯語言学，特别是十八、十九世紀期間，在研究作家語言的方面成績是不大的。甚至在俄罗斯标准語史和偉大作家的語言史相提并論的情况下，也很少从个别作家的語言中挑选例句，民族标准語規范的概念，語言史中社会文化發展規律性的概念，以及标准語現象文体的分化的概念都是沒有的。在研究作家語言的方法上，也反映出語言学領域中年青語法学派統治的特色。在这个时期的学院研究中，对俄罗斯标准語的現狀、历史及其与俄罗斯文艺語言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几乎完全被方言学的兴趣所排斥和窒息。

标准語的科学与文艺創作的理論和实踐之間，在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車尔尼雪夫斯基时代有过緊密的有机的联系，这种联系也曾体現在格罗特(Я. К. Грот)、布斯拉耶夫(Ф. И. Буслаев)、波鉄布尼亞(А. А. Потебня)的著作中，可是在本世紀初叶它几乎中断了。

最近四十年来这个科学部門的狀况起了尖銳的变化。因此，革命前語文科学的技术成就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論的光輝照耀下，获得了新的功能基础和运用；取得了新的語义学方向。(例如，参看希施馬列夫 В. Ф. Шишмарев 院士及其他許多苏維埃語言学家的語文学著作)。四十年来，在寻求解决作家語言研究的基本問題方面，苏維埃語文学科学所經过的道路是一条曲折而又艰难的道路，但这是一条富有結果和成就的道路。

在苏維埃时代，俄罗斯标准語的科学，特别是其中有关研究文学作品語言、作家語言的那一部分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急速的發展。在这方面的某些活动，早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已經在广大的社会范圍內开始了。

按謝尔巴院士的話来說，本世紀初的头几十年中，对于語言的兴趣活躍起来了，而且把語言看作是"人的一种活动，每次都有其一定的目的，是最好地、最方便地表达自己思維和感情的工具"。而且"…在社会里，至少在俄罗斯的社会里，对語言兴趣的增長，完全…不依賴于語言学。首先是詩人們开始或多或少地有意識地对待語言，因为語言是他們的材料，跟着是年輕的文学史家，他們感到如果沒有語言学的观点，很多文学的現象是不可能理解的；最后，舞台艺术家們，可以說，比其他人更有助于激發社会上对于語言的兴趣，因为生动的口头語言对他們来說是他們艺术的一切"。①关于舞台語言及作家語言，只要指出我国偉大的戏剧导演和理論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及其学生(高尔察柯夫，瓦赫担戈夫，托波尔科夫，凱德罗夫，比尔曼等人)的卓越見解就足够了。研究作家語言这一問題引起了对文艺或者詩歌語言这一問題的活躍及鑽研。

研究俄罗斯語言艺术家的語言和修辞学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原則，最近二十年来起了剧烈的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是，离开二十年代所特有的那种單方面注意形式問題的总傾向，以及广泛地熟悉俄罗斯标准語史和俄罗斯文艺語言的具体材料。深入研究标准語及文艺語言發展中的历史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必要性已經弄清楚了。

从各处都提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基础上建立詞的美学同詩歌語言的理論基础的問題。

这样，文学作品語言的和作家風格的科学，在苏維埃时期，与俄罗斯标准語史一起在生动的相互作用中迅速地富有成效地發展着。研究作家語言的任务正是要确定文艺上个别利用民間語言波浪 (языковая волна) 的方法，确定那些借助于語言波浪而創作出来的新文学作品中的文体結構規律，还要确定文艺創作發展中的共同規律和民族特有的規律。同时，作家語言的科学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論的繼續發展应該促使苏維埃語言文化获得进一步的高漲和繁荣。

---

① «俄罗斯語言»論文集，第一分册，彼得格勒，1923，9—11 頁。

七

苏联其他各民族的語言学家对俄語的極其認眞的研究也显示出俄罗斯語言科学的作用。研究的目的在于用本民族語言跟俄罗斯語言中类似的或者相近的現象对比，以揭露自己語言中的各种現象。这种研究工作特別表現在語法的研究方面。

这种傾向导致兩种迥然不同的結果:

(a) 該語言和俄語中被对比的現象按其語法本質或功能来說，的确是类似的或者無論如何是非常接近的，相关的，在这些情况下，結果是眞正地揭露出各种語言的許多語法現象的本質。

(b) 兩种語言的現象中假設的(原則上或功能上的)类似性或相近性是不可靠的、人为的，在这些情况下，結果是沒有理解这些語言中某些語法現象的眞正的本質。

屬于一种結構的俄語和屬于另一种結構的語言，它們的語法結構的对比，使得这些語言的研究者更加注意过去在这些民族的語言学史中形成的固有的語法傳統。对上述傳統的注意，会促成这种傳統中所特有的許多評价重新出現，由此，也就使这些語言所特有的許多語言現象的本質得以眞正适当地揭露出来。

苏維埃語言学中曾經一度存在的研究語言之間“相似”及“相异”現象的傾向是这条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从这个角度研究語言，特別是在“馬尔理論”企圖統一和歪曲民族語言間特殊差別的虛假前提的影响下，当时当然只可能得到实际上也得到了極其有限的、价值不大的結果，因此这种傾向也就沒有得到發展；不过它也充当了把語言作为特殊体系并考虑到在这种体系的范圍以內历史地形成的語法傳統来研究語言結構的阶梯。目前，在苏联突厥語共和国的語言学家所編写的某些突厥語語法中，可以看到考虑古老的阿拉伯語文学傳統的努力。

因此，在語法科学的領域中，在苏維埃語言学面前提出了一項跟旧式的普遍的哲学-邏輯語法思想直接对立的任务，就是要根据每种結構的特点严格地在这些結構的范圍內發現各种不同結構的語言中的語法構造。这样的方法可以建立眞正巩固的基础，以闡明和确定語言共同的規律，特别是闡明所謂語言發展內部規律，它們作用的本質、范圍、界限及它們的历史命运。

八

苏維埃东方学者在二十年代里給历史比較語言学做了很多工作。(参閱薩莫伊洛維契 А. Н. Самойлович 院士、德米特里耶夫 Н. К. Дмитриев 教授、高尔德列夫斯基 В. А. Гордлевский 院士和馬洛夫 С. Е. Малов 教授关于突厥語的著作，符拉吉米尔佐夫关于蒙古語比較語法的奠基性的研究著作等。)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头几十年里，和俄罗斯历史比較語言学学派有联系的、有悠久而光荣的傳統的那些斯拉夫学的部門，繼續順利地發展着。(参閱謝里謝夫 А. М. Селищев、杜尔諾沃 Н. Н. Дурново、伊里因斯基 Г. А. Ильинский 及許多其他苏維埃語言学家的著作。)在許多苏維埃語言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語言融合思想的迷恋(謝尔巴、波里瓦諾夫等)，但是这种迷恋在这一时期中不但沒有阻碍比較語言学的發展，而从社会学主义的語言学的观点来看，反而促进了对語言亲屬关系問題的更深入的研究(試比較，特魯別茨柯依及皮薩尼 V. Pisani 对語言亲屬关系的观点)。最近时期，比較語言学的發展几乎停頓了。但是，在四十年代里，甚至在馬尔学派語言学者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比較語言学中个別有价值的結果。这些著作运用了比較方法，但广泛地把它跟語言融合的研究(阿巴耶夫 В. И. Абаев)及类型学的研究(卡茨涅利松 С. Д. Кацнельсон，杰斯尼茨卡亞 А. В. Десницкая)結合在一起。运用类型学的对比来証实历史比較的假設，最近几十年来就是在国外的科学中也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着。把历史比較的研究及类型学的研究运用到印欧語次序数詞及比較級的詞尾上，边維尼斯特(E. Benveniste)和卡茨涅里松兩人不約而同地获得了相同的結果，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應該指出，現代大部分語言学家都承認在比較語言学中运用类型学对比的迫切性；今年奧斯陆国际語言学家会議上就曾有一个特別的报告專門談論这个問題。

經过1950年語言学問題的辯論，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書出版后，在亲屬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方面呈現出了一些活躍現象。出現了斯拉夫比較語言学的一些学术論文及文章(特別請参閱烏克蘭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布拉霍夫斯基院士关于斯拉夫重音学的著作及关于动詞的体、时等問題的許多著作)。苏联科学院恩节林(Я. М. Эндзелин)通訊院士最近写的一篇研究拉脫維亞地名学的論文中包含着波罗的語言学的珍貴材料。研究楔形文字的赫特語(卡潘千 Г. А. Капанцян 教授、甘姆克列里节 Г. В. Гамкрелидзе 等人的著作)和吐火罗語这一类語言的兴趣提高了。

印欧語(伊朗語、斯拉夫語、日耳曼語)的詞源学及历史比較詞彙学的工作展开了。运用于各个語系的历史比

較結構学問題也正在进行討論。布勃里赫(О. В. Бубрих)的意义重大而范圍广泛的著作發表后(参閱作者关于烏德穆尔特語、艾尔加語、芬蘭語的历史語法綱要)，芬蘭-烏戈尔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的范圍加深并扩大了。編写突厥語历史比較詞彙学和語法学的准备工作日益加强起来了。从比較的角度来研究蒙古諸語言的积極性在增長着(比方，可参閱桑席耶夫 Г. Д. Санжеев 教授的«蒙古諸語言的历史比較語法»)。从历史比較的角度研究了卡尔特維里語言，并为編写它們的历史比較語法創造了前提。高加索其他各語族的比較研究也在顺利地进行着。

可見，在1950年語言学的辯論后，在历史比較語言学方面虽然还沒有获得很可观的，至少是令人滿意的結果，但是，在这个重要的方向上已經有了明显的、很激烈的轉折。自然，我們主要是采用有方法論的新方法及新的理論原則来加深对語言的描写研究的。

偉大的十月革命后，为了进行这种研究工作，在苏联所有民族中曾經培养了許多語言科学干部。在加盟共和国及自治共和国里也出現了新的語言科学中心（第比利斯、埃里溫、巴庫、塔什干、阿拉木圖、雅庫茨克、馬哈奇卡拉 Махачкала、錫克提夫卡尔 Сыктывкар 等城市)。

九

苏維埃語言学的特点是跟别的科学深刻而緊密地联系的，当然，首先是跟社会科学，部分地跟数学、自然科学以及技术部門的联系。苏維埃語言学并沒有脫离开广义的語文学，而是依靠了語文学的一切成就，并且反过来影响語文学，在标准語史、文艺和民間詩歌創作的語言的修辞学的研究工作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苏維埃語言学同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联系。在对語言运动的历史过程的規律性的一般理解中，在对个别語言史的具体研究中，苏維埃語言学运用了社会現象的历史發展的馬克思主义理論作为自己的基础，因而它同历史学、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考古学、人种学有着緊密的联系。

語言和思維的关系問題是苏維埃語言学家經常关心的問題之一。馬尔院士曾經企圖把卡西列尔(Кассирер)，列維-布留尔(Леви-Брюль)，以及国外其他人种学家和語言学家的观察，运用到最古的时期去解決这个問題。阿巴耶夫的著作中也在同一个方向对这个問題进行了研究。在李福親（А. П. Рифтин）及卡茨涅里松的著作中反映出索墨費尔特（A. Sommerfelt）«語言和社会»一書的深刻影响。这些理論主要牽涉到語言和思維發展的远古时期，其可爭論性，有时也是錯誤性，是显而易見的。在这一方面，今后的研究首先应該是收集在社会-經济方面和文化方面最不發达的那些部落的人种学及語言学新材料。同时应該承認，根据这些观察作出的并且套在他种历史条件下發展起来的語言上的草率的結論是完全不恰当的。

为了解決語言和思維的关系这一問題，苏維埃心理学家在跟語言学家密切接触中做了很多工作。1956年重版的維戈茨基(Л. С. Выготский)的«思維和語言»这一著作，在30年代到40年代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也必須提起魯宾什坦（С. Л. Рубинштейн）教授和魯里(А. Р. Лурий)教授那些与語言学問題有关的著作（例如，去年出版的魯里关于同胎兒的語言發展的著作，关于創伤性失語症的著作，以及关于間歇性失語症的文章)。这种实驗工作的价值証实了語言学家和其他科学的代表們的合作是有成效的(参考謝尔巴在聾啞語言方面的工作經驗)。

联系到語言学家和其他科学代表們合作的問題，联系到实用語言学的問題，应該指出謝尔巴的学生——語音学家們和通訊工作者們早已建立的接触的意义（参閱«語言学問題» 1957年第5期上津杰尔的文章)。由于这种合作，許多語言修辞学的研究工作得以完成。最近几年来我国数学語言学的發展跟机器翻譯、信息机器的工作是有关系的。不过，这方面，不管者具体問題或是理論問題，我們还仅仅站在独立研究的門檻上。

十

苏联語言学家緊張而多方面的活动是在兩种方法論体系影响下的复杂而又矛盾的环境里进行的。其中一个極其重要的体系，正如社会科学的总方法論一样，是从馬克思主义来的；第二个体系是从各种不同的方法論学派中来的，这些学派由其他哲学体系灌输到我們的語言学里来。革命后初期这些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心理学学派(由博端·德·庫尔奈納学派而来)，社会学学派(由索緒耳和梅耶学派而来)和美学学派(一部分由波鉄布尼亚学派的支派，一部分由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的美学而来，再一部分由克罗采 B. Croce 学派而来)。

十月革命后这一时期，語言学研究中的基本特点是認眞注意"語言和社会"的問題。(参閱蕭尔 Р. О. Шор、彼捷尔松 М. Н. Петерсон、波里瓦諾夫的文章及書籍，馬尔和他的学派的著作等。)在处理和解決言語交际的問題时，这一时期的語言学著作預示了对語言通訊这个問題的兴趣。在国外的科学中，这种兴趣还仅仅是在最近的几年中由于信息論的發展才产生的。(参下頁注①)

看到旧学派的局限性的一部分苏联語言学家，他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語言科学中能够最充分地說明語言本

質和語言現象特征的那些一般原理的研究上。关于社会事物的物質基础的馬克思主义原理，关于阶級社会时期作为历史过程的內容和推动力量的阶級斗爭的原理，是苏維埃語言学家进行这种研究工作的依据。

革命后最初的几十年中，苏維埃唯物主义語言学的兩条最重要的路綫就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条是联系物質文化来研究語言，另一条是从阶級斗爭的观点来研究語言。上述兩条路綫在馬尔和他的繼承者的著作中非常明显地表現出来。这些著作既表現了該研究学派所能帶来的成效和好处，又表現了它本身所具有的錯誤和虛假。

緊密地联系物質文化来研究語言，大大地提高了語言材料对于發現人类生活最古时代的物質文化史的意义；并且使得有可能更加充分、更加明确地对这种文化的遺物作出評价。

由此，在現存的和从历史上追溯上去的語言的历史比較研究的范圍內还产生了特殊語系（雅弗語系）的假設，这种假設变成了一般語言發展史里雅弗阶段論的概念，它往后又成为反历史的一般語言阶段發展論。这样的变化有它一些好的后果，但更多的是不良的后果。

它的良好后果是异常地扩大了被研究的語言范圍，把前亞細亞最古老的語言也納入研究范圍內。这样納入的效果表現在最近的語言学史中——表現在各有所長的許多学者注意对比研究高加索和前亞細亞的古代語言（在墨山宁諾夫院士、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采列捷里 Г. В. Церетели 的著作中），这种研究已經获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再請参考梅里啓什維里 Г. А. Меликишвили 的烏拉尔特語 урартский 的描写語法）。

它的不良后果是，在阶段論的基础上創立了統一語言起源过程的概念，这种概念导致沒有根据实际的历史材料，忽視具体的历史詞源学，反历史地、任意地把个別語言的事实（不論是它們的現狀还是过去的狀况）凑近在一起。对許多重要的事实也导致了錯誤的解釋，作出了許多虛伪的和不眞实的"概括"；并且引导語言学家走上抽象体系的道路。

从阶級斗爭的观点来研究語言，大大地加强了对反映社会生活的語言事实的关心，并且导致非常充分地、具体地理解語言的社会本質。在这个基础上早就在国外的語言学中产生并按照自己的道路發展起来的社会学学派，在我国就变成了把語言看作上層建筑的錯誤概念。

語言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發展的良好后果是，从社会观点来研究語言事实的圈子扩大了。这种效果表現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更明显地确定了各种类型的社会方言；第二，提出地方方言極其复杂的条件下的共同語言的問題；第三，对于被称为民族語言的現象有了新的（严守历史主义的）解釋；从这种解釋进一步得出一种假設，即語言由部落語言狀态向部族語言狀态，再向民族語言的方向运动；第四，对于被称为"标准語"的現象有了新的历史主义的闡述，并且扩大了它的中心問題。

把語言看成上層建筑的不良后果是創立了語言阶級性的概念。这种概念导致把語言現象像法律、政治、倫理、美学和哲学体系的現象一样来評价。这样就开始直接从語言本身的材料中尋求在法律、政治、倫理、美学和哲学中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意識形态概念的那些斗爭現象。这样就导致对許多語言事实作出人为的解釋，并且使語言学家不能理解作为既非基础也不是上層建筑的社会現象的語言的本質。歪曲地理解了語言的語义發展，把語言的語义和意識形态，把思維和世界观混淆了起来。

在 1950 年关于語言学中馬克思主义問題的辯論里，斯大林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把語言看作上層建筑范疇这个概念的錯誤性。在此之后，把語言理解为某种社会現象，語言是起实踐作用的意識这一原理，以及語言是發展和斗爭的工具这一原理，这三者就成了苏維埃語言学基本的理論原則和方法論原則。第一个原則确定了研究語言本質及其功能的路綫；第二个原則确定了研究語言和思維的相互关系，以及語言作为表現手段的路綫；第三个原則确定了研究語言的具体历史的路綫。

苏維埃語言学的理論基础和方法論基础使苏維埃語言学在世界語言学界中形成了特殊的学派，并且决定了它的內容的独特性。因此，把苏維埃語言学跟世界語言学思潮的其他学派进行任何对比时，不能不估計到語言研究上的原則基础和方法論基础的差別。进行这种对比时也不能不估計到我国近半世紀以来語言学的具体历史。这一段历史本身就大有教益，并且意义重大：在一个大国家的生动的科学經驗中，它明显地指出，在語言学思潮中致力于把某些具体任务放在第一位的这个学派本身跟建設着社会主义的多民族的苏維埃社会的历史的联系是多么緊密；伴随着这种工作而来的复杂而在最具体的語言学工作中發展起来的、艰巨的但又是完全必要的、語言科学本身的新理論基础和新方法論基础的制定过程，具有怎么样的头等重要意义。

（高祖舜、周鍚譯自《語言学問題》1957 年第 5 期）

---

① 在这方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斯普林格的專著（G. P. Springer«Early Soviet theories in communication 早期的苏維埃通訊理論», Cambridge, Mass. ,1956）中，比方对雅庫宾斯基关于对話語言这样的著作，有很高評价，这是很有意义的。

介紹《語言学結構主义和方言地理学研究》*

岑麒祥

这篇报告所討論的兩个問題：語言学結構主义和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显然是存在着矛盾的，因为一方面，語言学結構主义既然把語言理解为一种結構或系統，一个有組織的整体，它的一切成分都是紧密地互相結合着的，它必然会只注重語言的靜态研究而忽視了它的历史發展；另一方面，方言却是語言分化的結果，这就是語言在历史上起分化的一个活例。談到分化，那就意味着变动、改变、旧系統的破坏和新系統的产生。这种系統的結合力量怎样去抗拒它的破坏力量，怎样去决定系統中各要素的变化呢？变化可以有空間的和时間的兩个意义；空間本身是不能造成語言的分化的，索緒耳在《普通語言学教程》中也曾說过：“地理上的差异应該譯成时間上的差异”（原書第1版，277頁）。可見这兩个問題間是存在着矛盾的。

多洛舍夫斯基是不同意索緒耳的語言学理論的。他早在1929年就曾在华沙《哲学評論》第14卷上發表过《語言和言語》一文，批評索緒耳关于这兩个概念的說法；1933年还在巴黎《心理学杂志》第30卷上發表过《关于社会学和語言学关系的一些意見》一文，指責索緒耳把法国資产阶級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学說灌輸到語言学中去。他现在这篇报告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就詞的定义和事物的定义、結構主义的历史基础、索緒耳的《普通語言学教程》、符号的表区别的性質、音位交替的原則、共时語言学和历时語言学、符号的任意性、符号和被表示者、詞作为語言的表区别的实体、符号学等这几个問題，批評索緒耳和結構主义的观点；第二部分用波蘭語方言的实例說明方言地理学上的一些問題。

索緒耳在《普通語言学教程》中說过：“一切关于詞的定义都是徒然的；从詞出發去給事物下定义是一个不好的办法”（32頁）。可是不說出它的名称，我們怎能給事物下定义呢？为什么要給它下定义呢？只有說不出名称的东西才是不能下定义的。索緒耳正是为了要避免“詞的徒劳無功的定义”，企圖不是从詞上面而是从事物上面下定义，所以分出和确定了langage（言語行为）、langue（語言）和parole（言語）的概念（114頁）。但是等他說到“在我們看来，語言就是言語行为減去言語”（同上），我們看到的并不是三件事物，而只是三个詞：langue（語言）、langage（言語行为）和parole（言語）。除非他把这三个詞的定义下得很确切，而他所用的又跟他所下的定义不發生矛盾，那么我們所了解的就跟通常所用的差不多，而对于这几个詞的意义，即它們用来指的事物，也只好任意猜測了。

其实給一个詞下定义是甚么意思呢？那不过是把詞和它的被表示者間的关系很清楚地表明出来，使人看出这被表示者罢了。一个詞的意义內容是不能無限制地和它的被表示者完全相同的，因为詞的內容就是它的意义要素的总和，这些意义要素确保我們把它应用于它所表示的事物。例如“树”这个詞的意义內容就永远不能跟我們在某一棵树里分出的一切特征完全相同。一切的詞都有一个一般的意义，所以我們可以把詞应用于一些特殊的事物。只要我懂得它是什么意思，認識它的內容，会把它很适当地应用于每个事物（这些事物的全体構成了这个詞的外延），那么我們对于这个詞的認識就是眞实的。假如我看見一种植物，迟疑不敢把它归入树这一类，不敢把它叫做“树”，那是因为我承認它可能是另一个詞（比方“灌木”）的被表示者，这就是說我对于“树”这个詞的意义認識得不完备，比方我有时对于应用一个詞、把它使用得很妥当这一点上感觉到困难就是一个証明。懂得和使用是兩个不同的概念，这兩个概念是互相补充和不能分离的。“懂得”首先和內容有关，“使用”却涉及詞的外延。

定义之所以是徒然的不是因为我們要給一个詞下定义，而是因为要針对它的內容而不管它的一切可能的外延（等于应用）。詞是一个理解的工具，旣是工具就应該为某些事物服务。詞提升到了科学术語就应該保証能够促进科学的研究。这只有当这个术語的定义不仅能很确切地表明它的內容，并且能保証它在应用上是很有用的才成为可能。是否在应用上有用，这就是我們用来衡量科学术語这种工具有沒有价值的一个尺度。

結構主义的历史基础就是索緒耳的《普通語言学教程》——符号的語言系統。关于这一点，叶勒姆斯列夫在《語言学中的結構分析法》一文中（載《語言学杂志》第6卷，第2—3分冊）說得很清楚，他并且强調指

---

* 作者多罗舍夫斯基（Witold Doroszewski）是波蘭华沙大学的教授。这是他1957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八届国际語言学家会議上所作的一篇报告，見《第八届国际語言学家会議报告集》第二集，原题 Le structuralisme linguistique et les études de géographie dialectale

出要忠实于索緒耳所拟定的原則，認为这是現代一般語言学的基础。所以我們現在要把許多与索緒耳符号的語言系統这概念有关的术語的內容和外延，即"实用的"价值，加以分析。

結構主义者所用的"結構"和索緒耳所用的"系統"这兩个概念是很接近的。这兩个詞都跟許多由同等关系联系起来的要素有关：就系統来說，这同等关系是在同一平面上实現的；就結構来說，它却分配于不同水平而互相迭置的平面上。可是应用到語言事实，这兩个术語却是很相像的。

"結構"这个概念在索緒耳的«普通語言学教程»里是用什么术語表示的呢？他說：

> 像下棋用不同的棋子結合起来一样，語言的性質完全以它的具体單位的对立为基础。(153—154 頁)
>
> 要分析其中的要素，必須从一切共同一致的出發。(163 頁)
>
> 語言是一个系統，它的一切成分都是共同一致的，其中一个只因为有其他的同时存在才有它的价值。(165 頁)
>
> 在一种語言的狀态中，一切都依賴于关系。(170 頁)
>
> 全体依它的部分而有价值，部分也依它們在全体中的位置而有价值。(193 頁)

他偶然也說过"內部語言机構"，但是在同一上下文中这个术語都可以用"系統"来代替。

索緒耳在"語言的价值"这一章的最后一段里还說过这几句很有意义的話："这一切可以表明語言中只有差別。并且差別一般会使人想到它所建立的肯定的成分；但是在語言中只有缺乏肯定成分的差別"(172頁)。可是在同書的 156 頁他却又說："整个語言机構都是在同一和差別上旋轉的，差別只不过是同一的反面"。同一旣是差別的反面，它不就是"肯定的成分"了嗎？这显然是不能調和的。

叶勒姆斯列夫在前引文中一方面强調了索緒耳的語言是純粹价值系統这个概念，另一方面又强調了語言符号的表区別的性質。他認为索緒耳的意思是說，一种語言的事实不是由純語音或純字体来决定的，而是借助于相互关系的記录；意义單位也不是由純語义来决定的，而是同样借助于相互关系的記录。他所說的"意义單位"和"純語义"是什么意思？这一点还需要解釋。但是他举出字母做表区別單位的例子确实可以消除許多誤会。字母就是代表声音的形体，它有一个特殊的形式，使人能够把它区別于其他字母。但是一个字母，比方 a，也必定是一个"肯定的成分"，人們看見它，記着它的形象，以后就可以把它跟其他的 a 等同起来。

索緒耳在«普通語言学教程»中說："詞中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声音差別，这些声音差別使人能够把这个詞区別于其他的詞，因为帶有意义的就是这些声音差別"(169頁)。就"区別"的原則說我們上面应用于字母的也可以应用于声音。但是我們应該加上一句，在許多情况下，使我們能够了解詞的意义的不是声音差別，也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上下文，例如許多同音詞就是这样。

語言学中大量采用对立、交替和詞以及形式的对应的原則。沒有这个原則，印欧系語言的形态学差不多就是不可理解的。所以这个問題值得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

語音交替在詞形的功能中能起一些什么眞正的作用呢？这个基本的問題看似簡單，实則不然。例如波蘭語 kot(貓)是主格的形式，kota 是屬格的形式，kota 的詞尾-a 是屬格的表区別的特征，它跟主格的零詞尾相对立，这是最簡單不过的。一个要素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形式的表区別的特征，它必須是可以互相替換的，几个形式所共有的要素就不能成为其中任何一个的表区別的特征。这是誰也不会反駁的。但是比方波蘭語 brać(拿)这个动詞，它的第一人称單数現在时的形式是 biorę(我拿)。我們要确定它的表区別的要素，必須把它跟另一个形式比方第二人称的形式 bierzesz (念作 b'ežeš)相比較。这能够告訴我們些什么呢？从这个形式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到每个形式的表区別的要素：biorę 和 bierzesz 的区別是在于 1) 詞尾-e 和-esz 相当，2) 輔音 r 和 rz(ž)相交替，3) 动詞詞根的元音 o 和 e 相交替。我們可以相信这兩个形式中每一个的語法价值都是由这样复杂的輔音和元音交替决定的嗎？biorę 这个形式有一个眞实的意义"拿"，它显然是一个"肯定的成分"，这"肯定的成分"經受了这个詞在历史上所遇到一切語音"变迁"而保存着它的价值，結果弄到 biorę: bierzesz 这兩个形式唯一共有的要素只是一个詞首的輔音(顎化 b)。这个詞的眞实意义并不因語音变化而受到影响，它抗拒了音位的分化作用。只有对这段历史一無所知才会把 biorę 这个形式的語法价值归結为音位的互相关系：-ę(: esz)，-r-(: rz)，-o-(: e)。波蘭語 biorę 这个形式其实是由古共同斯拉夫語 *berę 变来的。*berę 和 biorę 这兩个形式間的差別——那是由語音变化来的——不足以改变 *berę 的原始意义，我們必須估計到这个历史的傳統，因为它比把語言比之于"一种只有很复杂的成分的代数"(175頁)更能使我們了解这語言的現狀。

用共时語言学的观点可以使我們建立 biorę: bierzesz 这兩个形式的相互关系，用历时語言学的观点可以使我們看出共同斯拉夫語 *berę 这个形式和波蘭語 biorę 这个形式的功能是相同的，把这兩个观点混同起来是不正当的，值得我們坚决反对。但是把共时語言学和历时語言学截然划开也是不正当的。假如說共

时語言学表明的是一种語言的狀态，历时語言学表明的是它的进化面（120頁），那么我們可以看到一种語言的狀态永远不过是它的进化面罢了，这我們相信是很容易和自然的。索緒耳在《普通語言学教程》中屡次把語言比之于下棋。当然，我們看人家下棋，最关心的是当前的棋局，而不管这些棋子在十分鐘以前情况怎样，但是我們不能說“这也可以同样应用于語言”而把历时語言学和共时語言学截然划分开来。假設有一个人完全不了解波蘭語的历史，他看見波蘭語 kat（劊子手）的复数是 kaci 而 brat（弟兄）的复数是 bracia 很感兴趣，我們为了要使他了解这兩个形式的关系，除了向他解釋 bracia 这个形式是一个古代的陰性集体数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但是說到“古代的”，我們就要涉及历史，并且我們無論什么时候要使人了解什么是决定語言形式的用法的“規則”，都是不能不这样做的。解釋就常要涉及历史。索緒耳在《普通語言学教程》中把語言說成是“一种純粹价值的系統，它不取决于它的成分的一时狀态以外的任何东西”（119頁）。可是一时的狀态永远不能“越过它的以前的狀态”，并且是这些以前的狀态决定了这一时的狀态。他把共时語言学的观点和历时語言学的观点絕对对立起来，所得結果是足令人惊奇的。

在索緒耳的观念中，有一个概念是跟語言实体有單純表区別性質这一原則根本不相容的，那就是符号的任意性。所謂任意就是不由語言形式的相互关系产生而直接跟被表示者有关的意思。这就語言符号和它的被表示者間的关系来說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进一步說：“这些完全任意性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現符号学过程的理想”（103頁），“整个語言的系統依靠于符号的任意性这一个不合理的原則，这个原則無限制地应用起来将会弄到極端的复杂，但是精神能够在全部符号的某些部分引入有次序和有規則的原則”（189頁）。符号的任意性这一原則是否能表現实現符号学的理想或引起混乱的傾向呢？对索緒耳說来，最可以作为特征的是他認为有次序和有規則的原則不是由有規律的客观現实表現而是由精神表現的。

說到符号的語言系統，我們不能不弄清楚索緒耳所說的符号是系統的基本要素是什么意思。他在討論到这个問題的时候首先認为不能把語言看成是“一張跟同样多的事物相当的成分的單子”（99頁）。語言不是客观現实的一个簡單的抄本，就这个意义上說，他这句話無疑地是正确的。但是語言也不是一种集体的幻覚！假如認为語言表現的只是人們的精神狀态，跟客观現实毫無关系，語言不是集体对这現实的呼声的一种“回答”，那么語言就只能是集体的幻覚了。

此外，索緒耳还强調說：“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声音形象”（100頁），語言的符号是一种“兩面性的心理实体”（同上），一面是概念，另一面是声音形象。概念構成被表示者，声音形象構成表示者（101頁）。这样一来，符号的兩面——概念和声音形象——就只能是一些心理事实了。但是心理事实，意識事实怎能就是語言事实呢？詞作为符号，就構成了意識和客观現实要素間的联系，而这客观現实却是在意識之外的。比方我們說“树”这个詞是一个符号，那是因为它跟一切眞实的树有关，反过来說，一切眞实的树就是“树”这个詞的被表示者。我們分析一个詞的意义时不能只考慮它的內容而不估計到它的外延（即应用）。关于詞的內容和外延，即它的“价值”和使用的問題毫無疑問就是語义学的中心問題。可是索緒耳在他的《普通語言学教程》中对于“內容”和“外延”这兩个术語連提都沒有提到。

在索緒耳看来，詞作为一个單位不是由它跟客观現实要素的关系来决定的，而是因为它在整个語言中是一个表区別的要素。他說：“語言不是一个預先划定的符号的整体，如果是这样，我們只研究它的意义和安排也就够了；它是一团模模糊糊的东西，只有注意力和習慣才能使我們在那兒找到一些特殊的要素。这單位沒有任何特殊的声音的性質，我們可能給它下的唯一的定义是：一段音响，这段音响在語流中和它前后的音响分隔开来，它是某一概念的表示者”（150頁）。这个定义是相当混乱的，他似乎不是就語言而是就言語来給詞下定义，而最可以作为特征的就是語言中这“一团模模糊糊的东西”跟外部現实毫無关系。这就是索緒耳的方法論的主要特点。

索緒耳在他的《普通語言学教程》中不仅要拟定語言学理論的原則，并且要把它作为一种符号的普通理論的基础，他提議把它叫做“符号学”。这門科学的目的就是要教我們知道“符号是什么，它的規律怎样”。他虽然很謙虛地說：“因为它还不存在我們不能說它將是什么。”但是他已很肯定地說到：“符号学的正确地位將由心理学家来决定，假如我們第一次已經能够在科学中給語言学指定一个位置，那是因为我們已經把它跟符号学联系起来了”（34頁）。

很显然，索緒耳的所謂符号学將是一門以符号系統为研究的科学。所謂系統就是由某些用确定的关系联系起来的要素構成的整体。由数字單位構成的系統，即数学，似乎最能表現这种关系的性質。

但是大家都知道，数学的符号系統和語言的符号系統，性質是不相同的。数学的符号系統是一种“純粹价值的系統”，而語言的符号却不仅有它的价值，并且有它的功能，那就是說，一个語言單位不仅因为它跟其它單位發生关系而有它的价值，并且因为它跟被表

示者發生关系而有它的功能，而这被表示者却是在系統的范圍之外的。被表示者和概念不完全相同，但是詞应該就它表示客观事物的意义去了解。符号有自主化的自然傾向，因为它的存在不是依靠于作为系統的一部分，而是依靠于被人用来作为他的意識和外部現实要素間的联系。“价值”和“功能”之間常起斗爭，在这个斗爭中胜利的不是“价值”而常常是“功能”。在索緒耳的《普通語言学教程》中占統治地位的是价值的概念。詞的意义內容是一个价值，符号的功能是它的表区別的价值，所以他給語言下的定义是“貯藏在所有个人中的語言观念的总和”(31 頁)，这样一来，語言就只是一种“純粹价值的系統”，不为任何外在的因素所影响或“干扰”，因为这个系統不取决于“它的成分的一时狀态以外”的任何东西。这样把历时語言学和共时語言学、过去和現在絕对地割裂开来，不独系統的發展的解釋成了一种“造作的”假設，而关于語言的变迁和分化的問題也全部留下了。

显而易見，在上面分析过的这些概念的范圍內，关于語言系統內部結合力和决定它的分化和發展的因素間的关系这个問題不仅無法解决，并且也是無法討論的。为了要走出这条死胡同，唯一的出路只有研究言語事实。索緒耳在《普通語言学教程》中認为“發展事实和靜态事实”間有个根本矛盾，但是沒有設法克服这个矛盾，只簡單地承認“語言中一切历时的只存在于言語中。在言語中可以找到一切变化的萌芽”(142 頁)。

言語事实大規模的研究并且估計到这些事实在地理上的分布就是方言学。方言学家中看到方言学和普通語言学間的关系的首先是戈沙。在他看来，方言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發現个人在語言發展中所起的作用。現在試就波蘭語方言中举出一个例子来說明这个問題。

大家知道波蘭語輔音系統和法語或英語和德語的系統不同，主要是在于它的大多数的輔音都分顎化的和非顎化的兩組；这兩組輔音之間是有相互关系的。所謂“相互关系”跟語音学有关，也跟形态学有关：例如顎化 p 和硬 p 不同，因为發这个音时舌面前往硬顎抬起，另一方面，这兩个 p 的不同，一般認为是某些語法形式的表区別的特征：stopa(脚)是主格的形式，stopie(pi 表示顎化 p)是与格和地方格的形式。

但是这相互关系的原則不是对任何輔音都可以应用的，例如舌根輔音k和g可以看語音的环境念成硬輔音或顎化輔音。主要的是在波蘭語語音系統中，k:k', g:g' 的交替不能跟其他这一类的輔音交替等量齐观。walka(斗爭)，droga(路)是單数主格的形式，walki, drogi 是屬格的形式，在这兩个形式里，k 和 g 都念成顎化音。但是这跟上面所說的 p':p 的交替不同，因为 p':p 的交替在 stopie:stopa 这些形式里有一个表功能的(附加的)性質，是不庸置疑的；而 walki, drogi 却由古代 walky, drogy(在这兒 k 和 g 是硬音)变来，那只是历史变迁的結果，已失去它的表功能的性質了。

元音 a 之前的 k 現在波蘭标准語里是念硬音的，但是在許多从前东普魯士省地区的方言中却搖擺于 k' 和 k 之間。作者就西部和南部六个地区(即2、4、7、8、9、10等地区)所調查的材料統計得到以下的結果：

2. k'a:ka=76%:24%	4. k'a:ka=59%:41%
7. k'a:ka=67%:33%	8. k'a:ka=63%:37%
9. k'a:ka=72%:28%	10. k'a:ka=67%:33%

就这个表来看，在这些地区里，a 前的 k 念 k' 的比念 k 的多，但是“念硬 k 音的傾向”是逐步發展的，結果將跟波蘭語的标准音相一致。由顎化 k 音过渡到硬 k 音，那就是發音时舌的后部和軟顎接触的部位縮小的結果。什么因素使得这个發音部位縮小呢？就今天来說，那無疑是因为受了标准語的影响。这对那些方言区的人来說是一个外因。但是在一种語言的語音变化中，除了这些帶有社会性質的外因外，显然还有它的內因，这是跟那語言生命的生物学要素有关的，我們固然不应該把它估計得太高，但是也不能忽視。語音为什么發展，我們現在还不知道，但是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它是怎样發展的。方言学作为一种有組織的言語事实的研究是可以使我們看到它是怎样發展的。

所以我們应該用历时交替(变动)的观念来补充这傳統的共时交替的观念。这种观念假如还不能使我們知道語言發展的原因，至少已能使我們明白它的机構。这种机構其实是很簡單的：变化往往由一个均衡狀态的分裂开始；那些由它們的原始的“引力中心”分离出来的要素，經过一个时期的动搖之后，于是一个新的均衡建立起来了。这种变动像潮水的退漲一样，是永無止境的。各种按比例参加到这种变动的要素的变化就構成这由旧狀态过渡到新狀态的过程。把这种定量分析方法有效地运用于言語事实的研究，不仅仅是共时語言学的事情，它还可以提供許多有关語言史的文献。

* * *

索緒耳的語言学理論和由这理論發展出来的語言学結構主义是近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国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学說。这种学說的最大錯誤是把語言理解为一种純粹关系的符号系統，否定了語言要素和客观現实的联系，并且特別强調語言靜态分析的研究，忽視了历时語言学的作用。多洛舍夫斯基教授的这篇报告不仅揭露了其中許多互相矛盾的地方，并且以有力的論証批判了其中的錯誤观点，是很值得細細玩味的。

这篇报告关于方言地理学研究說得不多，只举出波蘭語方言一个語音發展过程的实例来說明方言地理学可以帮助我們研究語言的历史。我們通常說語言随着社会的發展而發展，这無疑是正确的。但是社会的發展对于語言的發展其实只是一种外因，語言的發展除这种外因之外有沒有它的內因？語言發展的內因是什么？这篇报告里曾提到这个問題，但是并沒有回答这个問題。

关于設計和制造信息机器的会議

苏联 И. 梅里楚克

1957年5月28—31日,莫斯科举行了一个科学技术会議。这个会議是由苏联科学院电模型实驗室組織的,它的任务是討論有关設計和制造大量具有長久記忆的信息机器的問題。制造專用的信息机器和翻譯机器,提出了一个如何記載、保存和改造科学信息的共同問題——即与各种語言学題目有密切联系的問題,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参加会議的除了数学家和工程师以外,还有邏輯学家、普通語义学專家和語言学家(共有500多人,代表90个不同的單位)。在十三次会議(三次全体大会,五次技术小組会,五次一般理論小組会)中作了50个报告和通訊。这里將提到的只是一些主要的报告,無論是一般的語言学家或是專門搞机器翻譯的語言学家都会对它們感到一定的兴趣。

Л. 顧藤馬黑尔教授在«以具有大的內部記忆的信息机器对腦力劳动的某些过程所进行的电模型化»的报告中,描述了电子机器的可能性:它的記忆容量实际上是無限的,运轉速度非常快,能完成非常复杂的邏輯运算,等等。但是要想利用这些技术可能性,邏輯学家和語言学家就必須預先解决所謂"信息語言"(用这种語言記載机器所需的信息)的建立問題以及这种語言和其他各种現实語言(人們用来記載科学信息的那些語言)的关系問題。

电模型实驗室的高級工程师 Л. 莫黑利提出了一个龐大的自动詞典的設計方案。

苏联科学院实用数学室的研究人員 Э. 柳必姆斯基、С. 卡墨宁和 М. 菲利波娃报告了机器自动地閱讀符号的一些原則;他們并为"Стрела"电子計算机制定了閱讀拉丁字母的程序。自动閱讀大大地便利了信息的輸入,另外还可以在印刷厂里来自动檢字。

电模型实驗室的工程师 Л. 列文斯基的报告里講的是:把印刷的文章改造成有声語言的自动裝置。

实用数学室的 А. 李阿甫諾夫教授在«机器翻譯中的一些共同問題»的报告中指出:机器翻譯的一些最初的試驗已經可以容許人們做一些概括工作了。在繼續为一种語言譯成另一种語言編制形式規則系統的同时,应該拟定这类系統的一般的形式規則(即对翻譯运算① 的建立过程本身加以运算化)以代替在每个个别情况下的那种經驗主义的探索。这樣可以"教給"机器"学会"利用兩种語言的平行材料和早已准备好的詞典独立地制訂翻譯規則。因此应該力求制定出那些最大限度概括出来的語言形式分析法。

实用数学室的庫拉吉娜叙述了一种語言形式分析法。她提出了一个理論-多数的概念(теоретико-множественное понятие)系統,这种系統可以在語言中分立出作为一些等价物类别的詞群(类似詞类)。

莫斯科大学的 В. 伊万諾夫在談到給信息机器建立机器語言的一些語言学問題时候,提出,建立这樣一种抽象語言可以使用下列方法:1)为各个科学部門分立出專業"語言",2)为各种現实語言建立簡化的假定的模型。必須特別注意語义方面。抽象語言的語义应該被縮減成一套最少的極簡單的成分(所謂"語义乘数"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множители)。同时还可能是这样:在由具体語言向信息語言过渡时可以实現的不是逐字翻譯,而是省去多余課文的概括叙述。

莫斯科大学的物理数学副博士 В. 烏思宾斯基作了信息語言建立工作中的数理邏輯問題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調了作为一門实用科学語言学的意义。

苏联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的化学副博士 Г. 富乐杜茨和电模型实驗室的研究人員 В. 苏、Н. 叶尔莫拉耶娃及 Ю. 石汉諾維奇等人报告了他們如何为化学和几何学制定各自的信息語言的情况。

В. 苏和 Д. 拉胡奇(电模型实驗室的研究人員)的發言談到了对信息語言的一些語义学要求的問題,电模型实驗室的 И. 謝利莫娃的报告講的是信息机器的詞彙代碼化系統。

实用数学室的 Г. 契柯娃报告了他們在"Стрела"电子計算机上所进行的一些由法文譯成俄文的試驗(翻譯的是数学文献)。

下面的样品是由机器完成的一些最初的譯文:

1) Nous partagerons ces intégrales en deux catégories différentes

   譯成俄文是:Мы разделим эти интегралы на две различные категории.(我們把这些积分分为兩种不同的范疇。)

2) Les relations que nous avons trouvées entre les racines et les coefficients d'une equation conduisent assez naturellement a l'étude des formes symmétriques.

   譯成俄文是:Соотнош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мы нашли между корнями и коэффициентами уравнения,

---

① 这个术語是从数学領域中借来的。在数学領域中这个术語标記一个基本的数学概念:"任何按照严格規定的規則而完成的計算的系統,只要經过若干步驟显然会解决所提出的算題",那么这样的系統就叫作运算(алгоритм 或 алгорифм)[見苏联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二卷65頁]。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音档

在1910年，捷克語言学家汝巴第(Zubatý)就开始主張要建立一个音档，他曾建議前"捷克科学及艺术研究院"利用留声机来紀录捷克方言。但是那时的工具不太令人满意，因此一直进行得很慢。第一次大战后，由汝巴第的学生赫龙斯基(Chlumský)繼續进行。直到1928年10月31日，科学院召集了一个录制唱片委員会，其中有这几位教授：費歇尔(MM. Fischer)，赫龙斯基，賀拉克(Horák)，汝巴第和斯美但卡(Smetánka)。同年的12月14日，这个委員会所訂的計划被批准了。內容如下：

1) 录音制片工作由法国百代公司以优先承办，請巴黎的語音研究所主任伯諾特(M. Pernot)代为接洽。

2) 1916年的計划只包括捷克方言，現須加以扩充，以便能包括全捷克境內的各种語音現象特点，例如：a)方言，b)民歌与民間音乐，c)作家自誦的詩篇，d)戏剧，e)政治人物的演講等。

3) 本計划由科学院的有关部門負責执行，由委員会襄助。其工作分配如下：

a) 方言　負責人：斯美但卡(M. Smetánka)
　　　　合作人：哈伏拉奈克(M. Havránek)——捷克方言。
　　　　　　　　瓦希尼(M. Vážný)——斯洛伐克方言。
　　　　　　　　班尼格維契(M. Paňkevič)——下喀尔巴阡山地区方言。
　　　　　　　　巴达(M. Páta)，——塞尔維亞方言，在德国的高魯薩則和低魯薩則部份。

b) 民歌　賀拉克(Horák)——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和西列西亞地区，与齐赫教授(Zich)合作。
　　　　阿莱尔(MM. Orel)和布里茲卡(Plicka)——斯洛伐克地区。
　　　　班尼格維契(M. Paňkevič)——下喀尔巴阡山地区
　　　　巴达(M. Páta)——魯薩則地区

c) 作家自誦詩的节目由詩人格拉希特斯基(Klášterský)拟訂。

d) 捷克戏剧由費歇尔(M. O. Fischer)担任。歌剧，特别是史美塔那的作品，由奈叶得里(M. Z. Nejedlý)担任。

e) 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的講話，由科学院担任。

由于上述專家們的合作，科学院因此能搶救出不少在当时很有价值的而瀕于消灭的資料。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关于东部的，資料都由斯洛伐克供給。所保

приводят достаточн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к изучению симметрических форм. (方程式的根和系数之間的关系很自然地会引起对称式的研究。)

3) Cette transformation pourrait s'effectuer par les calculs relativement simples, en appliquant la remarque suivante.

譯成俄文是：Это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может осуществитьс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ростыми вычислениями [исчислениями], применяя следующие замечания. ①(可以用比較簡單的計算来实現这种变換，不过要注意以下几点。)

电模型实驗室的 A. 舒米尼娜和 З. 瓦洛茨卡婭，莫斯科国立外国語师范学院的 И. 列夫金，实用数学室的 T. 馬楼施納婭，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的 И. 梅里楚克，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 M. 薩弗龙諾夫等人就关于通訊目的(俄文)以及机器翻譯目的(德文、英文、匈牙利文、汉文)所需要的那些具体語言的形式分析法作了报告。

从整个来講，会議显示出：电子学技术的發展和它的使用范圍的扩展，向語言学提出了一些重大的要求。因为音位和句法分析的方法、內容設計等理論問題研究不好，就不能解决信息和翻譯机器所提出的一些純实际的語言学問題。語言学家和数学家及技师的合作告訴我們：这項工作要求語言学家求得明晰和首尾貫徹的思維，严格确定的概念，以运算方式对待語言現象的描写。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問題——把語言学發展成为一种精密科学，广泛利用数学和数理邏輯的方法和仪器("数学語言学")。

会議的决議上說：开展数学語言学和机器翻譯的研究工作，以及及时和經常發表研究成果，对于苏联科学和国民經济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需要創办一个專門的出版物(类似美国的《机器翻譯 Mechanical Translation》杂志)，在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組織一个研究这个問題的小組，在大学語言系中培养这方面的專家。(刘湧泉譯)

① 現在所給的譯文正是机器翻譯出来的那个样子。

存的最好的材料是傳統的古老資料①。同时，西部的許多民間艺术已漸趋于消灭，特别是波希米亞森林中的音乐和歌唱，也都保存下来。

科学院向百代公司訂購这些音档唱片，每种十份，外加金屬負片一份，以备將来这些音档唱片唱坏时还可重新复制。②

在此以后，科学院也繼續进行了工作。在1933年完成了39种音档，包括摩拉維亞和西列西亞的方言和民歌。次年(1934)，完成的比較少，只有11种，內有9种是方言。这时的录制工作由布拉克的爱斯达(ESTA)公司担任。

1935—1950年之間沒有进行录音。

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音档中，現在保存的有：

1）捷克民歌，摩拉維亞民歌和斯洛伐克民歌。有时有些原始材料。例如：古老的春日之歌，这是以前在把死神(Smartka)送出村外去燒的时候唱的；还有許多古老的歌，关于結婚、年初一、聖約翰节、复活节等；守夜人之歌；关于亞諾希克（Jánošik）的歌，他是一个斯洛伐克的有势力的貴族英雄；关于日波衣尼克人(zbojnik)的歌，指的是亞諾希克的战友們；古老的抵抗土耳其人的战歌；工人之歌；丰收歌；山民之歌；牧羊人的歌；新兵之歌；搖籃歌等等。这些歌都是男子和女子的独唱或合唱。値得注意的是一种"科得斯"的歌(Khodes)，这是古时巡邏在捷克—巴發利亞边境的守衛者，他們的旗帜上有个狗头記号。

2）民間音乐：所选的都是斯洛伐克乐曲，有些是一个乐队的演奏，例如米亞伐(Mijava)，有些是来自民間的乐器演奏(笛、横笛、風笛等)。还有科得斯的舞曲，是一个混声合唱，由兩个小提琴、一个黑管和一个風笛伴奏。

3）艺术家的合唱歌曲，由摩拉維亞声乐队和史美塔那合唱团演唱。

还有艺术家所作的乐曲和歌曲(史美塔那、德沃夏克、苏克、亞那歇克等作品)。还有一些軍歌。

4）很大部分的录音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方言，这里录的是关于青年紀念和个人紀念等；很多是关于农民的，描写一个乡村的节日，兩人对話，或許多人座談；旱灾的故事，火灾的故事，家乡的事，征兵，大齋节，一些特殊新聞，結婚的風俗，神話，等等。

5）詩和散文选，由作家自己或演員誦讀。

6）政治、文学、科学方面的人物的言語、演說和交談。(以上共500余張)

到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科学研究院組織成功，③就把音档部分划归語音研究室（主任是哈拉 Hála 教授，他同时也是查理士大学的語音系主任），成为科学院捷克語言研究所的一部分（研究所主任是哈伏拉奈克院士 B. Havránek）。从那时起，就改用新方法录音。此后的录音工作，就由語音研究室的同人担任，使用录音鋼絲或磁帶。④ 他們帶着录音机分区作有系統的調查录音。这些鋼絲或磁帶的录音，回来后經过整理分类，把內容用通行字母或音标記下来。挑选有代表性的材料轉录到唱片上，作为音档，其余的就留在鋼絲或磁帶上作为資料。

在目前，他們正从事于記录波希米亞地区的捷克方言，来补足以前工作的空白点。

現在由語音研究室技术人員为这項工作所置备的器材有：

1）大型磁帶录音机一套，实驗室用。

2）手提鋼絲录音机和手提磁帶录音机各一架，調查工作用。

3）各种放音設备，包括唱机、無綫电收音机、全音扩音机等。

4）声譜分析仪。

目前，語音研究室还沒有唱片灌音机，这項工作是請大学的語音系协助的，他們的灌音机是瑞士安倫斯公司(Thorens)出品。

語音研究室的科学研究人員，充分利用了这些材料作語音学方面的研究。他們和捷語研究所的方言組、查理士大学的語音系、科学院的人种及民俗研究所密切合作。

在最近將来，語音研究室的技术方面的研究將要大加扩展。

（吳宗济寄自布拉格）

---

① 大部分組織工作由斯美但卡担任，他那时是科学院第三部的秘書，計划由赫龙斯基起草。布拉格無綫电杂志捐款二万法郎，并免費供給地方、电力和录音助手等，当时的警察局長并派出兩位警察隨同在路上保护。

② 总費用二十万法郎，包括百代公司的金屬負片，电气录音和来捷工作等費用。

③ 在这时期以前的科学院称为"捷克科学及艺术研究院"，改組后不包括艺术部分，只称"捷克斯洛伐克科学研究院"。

④ 关于录音机械的常識，讀者可参考本刊1954年11月号周殿福：《介紹几种簡單的語音学仪器》——編者。

更正： 1957年11月号29面左欄12行"作为暱称"应删；30面24行"ia˧˦"应作"ia˥˩"；31面右欄倒2行"Kɛ"应为"Ke"。12月号20面右欄3行"它兼"应为"它还兼；21面右欄12行"一样"后应加逗号，22面右欄倒19行"語»的这种"应为"語»的，这种"，23面左欄倒12行"代理看"应为"代理着"，24面右欄15行"此当种甘橘"应删去，34面倒10行"12月"应为"11月"，35面左欄16行"構詞能力很强"应为"也有構詞能力"。

近年来朝鮮語言学的發展情况*

朝鮮　宋瑞龙

朝鮮的語言学在發展过程中受到了苏联先进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很大的影响。1946年設立的金日成大学朝鮮語言文学教研室，1947年設于金日成大学的朝鮮語文研究会等，是解放以后研究朝鮮語言学的第一批机構。

朝鮮語文研究会为了朝鮮民族唯一的民族語——朝鮮語的进一步規范和純潔，为了廢除汉字和制定跟文字改革有关的科学的正字法，付出了很大的力量。1948年1月，發表了«朝鮮語新正字法»。这个"新正字法"是徹底地根据形态-音位学的原則制定的。它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例如：汉語詞詞头(*r*)，(*n*)的标記問題；①标記合成詞使用隔音符的問題；拟定了六个新的、使用于形态学語音交替場合的字母等等。

1948年10月，共和国政府决定把"朝鮮語文研究会"設在教育省(部)，幷准备在1949年末出版朝鮮語語法和朝鮮語辭典，这个决定是从解放了的朝鮮人民对自己祖国語言的語法和辞典迫切要求出發的。編纂祖国語言的語法和辞典的工作，在文化革命的广泛綱領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要在很短的时間內，完成編纂語法和辞典的工作是比較困难的。可是，由于語言学者們的集体努力，到了1949年10月，«朝鮮語辞典»的底稿就已定稿付印，后来，美帝国主义者向共和国北半部發动了突然的进攻，这个工作就不得不中断。1949年12月出版了«朝鮮語語法»。这本語法是在先进的苏联語言学理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过去朝鮮各种語法書籍的經驗編制而成的。書中对现代朝鮮語語音構造，特别是形态学方面的有关詞兒的理論、詞兒的結構，以及对一部分詞类的研究、語法范疇的观察，等等，都比过去的語法書有了显著的进步；文章結構方面的研究总的說来也很完整。这本語法对解放后研究现代朝鮮語語法給以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本語法書当中，由于运用了一些还沒有付諸全民实踐的新文字，結果就造成了理論方面和实踐方面还有若干脫节的地方。

1949年4月，朝鮮語文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朝鮮語研究»的發刊，是解放后朝鮮語言学發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这个杂志形成了全国語言学思想的中心，团結了共和国北半部最負盛名的語言学者們；發表了研究朝鮮語的成果、一般語言学的論文、語言資料、問題解答以及有关研究正字法和文字方面的論文。

朝鮮語言学者以苏联先进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武裝自己的过程中，«朝鮮語研究»發揮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年青的朝鮮語言学者們决心尽可能快地向苏联学者学習到更多的东西。苏联語言学者們关于語言的本質、研究語言的方法、語言的構造、語言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朝鮮語言学的理論和实踐的基础。

同时也有必要指出存在于杂志編輯工作中的一些缺点。作为一个杂志，絕不是仅仅把工作停留在單純地搜集刊載介紹語言学家的研究成果上面，而是应該很现实地向語言学家提示朝鮮語言学向他們要求什么、他們应該从什么地方着手和如何地安排自己的研究工作。当时摆在朝鮮語言学面前的中心工作是編制现代朝鮮語語法和編纂辞典，然而，杂志發表的大部分重要研究論文，矛头却指向古代，部分論文轉向了古語語句的解釋上面。

1950年苏联展开的关于語言学的大辯論，对朝鮮語言学的發展来說，也是一个关鍵。它为朝鮮語言学开辟了一条能够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創造性地解决語言科学上一切复杂問題的道路。这个时期正值朝鮮人民进行祖国解放战爭，虽然如此，朝鮮語言学家們仍然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关怀下进行了有关語言学的大辯論。經过这次辯論以后，他們才有可能在苏联語言学所达到的一般理論成就和本国語言学傳統的基础上，对朝鮮語的語法構造、詞匯結構和基本詞匯、朝鮮語的內部發展規律、全民語法和方言的关系、民族語的形成等等問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随着共和国科学院的成立，朝鮮語文研究会改組成为科学院語言文学研究所。这是有組織地团結和动員全体朝鮮語言学者的全部力量以便發展朝鮮語言科学的創举。

科学院的«学报»几乎每期都發表跟語言学有关的論文，主要部分是从斯大林的关于語言学的著作看朝鮮語言学的各种問題。也刊載了一部分关于朝鮮語历史研究的有趣的論文。«朝鮮語研究»的停刊到科学院語言文学研究所的«朝鮮語文»創刊期間，科学院的«学

---

* 按本文作者是朝鮮文字改革委員会常务委員，原文發表在«朝鮮語文»1957年第6期。为了明确节譯內容，原題目有所改动——譯者。

①朝鮮語詞匯中的汉語詞，詞的开头音是"*r*"或"*n*"的有变讀的現象，随着韵母性質的不同，"*r*"有时念成"*n*"或作零声母，"n"有时也作零声母。如"rotong 劳动"念成"notong"，"ryənkye 連系"念成"yənkye"、"nyətsa 女子"念成"yətsa"。

报»一直是朝鮮語言学者發表著作的唯一园地。

«朝鮮語文»是1956年1月創刊的，它的基本任务是：提出朝鮮語言、文学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广泛地組織和动員全体学者共同解决目前語言、文学的各种問題，总結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科学成就，并把研究的結果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

«朝鮮語文»在进行朝鮮語純潔化和朝鮮文字改革这兩件巨大的、全民性的工作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兩件工作是朝鮮人民的語言、書写生活中提出来的現实要求，还有待我們全体語言学者們的努力。此外，在介紹兄弟国家的朝鮮語学者們的論文的工作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介紹了О. П. Петрова的«俄国和苏联研究朝鮮語历史梗概»，郑之东的«朝鮮的文字改革»，Л. Р. Зиндер的論文«朝鮮語母音»，等等。与此同时，«朝鮮語文»还把系統地介紹和研究各兄弟国家的語言学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曾經刊載了«现代苏联語言学的几个現实任务»、王力的«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А. Граур的«罗馬尼亚語言学的發展»等文章，在加强我国科学界和国际間的联系上，作了很大的貢献。

1956年10月，在科学院內成立了"朝鮮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这是我們民族文化建設中的一件大事。自从1443年朝鮮人民創制了值得在世界文字史上自豪的、組織体系十分科学而系統化的自己的特有文字——«訓民正音»以来，它就在我們朝鮮民族文化的發展过程中，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在封建制度統治下的朝鮮，崇拜和無限制地使用汉字，大大地限制了我們的固有的朝鮮文字的發展。

这个事实和迅速前进着的新文化的需要与發展，提出了在国内进行文字改革的必要性。朝鮮文字改革的創始者是周时經先生，① 他强調过我們的文字必須改成新的字型进行横写，同时主張，要使朝鮮語的正字法更加符合于朝鮮語的形态結構，把我們的正字法基本上建立在形态原則的基础上。可是，当时朝鮮語言学發展的主观客观条件受到了限制，他的关于文字改革的思想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对朝鮮文字改革的研究，其后仍在一些朝鮮語言学者中間进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殘酷鎮压下，这項研究一直沒有中断过。

語言学者們經过長期的努力，«朝鮮語小辞典»終于在1956年12月問世了。这是一本确定現代朝鮮标准語的詞兒的詞义及其使用規范的最重要的注釋辞典。这本辞典回答了朝鮮社会的現实要求，它的詞兒解釋基本上是正确地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的，正确地反映了科学的同时也是全民的要求。在搜集詞兒当中也很完整地反映了現代朝鮮标准語的現狀，特别还广泛地搜集了"八一五"解放以后全体人民广泛使用的詞兒和表达手段，去掉一些最近以来从詞匯構成中消失了的消極的、陈旧的詞；具有地域方言性質的詞兒、特殊的專門用語，个別的或者地方色彩很濃厚的象声詞等等都不在搜集之列。同时，在有关正确使用現代朝鮮标准語中的詞兒、正确組成詞的形态、正确的發音以及正确标記詞兒等問題上，也做得十分出色。当然这本辞典也不是沒有缺点的。因此，在朝鮮的辞典学者面前，还摆着一樁如何使这本辞典更臻完善的任务。

此外，«中型辞典»的編纂工作，現在巳在进行。

現代朝鮮語的科学研究，历經了半世紀以上的时間，巳經获得了許多有价值的成就。在此期間，有一条紅綫貫穿于我国先进的、爱国的朝鮮語言学者們的全部科学著作当中，显著的特征是他們都热烈地致力于提高我們的民族語——朝鮮語在文化中的作用和进一步使它走上規范化的工作。朝鮮語言学者們积極努力地从事朝鮮語的进一步規范化工作，是随着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民族意識的成長开始的。随着以工人阶級为中心的民族解放斗爭的急劇高漲，語言学者們也以同样的步伐，更加有力地展开了作为反日爱国斗争的一个环节的語文一致运动。之后，团結在朝鮮語学会的先进朝鮮語言学者們，在建立朝鮮語語法、發行朝鮮語辞典、統一朝鮮語正字法、审定朝鮮标准語等工作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对現代朝鮮語的規范化有很大的貢献。

現代朝鮮語的完全規范化問題是朝鮮語言学者們的基本任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須堅决地把朝鮮語言学建立在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的基础上，同时有重点地广泛吸取各国先进的語言学理論，从語言历史的發展中，掌握和分析具体的朝鮮語的資料。

目前提出来的研究朝鮮語的基本方向有下列四項：1)研究現代朝鮮語。2)研究朝鮮語的历史發展。3)調查和研究朝鮮語方言。4)朝鮮文字改革。这些問題对于現代朝鮮語的进一步規范都是必要的，也是朝鮮語言学發展过程中提出来的基本問題。这些問題的一部分是互相交叉着的，为了能有效地解决它，科学院語言文学研究所的語言学研究室、辞典編纂室，金日成大学的朝鮮語言学教研室和各大学的朝鮮語言学教研室、朝鮮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以及学术用語审訂委員会等部門必須紧密联系和集体合作。依靠这些科学研究部門的共同努力，今后的兩、三年內，«朝鮮語中型辞典»、«朝鮮語規范語法»、«学术用語統一方案»、«外来語标記法»、«朝鮮語正字法»，等等，可望發表。

（周时龙节譯）

①周时經（1878—1941年）是朝鮮著名的語言学家。有«国語文典音学»、«国語文法»、«語言的發音»等著作。

近年来朝鮮語言学的發展情况*

朝鮮　宋瑞龙

朝鮮的語言学在發展过程中受到了苏联先进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很大的影响。1946年設立的金日成大学朝鮮語言文学教研室，1947 年設于金日成大学的朝鮮語文研究会等，是解放以后研究朝鮮語言学的第一批机構。

朝鮮語文研究会为了朝鮮民族唯一的民族語——朝鮮語的进一步規范和純潔，为了廢除汉字和制定跟文字改革有关的科学的正字法，付出了很大的力量。1948 年 1 月，發表了«朝鮮語新正字法»。这个"新正字法"是徹底地根据形态-音位学的原則制定的。它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例如：汉語詞詞头(*r*)，(*n*)的标記問題；①标記合成詞使用隔音符的問題；拟定了六个新的、使用于形态学語音交替場合的字母等等。

1948 年 10 月，共和国政府决定把"朝鮮語文研究会"設在教育省(部)，并准备在 1949 年末出版朝鮮語語法和朝鮮語辞典，这个决定是从解放了的朝鮮人民对自己祖国語言的語法和辞典迫切要求出發的。編纂祖国語言的語法和辞典的工作，在文化革命的广泛綱領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当然，要在很短的时間內，完成編纂語法和辞典的工作是比較困难的。可是，由于語言学者們的集体努力，到了 1949 年 10 月，«朝鮮語辞典»的底稿就已定稿付印，后来，美帝国主义者向共和国北半部發动了突然的进攻，这个工作就不得不中断。1949 年 12 月出版了«朝鮮語語法»。这本語法是在先进的苏联語言学理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过去朝鮮各种語法書籍的經驗編制而成的。書中对現代朝鮮語語音構造，特别是形态学方面的有关詞兒的理論、詞兒的結構，以及对一部分詞类的研究、語法范疇的观察，等等，都比过去的語法書有了显著的进步；文章結構方面的研究总的說来也很完整。这本語法对解放后研究現代朝鮮語法給以很大的影响。但是，在这本語法書当中，由于运用了一些还沒有付諸全民实踐的新文字，結果就造成了理論方面和实踐方面还有若干脫节的地方。

1949年 4 月，朝鮮語文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朝鮮語研究»的發刊，是解放后朝鮮語言学發展过程中的一件大事。这个杂志形成了全国語言学思想的中心，团結了共和国北半部最負盛名的語言学者們；發表了研究朝鮮語的成果、一般語言学的論文、語言資料、問題解答以及有关研究正字法和文字方面的論文。

朝鮮語言学者以苏联先进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武裝自己的过程中，«朝鮮語研究»發揮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年青的朝鮮語言学者們决心尽可能快地向苏联学者学習到更多的东西。苏联語言学者們关于語言的本質、研究語言的方法、語言的構造、語言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朝鮮語言学的理論和实踐的基础。

同时也有必要指出存在于杂志編輯工作中的一些缺点。作为一个杂志，絕不是仅仅把工作停留在單純地搜集刊載介紹語言学家的研究成果上面，而是应該很現实地向語言学家提示朝鮮語言学向他們要求什么，他們应該从什么地方着手和如何地安排自己的研究工作。当时摆在朝鮮語言学面前的中心工作是編制現代朝鮮語語法和編纂辞典，然而，杂志發表的大部分重要研究論文，矛头却指向古代，部分論文轉向了古語語句的解釋上面。

1950 年苏联展开的关于語言学的大辯論，对朝鮮語言学的發展来說，也是一个关鍵。它为朝鮮語言学开辟了一条能够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創造性地解决語言科学上一切复杂問題的道路。这个时期正值朝鮮人民进行祖国解放战爭，虽然如此，朝鮮語言学家們仍然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关怀下进行了有关語言学的大辯論。經过这次辯論以后，他們才有可能在苏联語言学所达到的一般理論成就和本国語言学傳統的基础上，对朝鮮語的語法構造、詞匯結構和基本詞匯、朝鮮語的內部發展規律、全民語法和方言的关系、民族語的形成等等問題进行深入的研究。

随着共和国科学院的成立，朝鮮語文研究会改組成为科学院語言文学研究所。这是有組織地团結和动員全体朝鮮語言学者的全部力量以便發展朝鮮語言科学的創举。

科学院的«学报»几乎每期都發表跟語言学有关的論文，主要部分是从斯大林的关于語言学的著作看朝鮮語言学的各种問題。也刊載了一部分关于朝鮮語历史研究的有趣的論文。«朝鮮語研究»的停刊到科学院語言文学研究所的«朝鮮語文»創刊期間，科学院的«学

---

* 按本文作者是朝鮮文字改革委員会常务委員，原文發表在«朝鮮語文»1957 年第 6 期。为了明确节譯內容，原題目有所改动——譯者。

①朝鮮語詞匯中的汉語詞，詞的开头音是"*r*"或"*n*"的有变讀的現象，隨着韵母性質的不同，"*r*"有时念成"*n*"或作零声母，"n"有时也作零声母。如"rotong 劳动"念成"notong"，"ryənkye 連系"念成"yənkye"、"nyətsa 女子"念成"yətsa"。

报»一直是朝鮮語言学者發表著作的唯一园地。

«朝鮮語文»是1956年1月創刊的，它的基本任务是：提出朝鮮語言、文学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向，广泛地組織和动員全体学者共同解决目前語言、文学的各种問題，总結这个过程中所获得的科学成就，并把研究的結果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去。

«朝鮮語文»在进行朝鮮語純潔化和朝鮮文字改革这兩件巨大的、全民性的工作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兩件工作是朝鮮人民的語言、書写生活中提出来的現实要求，还有待我們全体語言学者們的努力。此外，在介紹兄弟国家的朝鮮語学者們的論文的工作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介紹了 O. П. Петрова 的«俄国和苏联研究朝鮮語历史梗概»，郑之东的«朝鮮的文字改革»，Л. Р. Зиндер 的論文«朝鮮語母音»，等等。与此同时，«朝鮮語文»还把系統地介紹和研究各兄弟国家的語言学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曾經刊載了«現代苏联語言学的几个現实任务»、王力的«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А. Граур 的«罗馬尼亞語言学的發展»等文章，在加强我国科学界和国际間的联系上，作了很大的貢献。

1956年10月，在科学院內成立了"朝鮮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这是我們民族文化建設中的一件大事。自从1443年朝鮮人民創制了値得在世界文字史上自豪的、組織体系十分科学而系統化的自己的特有文字——«訓民正音»以来，它就在我們朝鮮民族文化的發展过程中，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在封建制度統治下的朝鮮，崇拜和無限制地使用汉字，大大地限制了我們的固有的朝鮮文字的發展。

这个事实和迅速前进着的新文化的需要与發展，提出了在国內进行文字改革的必要性。朝鮮文字改革的創始者是周时經先生，① 他强調过我們的文字必須改成新的字型进行横写，同时主張，要使朝鮮語的正字法更加符合于朝鮮語的形态結構，把我們的正字法基本上建立在形态原則的基础上。可是，当时朝鮮語言学發展的主观客观条件受到了限制，他的关于文字改革的思想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对朝鮮文字改革的研究，其后仍在一些朝鮮語言学者中間进行。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殘酷鎮压下，这項研究一直沒有中断过。

語言学者們經过長期的努力，«朝鮮語小辞典»終于在1956年12月問世了。这是一本确定現代朝鮮标准語的詞兒的詞义及其使用規范的最重要的注釋辞典。这本辞典回答了朝鮮社会的現实要求，它的詞兒解釋基本上是正确地建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的，正确地反映了科学的同时也是全民的要求。在搜集詞兒当中也很完整地反映了現代朝鮮标准語的現狀，特別还广泛地搜集了"八一五"解放以后全体人民广泛使用的詞兒和表达手段，去掉一些最近以来从詞匯構成中消失了的消極的、陈旧的詞；具有地域方言性質的詞兒、特殊的專門用語，个別的或者地方色彩很濃厚的象声詞等等都不在搜集之列。同时，在有关正确使用現代朝鮮标准語中的詞兒、正确組成詞的形态、正确的發音以及正确标記詞兒等問題上，也做得十分出色。当然这本辞典也不是沒有缺点的。因此，在朝鮮的辞典学者面前，还擺着一樁如何使这本辞典更臻完善的任务。

此外，«中型辞典»的編纂工作，現在已在进行。

現代朝鮮語的科学研究，历經了半世紀以上的时間，已經获得了許多有价值的成就。在此期間，有一条紅綫貫穿于我国先进的、爱国的朝鮮語言学者們的全部科学著作当中，显著的特征是他們都热烈地致力于提高我們的民族語——朝鮮語在文化中的作用和进一步使它走上規范化的工作。朝鮮語言学者們积極努力地从事朝鮮語的进一步規范化工作，是随着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民族意識的成長开始的。随着以工人阶級为中心的民族解放斗爭的急剧高漲，語言学者們也以同样的步伐，更加有力地展开了作为反日爱国斗爭的一个环节的語文一致运动。之后，团結在朝鮮語学会的先进朝鮮語言学者們，在建立朝鮮語語法、發行朝鮮語辞典、統一朝鮮語正字法、审定朝鮮标准語等工作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对現代朝鮮語的規范化有很大的貢献。

現代朝鮮語的完全規范化問題是朝鮮語言学者們的基本任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須坚决地把朝鮮語言学建立在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的基础上，同时有重点地广泛吸取各国先进的語言学理論，从語言历史的發展中，掌握和分析具体的朝鮮語的資料。

目前提出来的研究朝鮮語的基本方向有下列四項：1)研究現代朝鮮語。2)研究朝鮮語的历史發展。3)調査和研究朝鮮語方言。4)朝鮮文字改革。这些問題对于現代朝鮮語的进一步規范都是必要的，也是朝鮮語言学發展过程中提出来的基本問題。这些問題的一部分是互相交叉着的，为了能有效地解决它，科学院語言文学研究所的語言学研究室、辞典編纂室，金日成大学的朝鮮語言学教研室和各大学的朝鮮語言学教研室、朝鮮文字改革研究委員会以及学术用語审訂委員会等部門必須緊密联系和集体合作。依靠这些科学研究部門的共同努力，今后的兩、三年內，«朝鮮語中型辞典»、«朝鮮語規范語法»、«学术用語統一方案»、«外来語标記法»、«朝鮮語正字法»，等等，可望發表。

(周时龙节譯)

①周时經（1878—1941年）是朝鮮著名的語言学家。有«国語文典音学»、«国語文法»、«語言的發音»等著作。

日本最近的汉語研究动态

日本 香坂順一

日本的汉語研究，战后有了很大的質的变化。它的理由，我可以举出下列数点：

1）战前，日本对汉語的研究（实际上談不上什么研究）只是盲从当时日本的"国策"，專为侵略中国服务。以战后为一大轉机，对此已做了深刻的反省。

2）关于战后日本的科学全体，尤其在人文科学的分野上，極度要求应采取科学的态度。

3）汉語学習者發生質的变化，汉語研究者改变了研究态度。在战前，日本各种学校的汉語学習者，多系一些抱有当所謂"大陆浪人"的志向的。而战后，由于中国的革命，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各种科学研究的惊人成就；日本人的汉語学習者，通过刊物——特别是像現在中日兩国还未恢复邦交的情况底下——得到了有关中国的种种知識。因此，思想上越認眞的学生，就越想学習汉語了。处在这种情况底下，汉語的研究者們，如果对自己的研究态度不加改变的話，是不行的。

4）在中国，关于語言的研究，确实有惊人的發展，并且正在突飞猛进。日本的研究者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在研究上面也就展开了新的面目。

5）1946年10月，由于倉石武四郎、金子二郎以及住在京都、大阪、神戶、天理等研究者的提倡，組織了"中国語学研究会"。这个会在恶劣的条件下，对推进科学的汉語研究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并特别在关西（以京都、大阪、神戶地方为中心）关东（以东京地方为中心）地区每月举行例会一次（至今已有一百次以上），作为研究者研究、發表、討論問題和互相学習的机会。此外，每月發行"中国語学研究会会报"后改名为《中国語学》，作为会員們互通消息、增加团結和互相研究、討論的場所。

6）我們能够經常得到中国的研究者們寄贈的書籍刊物和其他研究資料，虽然在时間上較迟，但也吸取了不少新的成果。这一点是日本的汉語研究者要向中国的研究者們表示感謝的。

根据以上所述的几点，日本的汉語研究者是在蜕变；这和战前的汉語研究的水平相比較，实在有長足的进步。

这种进步的尺度，具体地表現在这次作为我們学会十周年紀念事業所出版的《中国語学事典》上面。因为只有《中国語学事典》才能表示出日本的汉語研究水平的实际情况来。我們如果把它拿来和战前的各种著作比較，就能更清楚地显出目前日本的汉語研究的新面貌。

紀念研究会創立十周年的《中国語学事典》的編輯發行的提案，是1955年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举行的中国語研究会大会席上，作为关西会員的动議而提出来的。这个提案經大会一致贊成和議决后，立即征求执笔的志願者，計有七十名会員参加。1956年大阪市立大学举行的大会上，把原稿的一部分提請全体会員討論，并在1957年10月，由江南書院刊行，全書計有七册，已經出版。

現在来介紹一下它的內容：

第一册《中国語学概論》。1）概說篇，2）国語統一与文字改革。

概說篇里的"北京話的音韵""北京話的語法"（藤堂明保）曾在年度的大会上經全体会員討論过。因此，可以作为我們对于汉語語法的看法。"中国話的方言"（小川环树、W. A. Grootaers［賀登崧］），它首先說明"方言"的概念和历史，然后再把方言能互相理解的程度和方言的將来，用实証的方法加以述說。这是一篇扼要得法的方言概說。"国語統一与文字改革"（大原信一、伊地智善繼、村尾力、泉兴長），这篇文章表示我們对中国的标准語的統一和文字改革問題上的最高程度的理解。

第二册《中国語比較研究》。1）語音的比較，2）語法的比較，3）文章論。

"語音的比較"一篇談到"古代中国語的音系"（藤堂明保）、"中古汉語与現代方言的比較"（頼惟勤）、"中国諸方言的音系"（松本勇、王育德、林盛道）等，更不止于中国，甚至談到它和日本的汉字音以及朝鮮的汉字音的比較（頼惟勤）；这可以表示日本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傳統的水平。"語法的比較"部分除"文言白話語法比較"（牛島德次）之外，还有"中国語法發达史"（太田辰夫）。"文章論"（大芝孝、荒木修、陣內宜男、柴垣芳太郎、田中潔）是用新的方法論来对毛澤东、鲁迅、老舍、赵树理等人的文章做分析解剖工作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头，当然不可能很完善，但也可以作为一个試驗性的研究工作来給它一定的地位吧。

第三册《中国語研究史》。1）研究史篇，2）辞典和研究書解題。

"研究史篇"是分成日本、欧洲、美国、苏联、中国各部分来写的。特别是讀了"日本之部"（安藤彦太郎）的明治、大正、昭和的前期，就好像在讀日本的汉語研究者的"贖罪史"。"欧洲之部"（小川环树、W. A. Grootaers）是欧洲的汉語研究，主要是为了基督教的傳教和通商的需要而做的，这可表示出跟过去日本在这一方面的情况非常相似。"苏联之部"（桥本万太郎）分为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介紹得很詳細，这是至今日本的研究者所不清楚的方面，这篇文章給了我們一番新的世界認識。"中国之部"分为語法和音韵兩部分。語法又分为"《馬氏文通》以前"、"革命以前"（牛島德次）、"革命以后"（香坂順一）。关于"革命以后"的資料取材以及关于評价，極待中国方面研究者們指教。"中国人的音韵研究"（辻本春彦），清朝以后的部分記述得很詳細，文献的解說也得当，是一篇在音韵研究上可参考的文章。

第四、五册《实用中国語》。

这主要是針对初步学習汉語，或做汉語的实际業务的人而編輯的。

第六册《新的中国語單語》。

革命后汉語詞匯的变化很显著。我們在研究教学上遭受到很大困难。为了緩和这种困难，集中了会員的力量，蒐集了

（下轉97頁）

閩南方言的虛字眼“在、着、里”

黃丁华

在　閩南方言的“在”，讀書音[tsai˩](陽去)，如“現在”“所在”。但是“在先”却說[tai-siŋ]；而更常用的說話音是[ti˩]和[te˥˩]。① [ti]和[te]又可以合成双音詞[ti-te]。[ti][te][ti-te]①三者基本意义相同，具体用法有别。

2.1* “在”[ti][te][ti-te]的用法比較如下表：

	A	B	C	D
ti:	你ti廈門	你坐ti椅頂		
te:		你坐te椅頂	你te坐	你坐te.|
ti-te:	你ti-te廈門	你坐ti-te椅頂	你ti-te坐	

上表里的A是用于名詞之前的动詞；B是介于动名之間的介詞；C是用于动詞前作进行体的时态副詞；D是附于动詞后讀輕声的时态助詞，表持續。介詞結構作狀語，[te]也偶而用于名詞前，如“伊te桌頂写字”。粗略給以分辨一下，[ti]的实詞性較强，[te]純粹是虛詞，[ti-te]介乎其間，实实虛虛。同一用法有兩个或兩个以上通用的，在实际說話中，大抵就依这么个区分标准选用。介詞結構的句子，“在”又可以叠用。不过由于修辞上的“权重出”，② 通常是不同的讀音前后錯合着用。例如：

伊在台上企在。(他在台上站着)
[i ti tai-tiŋ khia-te]
或[i ti-te tai-tiŋ khia-te]；
伊企在台上在講話。(他站在台上在講話)
[i khia ti tai-tiŋ te kɔŋ-ue]
或[i khia ti-te tai-tiŋ te kɔŋ-ue]
或[i khia te tai-tiŋ ti-te kɔŋ-ue]

上述A、B、C三种，是“在”的普通用法，普通話也一样，不必多說。現在要討論的是D項用法。

2.2 “在”[te·˧]作为持續体时态助詞，如：“我企在”[gua khia-te]，“你坐在”[di tse-te]，“伊倒在”。[i to-te]。这种用法，唐宋巳然。例如③(后头用閩南口語对注)：

兩处也应相忆在，官高年長少情亲。(白居易：郡中閒独寄微之及崔湖州)——[sã-it-te]。

把酒送春惆悵在，年年三月病厭厭。(韓偓：春尽日)——“鬱积在”[ut-tsut-te]

残年兄弟相逢在，随分虀鹽万事休。(元好問：夢归)——[sã-tu-te]。

十年后要箇人下茶也無在。(景德傳灯錄、8.14)——[ia bo-te]。

“在”夾在兩个动詞之間的，是狀語語尾，一般都恢复重音，讀輕声須是强調狀語。如：“企在看”[khia-te khuã]，“坐在写”[tse-te sia]，“倒在睏”[to-te khun]。

[te]是虛字眼，字义旣隐，往往依音写字，用字不一，“底”“地”也就曾經混用过。“底”，閩南方言讀書音[ti]，說話音泉、廈是[tue]，漳州是[te]。“地”，閩南方言都讀[te]或[ti]。“在”“底”“地”讀音是这么相似，莫怪唐宋元間也有以“底”“地”用作“在”的。例如：

空劳酒食饌，持底解人頤。(王維：慕容承携素饌見过)

文章差(瘥)底病，迴首兴滔滔。(杜甫：寄陶二少尹)

一鉢可能容尺許，千年有底万人看(楊万里：宿曹溪)

甚今年容貌八十岁，見底道才十八。(辛弃疾：稼軒詞，97)

“持底”的“底”不作“何”解。“見底道”閩南方言可以說“見在講”[kĩ-te kɔŋ](尽在說)。

上面例举的閩南方言时态助詞“在”，显然是普通話的“着”。不过，应該指出：現代閩南方言的“在”1)只能用于表示靜态的持續，不能用于表示动作的频接。“牽在”[khan-te]，“跪在”[kui-te]，“插在”[tshaʔ-te]，“擺在”[pai-te]都可以說；但是，普通話的“走着”“跳着”“討論着”，閩南方言要用C項的“在行”[te kiã]，“在跳”[te thiau]，“在討論”[te tho-dun]。④ 2) [te]究竟尚未尽去“在”义，可以介处所(就是B項)，可不能置宾語。好像呂叔湘先生举过这样的例子：

---

* 本文是本刊上期發表的《閩南方言虛字眼的“阿”和“仔”》的續篇，故序碼用2.1，2.2…。

① [te]往往濁化为[de]，[ti-te]濁化为[ti-de]。濁化不濁化，用法意义均無别。

② 見《文心雕龙，鍊字篇》

③ 本节所举唐宋語例均轉引自張相《詩詞曲語詞匯釋》(中华書局1956年第三版)及呂叔湘《释景德傳灯录中在、著二助詞》(載《汉語語法論文集》)，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④ “写着的字”仍是靜态，可以用“在”。“他还写着呢”是語气助詞，也可以用“在”，参閱后面2·5。

台上坐着主席团。
却是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鋤，花鋤上挂着花囊，手中拿着花帚。(紅楼夢，23)

閩南方言只好是：1）保持原句詞序，去掉助詞——也就不表示体（时态）；2）顚倒个兒，說“主席团坐在台上”；3）比較接近原句的是說“台上主席团坐在”。目前知識分子当中有一种照字面念的新兴說法：[tai-tiŋ tse-tio? tsu-sik-thuan]。这还不是很行得开，而且跟閩南方言“着”的原来用法也相犯。

着 閩南方言的“着”，讀書音是[tiɔk˦](陽入)，如“無着”“着手”。說話音有[to?˦]，[tiau˧]，[tio?˦]三种。

2.3 “着”的說話音的詞义分别列述如下：

A. “着”[to?˦]燃燒起来。例：“着火”，[to? he]，“灯点𣍐着”[tiŋ tiam bue to?]。

B. “着”[tiau˧]（陽平）擱住，附着。例：“糊着在”[kɔ-tiau-te]，“气球着在电綫頂”[khi-kiu tiau ti tian-suã tiŋ]。

C. “着”[tio?˦] 1）对，不錯。2）須，該，相当于普通話的“得”[tei˨˦]。3）受，中。例：“着伤”[tio? siɔŋ]，“着箭”[tio? tsĩ]。

以上三項，除开C項的2），普通話同义的都念[tʂau]。或[ʂʅ]

2.4 閩南方言里“着”作为助詞是从上举C. 3）演化而来的，中間还有个介詞阶段。例如：“拍着手”[pha? tio? tshiu]，“踢着脚”[that tio? kha]，“着”是“到”的意思。由此而来的助詞“着”分为重音和輕声兩种，二者表示的意义剛好相对。

A. 表开始，相当于普通話的“一…起来”；讀重音[tio?˦]，在語句中往往有短暫的語音停頓。例如：

伊笑着眞好看。[i tshio-tio? tsin ho khuã]（他一笑起来眞好看。）

我想着就不願。[gua siũ-tio? tsiu m guan]（我一想起来就不甘心。）

你行着路脚步眞輕。[di kiã-tio? dɔ kha-pɔ tsin khin]（你走起路来脚步很輕。）

伊講話着起碼兩点鐘。[i kɔŋ-ue-tio? khi-be nŋ tiam-tsiŋ]（他一講起話来起碼兩个鐘头。）

B. 表結果。紧接动詞后讀輕声[tio?·˩]，跟动詞隔离仍讀重音。例如：

射着[sia-tio?]，撞着[tɔŋ-tio?]，想着[siũ-tio?]，掠着[dia?-tio?]（捉到）…以上輕声；

看会着[khuã ue tio?]（看得到），臆𣍐着[io? bue tio?]（猜不着），“摸𣍐着”[mõ bue tio?]摸不到(着)…以上重音。

A項的沒有否定式，而且一般的不能隔离动詞，除非是紧連着的动宾詞組，因此跟B項不混。

里 閩南方言里有兩个方位詞讀輕声，原义已失：一个是“头”[thau.˩]，一个是“里”。“里”，閩南方言讀書音[di˨]；作方位詞，漳厦說[de.˩]，泉屬說[di.˩]或[nĩ.˩]。例如：

嘴里[tshui-de]，心里[sim-de]，橱里[tude]，天里[thĩ-de]，山里[suã-de]，桌里[to?de]。

这些个普通話是“里”或“上”。

“里”作为方位詞，不說也容易明白。不过咱們着重要討論的是它跟“在”“着”相类，甚至連在一塊兒的用法，那就是語气助詞。以下还得先从“在”“着”說起。

2.5 “在”“着”在閩南方言里兼作語气助詞，都讀輕声。下面还是借用呂叔湘先生和張相先生所举的例句用閩南口語对注出来：

晚風犹冷在，夜火且留看。（白居易：别春爐）——[iau diŋ te]

近水数枝还小在，一梢双朵忽齐开。（楊万里：怀古堂前小梅漸开）——[ia sue te]

此处空在，但宿何妨。（京本通俗小說：拗相公）——[khaŋ te]

去佛法大远在。（景德傳灯录，15·5）——[hŋ te]

道是安乐未在。（同上，8·5）——[be te]

和尚恁么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同上，9·4）——[m khiŋ te]

汝已后会去在。（同上，1·5）——[ue khi te]

A. 閩南方言“在”[te.˩]的語气作用跟上举諸例原文語气相当，表示确信，有“实在是这样”的語气，也就是呂叔湘先生說的“以祛疑树信为用”。① 普通話表达这类語气用“着”“呢”“着呢”，否定的都用“呢”。

B. “在”如果用于疑問句，那多是以陈述作反詰，肯定轉是否定，否定变成肯定，語調也改下降为上升；普通話用“嗎”。例如：

阿庆去公园在？[a-khiŋ khi kɔŋ-hŋ te]（阿庆（可眞的）上公园嗎？）

你不是接着伊兩張批在？[di m si tsi?-tio? i nŋ tiũ phue te]（你不是接到他兩封信嗎？）

要是句中有疑問語气詞的，“在”的語气也偏指实在；普通話用“呢”可以相当。例如：

---

① 本节引述呂叔湘先生的論見，也都引自《釋景德傳灯录中在、著二助詞》，請参閱。

阿珠是不是考入大学在？[a-tsu si m si kho-dzi ptua-o? te]（阿珠是不是考入大学呢？）——偏于肯定“考入大学”；

三張尔尔，怎样还写未好在？[sã tiũ niã-niã tsãi-iũ ia sia be ho te]（三張罢了，怎么还没写好呢？）——偏于实指“还写未好”。

C. “着”[tio?.↿]和“在”作用一样，上面 A. B 举的十几条例句的“在”全都可以换用“着”，不过較用“在”多帶上鋪張的意味，显得更当眞，反詰語气也較和緩就是了。

2.6 上举諸例也全都可以换用“里”。“里”表示的語气作用相当于普通話“呢”。稍有差异，比較如下。

A. 陈述的，有申明“是这样”的語气，漳、厦可以借用“咧”[de.↿]，泉州用“哩”[di.↿]或[nĩ.↿]。

王先生明日要去北京里。[ɔŋ sian(-sĩ) miã-dzit be khi pak-kiã de]（王先生明天要去北京呢。）

你不共我講，我也不講里。[di m kaŋ gua kɔŋ gua ia m kɔŋ de]（你不跟我說，我也不說呢。）

这里可以比較“在”“着”“里”語气的不同了。“在”偏于实在，着重于“袪疑树信”；“里”比較虚泛，不过是“申明如此”；“着”剛好介乎其間，它的鋪張就不及“在”那么实，它的当眞又不像“里”那么虚。这些差别在动詞謂語句里看得比較明显，“在”的持續意味是还隐含在語气里的。表意欲的，“在”的用法也就有限制了。“在”須是單純地把意欲本身当做事实，也就是把表意欲的能愿动詞作普通动詞看待，如“伊肯在”，“我不敢在”，“大家願意在”。否則，像“意欲什么”“意欲怎么样”的就不能用“在”。前面举的兩句的“里”就換不上“在”。“着”“里”都沒有“在”的这个限制。“里”既然只是“申明如此”，就不强調要对方相信，甚至还帶有引逗对方的神气呢。“里”念得越清楚，引逗之情也就越明显，有“就是这样，你怎么样”的語气。普通話要靠語調表情才能表达这种引逗的神气；或者是用加上感情色彩的“哪”（吶）那才差略相似。

B. 疑問句帶上“里”有猜度或期望的語气。例如：

伊底时要来里？[i ti-si be dai de]

《魯迅全集》你有抑無里？[dɔ sin tsuan-tsip di u ia? bo de]

C. 陈述句用上升語調，是疑信参半，也就是介乎陈述和疑問之間，后头帶上“里”要鼻化成[nẽ.↿]（泉州仍是[nĩ]）。普通話用“吧”，倒是下降語調，例如：

你在写文章里？[di te sia bun-tsiũ nẽ]

不过，普通話的“吧”帶有商量語气，閩南方言的“里”[nẽ]却多点兒詢問語气。要是否定句，就近似反詰了，普通話要用“嗎”才够味兒。例如：

你不相信里？[di m siɔŋ-sin nẽ]

伊还未答复里？[i ia be tap-hɔk nẽ]

D. 祈使的“里”帶着商量語气，隐含“…好不好”的意思。普通話还是用“呢”才相当。① 例如：

你共我写一張批里！[di kaŋ gua sia tsit tiũ phue de]

赶紧請伊来帮忙里！[kuã-kin tshiã i dai paŋ-baŋ de]

祈使句里“在”“着”都不用。

2.7 不管是陈述、疑問，还是祈使，都可以用語調或指示代詞来表示感嘆，这是汉語通例，閩南方言也不例外，这里不备述。② 最普通的是用語气助詞“阿”来表示感嘆。“在”“着”“里”要就原来語气再加一層感嘆色彩的話，同样都可以再帶上“阿”。尤其常見的是“里”加“阿”：[de]+[a]往往合成“啦”[da]（泉州是[dia]）；[nẽ]+[a]往往合成“哪”[nã]（泉州是[niã]）。③ 普通話也是这样，不过閩南方言的“哪”，普通話一定是“嗎”。上面举过的例子全都适用于加“阿”，不另举例。

2.8 閩南方言的“在”“着”又都可以跟“里”（包括“啦”“哪”）連用，这也是“古已有之”的了。④ 連着用，那就是兩語气相加。普通話当然还是用“呢（哪）”“着呢（哪）”。前面所举的凡是能用“在”“着”的例子都可以再連上“里”。下面再举几个最基本句例：

时間还早在里（啦）！[si-kan ia tsa te de (da)]

国庆节北京大鬧热着里（啦）！[kɔk-khiŋ-tsiat pak-kiã tua dau-dziat tio? de (da)]

老黃在学堂在里？[dau-ŋ ti o?-tŋ te nẽ]

哦，你还未签名着哪！[ɔ di ia be tshiam-miã tio? nã]

我一部《紅楼夢》是不是你提去在里？[gua tsit pho aŋ-dau-bɔŋ si m si di the?-khi te de]（提＝拿）

作为語气助气的“在”“着”“里”已如上述。比較起来，普通話的“呢”“着呢”显然是“最为簡渾”（呂叔湘先生語）的了。大体上对照起来約如下表：

<table>
<tr><td>在、着</td><td>在里、着里</td><td>里</td></tr>
<tr><td colspan="3">呢</td></tr>
<tr><td colspan="2">着呢</td><td></td></tr>
<tr><td>着</td><td></td><td></td></tr>
</table>

① 参照呂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7·16，商务印書館，1956年8月新版合訂本，306－307頁。

② 参閱《中国文法要略》17·51-56，315-318頁。

③ 泉州話的[niã]用苏州話的“嗜”剛相当。閩南方言另有語气詞“咯”[dɔ]（相当普通話“了”）和“啦”[da]（相当普通話“啊”或“了啊＝啦”）。二者讀音閩南各地頗一致，又可以說“好哦咯”[ho ɔ dɔ]，“好啊啦”[ho a da]，并非合音，所以不拿来跟“里”談在一起。

④ 参閱《釋景德傳灯录中在、著二助詞》。

关于連动式和兼語式的取消論

唐啓运

蕭璋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56年第一期發表了題为《論連动式和兼語式》的一篇文章。他說連动兼語的理論和名称"使人感到糾纏,不太切合語言实际,很难解决問題",因此他主張取消連动兼語的說法,并且用扩大的主从动詞詞組和复句的理論和名称来解析。他把原来連动兼語的格式归屬兩种类型。一种是"扩大的主从动詞詞組",結構緊密,中間不能加主語。一种是"复句",結構較松,中間都能加主語。

所謂主从,就是附加关系和补充关系。如果是附加关系,附加的动詞詞組就在被附加的动詞詞組的前面,如果是补充关系,补充的动詞詞組就在被补充的动詞詞組的后面。同一个句子,可以是附加关系,也可以是补充关系,这要看是什么样的語言环境。比如"我打电話叫車"这个句子,如果是答你这样的問話"你打电話干什么",就算补充关系,重音就落在补充詞組"叫車"的身上(一般又是在宾語上头,在动詞上头較少),如果是答你这样的問話"你怎样叫車",就算附加关系重音就落在附加詞組"打电話"的身上(一般亦是在宾語上头,在动詞上头較少)。

至于兩个以上的更扩大的主从动詞詞組,"除了有較明显的重音在附加部分的詞組和最后的补充部分的詞組上以外,还有次重的用小圈表示和最輕的(非輕音)"。(啓运注:重音用小黑点,次重用小圈,最輕的沒有符号。这里的着重号是原文有的。)比如"我打电話找老王办事"(附加关系),"我打电話找老王办事"或"我打电話找老王办事"(补充关系)。(直綫表示核心詞組,波浪綫表示从屬詞組。)

"复句"又是怎样解說的呢?他說,"武震脫了鞋走进屋去"等于說"武震脫了鞋,他走进屋去"和"武震脫了鞋,他就走进屋去";"他說了又說"和說成"他說了他又說"沒有什么区别:这些都是复句,前一联例是主从复句,后一联例是并列复句。可見"重音形式"和"加插主語"是蕭璋先生的基本立論。

复句和單句的界限,是語法学上未决的問題,本文不拟作詳細討論。不过可从与蕭璋先生这种"加插主語"有关的見解說起。有些語法学家認为各分句的主語相同,出現一次以后,其他可省略,要补上来也是与語言事实相符的。但是,这些分句之間都是有停頓的,和蕭璋先生在沒有停頓的詞組之間加插主語是不大相同的。蕭璋先生的加插主語是和語言事实不符的。

他認为"武震脫了鞋走进屋去"和"武震脫了鞋,他走进屋去"或者"武震脫了鞋,他就走进屋去"同样是复句,"他說了又說"和"他說了他又說"也同样是复句。前一例,語言事实是不停頓的,而蕭璋先生硬加上了停頓,后一例,在沒有停頓的同屬一个主語的詞組形式之間加插主語也是語言事实所沒有的。我們还沒有听过或見过"他笑了他又笑"、"我看了我又看"、"老王去了老王又去"这样的例子,却不知蕭璋先生从什么地方得来"他說了他又說"这样的一个說法?而且这个說法又不知是否有理論根据?

蕭璋先生說,"他有个弟弟在解放軍里"和"他有个弟弟,弟弟在解放軍里"同样是复句,"我买了一本旧杂志缺兩叶"和"我买了一本旧杂志,这本旧杂志缺兩叶",以及"我昨天讀了你的文章好極了"和"我昨天讀了你的文章,你的文章好極了"却沒有什么兩样。但是事实上是怎样的呢?"我叫他来"說成"我叫他,他来",果是同样的嗎?前者的意思是他还沒有来,而后者的意思却是他来了。可見不但形式上有分別,意义上也是有分別的。把这种在形式上在意义上都有分别的句子混而为一,是沒有理由的。連动兼語的格式有自己的特点,和一般的單句复句是不相同的,不是扩大的主从动詞詞組和复句所能包括的,因此应該当作特殊的句型处理。蕭璋先生不但主張取消連动兼語的句型的名称,而且要取消这种句型的独立性,分别归屬扩大的主从动詞詞組和复句句中去,这却是值得商榷的。

就詞义考察,还可以看出"在""着""里"是循着下面的綫索演变而来的:

在:动詞→介詞→副詞→时态助詞(輕声)→語气助詞(輕声)。着:动詞→介詞→时态助詞(輕声)→語气助詞(輕声)。里:名詞→方位詞(輕声)→語气助詞(輕声)。三者之演成語气助詞,輕声是个重要的促成因素。处所詞的"在"[te˧]并不讀輕声,咱們挪开不談。"在""着"演变途徑相似,語气作用也差不多;"里"的演变途徑不同,語气作用也大有差別。"在里"連用又是兩种語气相加。这么看来,吕叔湘先生認为"在里为最完具之形式,唐人多單言在,以在概里;宋人多單言里,以里概在。"这一論断就有点兒难以肯定了。

此外,吕叔湘先生論述語气助詞"在""里",曾用苏州話为例証,以为"最足資为印証者为吳語"。我看,閩南方言的"在""里"也可以算是有力的佐証。对于苏州話里类似的語詞如"勒里"[ləli]"勒浪"[ləlaŋ]"勒篤"[ləto]等的解釋,也是很可以互相啓發的。

从动謂句的动詞重复談起

赵 荣 普

在現代汉語的动謂句里，如果动宾詞組后面有程度补語，一般情况是动詞要重复一次，因为这种补語不能放在宾語后面，例如：

他唱歌唱得好。

还有，如果动宾詞組后面有时間补語，一般情况也是把动詞重复一次，例如：

我跟他学中文已經学了一年多了。

这兩种动謂句的第二个动詞好像是为了引出补語而重复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从句子結構来看，如果我們把动宾取消，兩句的句法还是完整的：

他唱得好。

我已經学了一年多了。

这是一点。还有一点，这类句子里的动宾詞組，在任何情况下，动詞不加任何时态助詞。“唱歌”、“学中文”只代表兩个抽象概念。如果句子里有时态助詞的話，一定要加在第二个动詞身上，第二个例句里的“已經学了一年多了”正好說明这一点，动詞“学”的后面有助詞“了”。

根据这兩点，我們可以断定上面兩个例句里的第二个动詞都是主要动詞。它們后面可以加时态助詞、程度补語和时間补語。兩个例句里的动宾詞組不是句中的主要成分，而只是提示在哪方面“唱得好”和“学了一年多了”，因此它們只起狀語作用。动宾詞組作狀語用，在汉語是說得通的。

根据上面句子的分析，我們可以再談另外一种句型，例如：

他作事积極，学習努力。

可能有人把这种句子叫做主謂謂語句，意思是說“他”是主語，“作事积極，学習努力”是謂語，而“作事”、“学習”又是“积極”和“努力”的主語。这样分析是有問題的。

“积極”和“努力”，根据这兩个詞的詞义来看，只是用来談人的劳动态度的，故只能作“他”的謂語，不能作“作事”和“学習”的謂語。把“作事积極”、“学習努力”看作主謂結構作謂語，这只是死板地从句子結構看問題，而抹杀了句子的思想內容。結構与內容应該并重，不宜偏廢。

还有，这里的“作事”和“学習”，一个是动宾詞組，一个是双音动詞，也許有人把它們当作动詞用，意思是說“他作事”是主謂結構作主語，“积極”是謂語，等等。这样分析也是有問題的。

道理还是一个，“积極”、“努力”只能用来談人，不能談事。除此以外，这种句子里的动宾詞組也好，动詞也好，都保持动詞的原形态，这一点和上面所談的动宾詞組是一样的，所起的作用也是相同的。因此，“作事”和“学習”只代表兩个抽象概念，說明“他”在哪方面“积極”和在哪方面“努力”的。原句的基本句型是“他积極，努力”，而“作事”和“学習”只作狀語用。我們可以再看一个句子：

打球他比我强，可是唱歌他不如我。

这里的“打球”、“唱歌”，兩个动宾詞組，也是作狀語用的，不过它們的位置是在主語“他”的前边罢了。实际上，这类狀語可以放在一句之首，也可以放在謂語之前。

如果这样分析不錯，那么下面的例句也应該屬于这一类型：

他排球好得很，可是足球不成。

他身体很健康，思想也很进步。

这里划綫的詞語都作狀語用，不过不是由什么动詞、动宾詞組構成的，而主要都是由名詞構成的罢了。这样提出，可能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因为一般都認为是主謂謂語句的。

我們可以就第一个例句再分析、解釋一下。如果把它当作主謂謂語句，那么謂語是“排球好得很…”，首先应該提出結構与內容必須統一起来，那么在謂語里，“排球”旣然是“好得很”的主語，“排球”这个名詞就应該代表某种运动方式，或代表某种具体的球，而实际上原句的意思是說“他”在排球方面“好得很”，“排球”这个詞只提示出来在哪方面。这是一点。还有，这个詞不仅可以放在謂語前，也可以放在主語前，正和动詞或动宾詞組作狀語时一样，例如：

排球他好得很，可是足球不成。

如果还坚持这是一个主謂謂語句，那么“排球”就代替了“他”而变成了前半句的主語了。这种說法就傾向于：凡一句之首的詞語就是主語，这是很难令人接受的。

补正：1957 年11 月号 29 頁左欄倒 16 行，“同一輩的人”前应加“有些”；12月 21 面右欄 30 行“叙述句”应为“直陈句”，22 面左欄倒 1 行“可是”应为“怎能”，22 面右欄 1 行“簡式”后应为“？”，24 面右欄倒10 行“汉語”应为“古汉語”，35 面左欄 29 行“客人”应为“外地人”，35 面右欄“t‘akgiɐ”应为“ts‘akgia”。

“然”和“气”不是構詞的标志

文 金

構詞的标志可以作为区分汉語詞类的一种参考，这是大家能够同意的。象“子、兒、头、者、家、性、可、化”等虚詞素，的确对辨别詞类有相当大的精确性并有相当高的構詞能力。近来構詞法的研究已經引起了語法学者的重視，構詞标志的發現尤其使語法学者感到莫大的兴趣。因此“然”和“气”也被人作为構詞的标志提出来了。“然”和“气”是不是構詞的标志，我以为还值得商榷。

先說“然”。岑麒祥先生認为“然”是可以根据区分詞类的副詞形态标志，① 張志公先生則認为它是副詞的詞尾，也是形容詞的詞尾。② 关于形态标志和詞尾，語法学者的理解和講法可能不尽相同。不过，岑先生所說的形态标志和張先生所說的詞尾，实質上都是指的足以区分詞类的虚詞素，也就是指的足以区分詞类的構詞标志。

說“然”是副詞和形容詞的詞尾，人們可以依靠这个詞尾的标志来断定詞类，这个說法本身就站不住脚。既然由“然”構成的詞可以是副詞，也可以是形容詞，如果包括副詞、形容詞的一些詞放在一起，如“徒然、忽然、竟然、公然、泰然、坦然、昏昏然、茫茫然”，試問我們怎能辨别它是副詞，还是形容詞？自然，我們可以依靠句法特点来断定“徒然、忽然、竟然、公然”是副詞，“泰然、坦然、昏昏然、茫茫然”是形容詞。但是“然”本身并沒有标志副詞或者形容詞的作用。我們还可以这样設想，岑麒祥先生所以說“然”是副詞的形态标志，也許認为“泰然、坦然、昏昏然、茫茫然”这类形容詞，是文言文里遺留下来的，現代汉語里畢竟少見，可以作为例外。吕叔湘先生說文言文里才有“然”这个形容詞詞尾（中国文法要略，18頁），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其实我們只要翻看現代的典范作品，就不难看到这类形容詞还用得相当普遍，它在現代汉語里还占有一定的地位，不应該把它作为例外看待。張志公先生承認这类形容詞，或許也是这个緣故。

人們可能还会說，“泰然、坦然、昏昏然、茫茫然”这类形容詞多出現在成語或成語性的結構里，而且这类形容詞常作狀語，如“泰然处之、肃然起敬、昏昏然欲睡”，可不可以干脆說它是副詞呢？我以为不能那么做。第一，从意义方面看，这类詞都是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質、狀态的；第二，从語法特点方面看，这类詞都能單独作謂語，其中有些还可以作定語。这些都是和副詞不同的地方。底下举些例子来看看。

伊都茫然，只得又說，“什么？”（魯迅小說集，410頁）

馮乐山穿着袍子馬褂，神色泰然。（家，260頁）

一室寂然，窗外微陰，雪满山中。（冰心小說散文选集，218頁）

这时候，他覚得心里面很暢快，很安然。（高干大，112頁）

…也为将来的陽光爱惜着，就有些茫茫然。（日出，跋10頁）

叫过了后，居維巖还覚得耳朵里有点嗡嗡然。（子夜，375頁）

这飄飄然的精神，在亂教上是不应該有的…（魯迅小說集，110頁）

由“然”構成的詞不仅有副詞、形容詞，还有連詞，如“虽然、固然、既然、縱然、倘然”。这类詞的数目虽然不多，但在現代汉語里使用率極高，自然我們無法撇开它不談。由于“然”構成的詞是分屬于以上三个詞类的，因此我們無法憑借“然”来辨别詞类，也就不能說它是副詞的構詞标志。

再来談“气”。有人說“气”是个虚詞素，說“气”所表現的是一种气度和性質，是合成形容詞。把“气”作为合成形容詞的标志这就更加沒有理由了。

“闊气、孩子气、神气、土气、爽气、俗气、傻气”可以說都是合成形容詞，也都有表示“一种气度和性質”的意思，但“脾气、福气、运气、骨气、勇气、才气、習气”也同样都有表示“一种气度和性質”的意思，可都不是合成形容詞，而是合成名詞，因为这类詞都可以用数量詞作定語，却不能与“不”組合。这是“气”不足以作为構詞标志的第一点理由。

第二，就“气”作为構詞的成分看，它既可以作虚詞素，又可以作实詞素。比如“生气、争气、賭气、憋气”里的“气”就不是虚詞素，都有实在的意义，而虚詞素是沒有实在意义的，此其一。其二，“生气、争气”这类詞很容易拆开，如“生了一回气”、“争了一口气”，而由虚詞素構成的詞就沒有这个特点。可見“气”这个詞素还沒有完全虚化。

由此可見，說“气”是形容詞的構詞标志，是不切合語言实际的。总之，在構詞的时候，“然”和“气”只能充当構詞成分，并沒有标志某一个詞类的作用，因而它不是構詞的标志。

---

① 見岑麒祥《語法理論基本知識》，25頁。

② 見張志公《汉語語法常識》，19頁。

“上、下”等的趋向动詞性

陈迪明

汉語課本把“上、下、进、出、起、过、回、开”等認定是趋向动詞，这是很对的。它們不分隶于介詞，也不同于普通的动詞。这三者之間的区别要弄清楚。

“上、下”等詞像是介詞而其实并不是。

他住在山里。　　　他爬上高山。

这兩个句子看来結構很相似，因此教学时有些学生就比对着前句的“在”(介詞)把“上”也看做介詞。其实这也难怪，过去有些語法書都是把这样的“上、下”等詞(“起”、“开”未見提及)認作介詞的。

把像“爬上高山”的“上”这样用的趋向动詞看作介詞也不是沒有理由的。首先，这个“上”和“住在山里”的“在”都用得比較虛。其次，它們前头都是自动詞，后头又都是处所詞。再其次，“在山里”在句中是一个單位，“上高山”也可以是一个單位。特别是像“走上講壇”这样的例子，更足以証明“上”和“講壇”之間的密切关系，当中少个“上”字，兩头就簡直無法挂鈎。不过細看下去，“上、下”等詞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和介詞之間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区别的。

第一、介詞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其后的名詞(只有古汉語偶有例外，如：“麋鹿之与处”)，“上下”等詞則不然，“爬上高山”，我們可以說“山虽然陡，到底大家都爬上(去)了。”或“山太陡，爬不上去”。在这兩句話里，“上”字后头理应是“山”只是不重复罢了。“上”和“山”这么一分开，“上”字对于动詞“爬”的輔助性——后置表趋向——也就完全显示出来。这么看来，“爬上高山”一語，与其說“上高山”是一个單位，無宁說“爬上”才是一个單位。“上、下”等詞对于动詞的輔助性这个特点，当它們(“上、下”等)处在他动詞和宾語之間的时候，更是無可怀疑，如“放下担子”“拿出証据”，其中“下、出”怎样也扯不上一个介詞了。由此可見，“上、下”等之有别于介詞，由于“上、下”等詞能够和动詞合用(后置)，具有对动詞的輔助性，这一点很重要。介詞“在”在疑問形式和答話中虽然可以离开其后的名詞(“在不在家看書?”“在”“不在”，这种用法为一般介詞所無，只有少数如“到”“給”等个別可兼屬动詞的是例外)，但决不能与动詞合用，沒有“住在”“站在”之类的語言單位。

第二、介詞虽然有不少来自动詞，但都已虛化，不能單独用作謂語；它通常是帶着整个介詞結構放在有关的动詞前头，个別的介詞結構虽可前放或后放(如“在…”)，但其中的介詞还是介詞，用途也不变。“上、下”等本来就是动詞里面的一类(附类)，它們能作謂語是本分的事；它們后接处所詞的时候，通常是位于动詞后头，若与处所詞同处动詞前头，“上、下”等詞就要改变用途，用作謂語。試比較下面兩組句子：

介詞“在”
- 他站在門外。(“在門外”是介詞結構，作补語。)
- 他在門外站着。(“在門外”是介詞結構作狀語，“在”仍是介詞。)

趋向动詞“上”
- 他爬上高山。(“上”与动詞合用，表趋向。)
- 他上山打柴。(“上”是謂語)

“上、下”等跟“来、去”常常合用，这也是“上、下”等詞的一个特点，介詞則与此“来、去”無关。因此“爬上高山去”中的“上高山”同样不能認为是插在“爬…去”之間的介詞結構。

还有一点区别可以提一下，“上、下”等后头可加时态助詞“了”，介詞不能。

总的說来，介詞主要的特点是不能單独作謂語，不能离开其后的名詞；“上、下”等詞的主要特点是可以單独作謂語，常跟动詞合用，具有对于动詞的輔助性，因此它們是趋向动詞。这兩类詞就是各自憑着这样的特点而能在任何情况下彼此不相淆混的。

这里，順便談一談“上、下”等詞和普通动詞之間的一些問題。

由于“上、下”等詞常和动詞合用，帶輔助性，又是后置的，因此象《北京口語語法》和《中国現代語法》把位于动詞后的“上、下”等詞划入动詞作补語，称做“动詞补足語”或“动詞做成的末品补語”，現在根据上述“上、下”等詞的特点看来，这种說法是值得研究的。

用在动詞后的“上、下”等詞和动詞补語有区别：

第一、动詞作补語(如“赶走”“打通”整个还是單1动詞，它的实詞性是不折不扣的，唸的时候是自然重音所在，拼写时一般要分写。“上、下”等作为动詞的后置成分，詞性轉虛(特别是活用时，如“爱上”的“上”)，它賦予了动詞以詞形变化的形式，給帶上了一些附加意义，唸的时候是輕声，拼写时与动詞連成一个單詞。

第二、动詞作补語，若后帶宾語，則这个动詞补語对宾語必帶使动性，“上、下”則不一定如此，試比較：

动詞补語——赶走了穷困。(使“穷困”“走”开)

“上、下”等后置成分——如今我也爱上了这个大山大嶺啦。(不能說使“山嶺”“上”)

第三、“上、下”可与“来、去”合用。

由此可見，“上、下”作动詞后置成分时，其对于动詞的輔助性，是体現在它和动詞兩者的內容与形式的統一；而动詞补語和动詞在形式上則是各自独立的。

怎样处理声調在音位系統中的地位問題

周 耀 文

声調在汉藏語系中具有区分詞义的功能，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是，声調在音位系統中怎样处理的問題，因为还沒有深入地爭論过，所以至今还沒有得到一个被大家認为比較正确的結論。大家都知道，声調同汉語拼音方案有密切的关系，要使汉語拼音方案能够很好地帮助創立或实驗国內少数民族的任何一个文字方案，就必須正确地解决声調在音位系統中的地位問題。

目前对声調的看法，归納起来，有以下三种：

（一）把声調看作是独立的音位，和輔音音位、元音音位并重，或与所謂"声母音位"、"韵母音位"并重，有几个声調就作为几个"声調音位"，或簡称"調位"。例如說，北京話有四个声調音位。①

（二）把声調看作是整个音节的音高，看作是識別音位变体的一种条件；不同意把声調当作区分元音音位的成分，也不同意把声調从整个音节中分立出来，当作是独立的"声調音位"。②

（三）把声調和元音結合在一起，認为声調是区分元音音位的成分（間或区分輔音音位）。每个元音出現几个声調，就分几个元音音位。例如，北京話有四个[a]音位：a˥，a˧˥，a˨˩˦，a˥˩。③

以上三种看法，各有不同的論据。現在仅就我个人所理解的分別論述一下：

第一种看法（把声調看作是独立的音位）的論据是："声調有区分詞义的功能；声調可当作最小的語音單位（以五度标調法的符号˥˧˥˨˩˦˥˩…当作音位的音标）"。这种論据乍看起来，好像沒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特別是習慣于"声、韵、調"的历史傳統語音分类法而还不習慣于用"音位"来分析、归納汉語語音的人，更不容易發覺其中尙有毛病（过去我也是如此）；但是只要我們好好地学習音位理論，把音位的归納建筑在科学的語音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不加分析的主观感覚上，就会發覚这种論据还有着严重的毛病。这种毛病就是把不能当作独立音位而必須結合在元音上才能起区分詞义的功能的声調看作是独立的最小語音單位。我們知道，最小語音單位，必須有其發音部位作为它的發音顫动体或共鳴体；不然，就不可能区别不同的音質。例如，[p]与[k]同样都是清音（声帶不用顫动），但由于它們發音部位不同，顫动体肉質、形狀不同：[p]的顫动体是双唇，[k]的顫动体是舌后軟顎，所以形成不同的音質。又例如[i]和[u]，發音时同样都是气流顫动声帶，但我們为什么能听出其不同的音質呢？这就是因为[i]和[u]舌位前后不同，唇形圓展不同，造成不同的陪音所致（同是男人，或同是女人，操用同一种母語，發出同一部位的[a]，我們不需要用眼睛看，只憑耳听，即能分辨出甲、乙的声音，这是音色的不同，不是音質的不同。音質和音色兩者还有差別，不能混为一談）。而声調，虽然也有其顫动体（声帶），但声調在口腔、鼻腔中并沒有自己的發音部位，它必須結合在元音（或濁輔音）上才能發揮其作用；否則，一离开了元音（或濁輔音），便好象胡琴之"弦"一离开了它的共鳴体——綳着蛇皮的竹筒，即無所施其技一样，只是兩条普通的靱帶，兩条普通的弦綫而已。这只要我們观察一下啞巴只能顫动声帶，不能学会用灵活的舌头（或其他發音器官）構成各种不同的顫动形式，因而不能發出各种不同的音質，不能說話的情况，便可以体会到声調非結合在元音（或濁輔音）上不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从元音的"長短""松紧"不能从元音中分立出来的事例，也可以說明"音高"不能从元音中分立出来成为單独音位的正确性。我們曉得：元音的"長短"决定于顫动时間的長短；元音的"松紧"决定于發音器官肌肉的松紧，特別是喉壁的松紧（例如彝語支的許多語言中的紧元音），它們本身也是沒有另外發音部位的。它們的性質虽和"音高"的性質各不相同，但它們却有着共同的特点：不能离开元音（或濁輔音），一离开元音，便不能發生作用。所以向来的語言学者不把長元音的符号"ː"和紧元音的符号"～"（或"－"，都是加在元音底下）当作長元音、紧元音的独立音位的音标，而把音長和音紧当作区别元音音位的成分，这是完全正确的。例如云南富宁县僮話（屬僮語南部方言）：

thin˧	石头	ten˧	墳	tɛn˨˩	墊
thiːn˧	天	teːn˧	添	（[ɛ]不分長短）	

① 参看《語言調查常識》第3講，69頁，及《中国語文》1957年9月号《从音位学看汉語的字調（声調）》一文。

② 参看《中国語文》1957年2月号《北京話音位問題商榷》及1957年6月号《汉語的声調在音位系統中的地位》。

③ 見《語言調查常識》第3講，69頁。

θan˨˦ 信	pun˨˦ 喂(人)	hon˧ 魂
θa:n˨˦ 教	pu:n˨˦ 半、販	ho:n˧ 搖
ɔn˦˥ 竹狸	bɯn˧ 天	θɤn˨˦ 發抖
ɔ:n˦˥ 安逸	bɯ:n˧ 月	([ɤ]不分長短)

我們不能說(也还沒有人这样說)，云南富宁县僮話有九个元音音位［i e ɛ a u o ɔ ɯ ɤ］，一个“音長”音位[ː]，而应該說，它有十六个元音音位，其中有七对是相应的長短元音音位。

又例如云南紅河自治区六村大寨哈尼話:

di˧ 后退	zy˧ 斜尖	dze˧ 丢掉
dḭ˧ 混	zy̰˧ 不同意	dzḛ˧ 衣服“破爛”
na˨˩ 停止	dɔ˧ “穿”衣	mo˨˩ 老
na̰˨˩ 早	dɔ̰˧ “很”好	mo̰˨˩ 想“要”
zu˨˩ 走	ɣɤ˧ “撕”紙	lɯ˧ “繞”綫
zṵ˨˩ “揉”蕎面	ɣɤ̰˧ “甩”手	lɯ̰˧ “卷”袖

我們不能說(也还沒有人这样說)，六村大寨的哈尼話有九个元音音位[i y e a ɔ o u ɤ ɯ]，一个“音緊”音位[～]，而应該說，它有九对松紧相应的元音音位。

既然“音長”和“音緊”不能从元音中分立出来，当作独立的音位，同样道理，“音高”也不能从元音中分立出来，当作独立的音位，即不能說，某某語言有几个“声調音位”，譬如不能說，北京話有四个“声調音位”(或“調位”)：˥，˧˥，˨˩˦，˥˩。

第二种看法(把声調看作是整个音节的音高)的論据是:“汉語的語音，不論它是元音音素或是輔音音素，成音节才有声調，离开音节便沒有声調。…一定的相对的音高是貫串在該音节的每个音素上的，…每个声調都是貫串在整个音节中的各音素上，音节联結在一起發出一个完整的声調，并不是每一个音素發出一个相同的調。…声調不是音素的而是音节的，那末，不管兩个系統（指用元音輔音系統和声韵調系統的兩个不同語音分析法——引者）是分是混，都不能把它看成音位。”①我們認为“汉語的語音，不論它是元音音素或是輔音音素，成音节才有声調，离开音节便沒有声調”的說法是可以的，因为汉語每一个音节都有元音(方言中也有以一个濁輔音为一个音节的，但很少)，元音發音时声帶一定要顫动；但我們却不能因此便不加分析、不分主要次要地說，声調是貫串在整个音节上的，声調是貫串在音节的每个音素上的。因为:

第一、声調主要是結合在元音上的。例如：ma˥(媽)，其声調应該是m˥a˥，而不是m˥a˥，这在听不清ma˥的讀音而需要延長ma˥时，声調的主要結合更可以听得明显：ma˥延長时是m˥a˥(声調結合在a上，随a的延長而延長)不是m˥ a˥，如讀成m˩a˥便会使人听不清楚說的是什么字，或听成兩个音节。帶濁輔音尾的音节，声調也是主要結合在元音上，例如：man˥(顢)其讀音是m˥a˥n˥，不是m˥a˥n˥或m˥ a˥n˥。对于韵母是复合元音的，則声調主要是結合在主要元音上，例如：phiau˥(飄)的声調主要是結合在[a]上，phiau˥延長讀音时是phi˥a˥u˥，不是phi˥a˥u˥或phi˥a˥u˥。所以在这里我还得順便辯明一下，我們不同意史存直先生的說法:“如果說声調附在主要元音上，那么次要元音就沒有了声調；既然沒有声調，那就無法再按声調来分音位了。”②——这种看法，我們認为是不正确的，我們認为声調附在主要元音上，次要元音还是帶有声調(不然元音就会变了質)，而次要元音帶有声調并不影响我們按元音的音高来区分元音音位，因为次要元音的調質(声調平、升、降的性質叫調質。調質与計算度数的調值应該有所区別)与主要元音的調質基本上是一致的，是沒有矛盾的。而且我們区分音位是按輔音、元音(及其相对的音高)来分的，而不是按一个声母一个韵母便是一个音位的主观感覺分类法来分的。③ 因为韵母可以是單元音韵母，也可以是复元音韵母或帶輔音尾韵母(例如汉語)。复元音韵母和帶輔音尾韵母都是兩个以上的不同音素的結合。韵母与韵母的不同，可以是全部音素的不同，例如：mau˥˩(冒)与mei˥˩(妹)，其中[-au]和[-ei]的各个音素都不同；也可以只是一部分音素的不同，例如：mau˥˩(冒)与mai˥˩(卖)，其中[-au]与[-ai]只是[-u]与[-i]的不同。所以不加分析地把任何一个韵母都看成是一个音位，是違背音位的基本原理的。

第二、汉語(应該包括方言)不是任何音节的每一个音素都有声調。例如清輔音的声母tha˥(他)、fu˨˩˦(府)、ʂʅ˧˥(十)中的[th]、[f]、[ʂ]，和清輔音韵尾sɐp˨(十)、pat˧(八)、luk˨(六)(广州話)中的[-p]、[-t]、[-k]便都沒有声調。汉語的情况如此，其他任何有声調的語言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把声調看作是整个音节的或韵母的是不符合汉語及其他有声調語言的語音实际情况的。但对此問題，或許还有些人会提出史存直先生的論点来駁我“对音位来講，重要的并不是音的客观性質，而是人的主观感覺。只要一般人都感覺調是附丽在整个音节上，縱令你用仪器測驗，証明某些声母是沒有声帶振动的，也絲毫不能改变人的主观感覺。”④ 那我只能这样回答：“在我还沒有体会到史先生的‘主观感覺音位論’(忽視語音的客观性質和語音

(下轉53頁)

① 見《中国語文》1957年6月号《汉語的声調在音位系統中的地位》。

② 見《中国語文》1957年2月号《北京音位問題商榷》。

③ 参看上注一文。

④ 同②。

現代汉語中从日語借来的詞彙

王立达

正如同日語中有許多古汉語的借用詞彙那样，在現代汉語中，也有許多从現代日語借来的詞彙。这些現代日語詞彙的大量傳入中国，是从十九世紀晚期开始的。

日本自从經过"明治維新"运动以后，很快地走上了資本主义社会的道路。当时，有些爱国的中国知識分子看到日本向西方資本主义国家学習很有成效，因此主張效法日本变法圖强。例如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就是在日本明治維新运动的影响下發生的。戊戌变法运动失敗后，梁啓超东渡日本，在横濱出版了«淸議报»和«新民叢报»，这兩种报刊上的文章中，都曾使用过大量的日語詞。梁氏且曾写过«論学日本文之益»及«东籍月旦»等文，鼓励我国人学習日文和閱讀日本書籍。

从1896年起，清政府开始派遣学生留学日本。1900年以后，人数益形增多。而自1905年孙中山先生領导成立"同盟会"以后，留日学生大部分都参加了这个革命組織。他們創办了«民报»，和当时改良派的«新民叢报»展开了思想論战。在«民报»上發表过的文章中，也曾用过許多日語詞。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受到西方資本主义式的教育，接受了在当时看来是进步的思想，并且組織起来努力編譯書籍，出版«譯書彙編»杂志。經过他們的努力后，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書籍，遂介紹到我国来。而在翻譯日本書籍的同时，大量的現代日語詞彙也介紹过来。

現代汉語中借用的日語詞，以科学技术的專門术語为多；此外，也包括着一部分一般用語。这些詞，在我国今日書籍、报刊上使用的書面語当中非常多。我們試着翻閱一下«新名詞詞典»、«新知識詞典»一类的工具書，即可發現其中所收的詞彙几乎有一半是借自日語的。这些詞，大都是明治維新以后，在日本人翻譯西文書籍陆續創造出来的。因此，从历史上来說，它們不仅在我国人心目中認为是"新名詞"；就是在日本国內也同样認为是近百年来产生的"新語"。

原来，日本人在翻譯西文書籍中的專門术語时，采取了"音譯"和"意譯"兩种方法。用"音譯法"翻譯出来的就是現代日本語中的所謂"外来語"，例如ガス、コンクリート等。这些"外来語"起初也曾一度用过汉字来書写，例如ガス写做"瓦斯"、コンクリート写做"混凝土"等；但現在一般已經不用汉字，而只用"片假名"(楷字母)来書写了。至于用"意譯法"翻譯出来的詞如"交响乐"(symphony)、"論理学"(logic)等，則都是用汉字来書写，并且其中除了一小部分是用"訓讀法"(亦即日本語固有詞彙的讀法，例如"貸方"讀为カシカタ、"借方"讀为カリカタ等)以外，絕大部分是用"音讀法"(亦即按照日譯汉字音来讀，例如"交响乐"讀为コウキョウガク、"論理学"讀为ロンリガク等)。这类詞在現代日本語中占的比重很大。它們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經不認为是"外来語"，而認为是和固有詞彙無异的日語詞彙了。

被借用到現代汉語中来的日語詞彙，即是上述各类的日語詞彙。現在分别說明于下：

一 本为日本音譯"外来語"的汉字写法(这种写法日本人称为"嵌字"アテジ)，而被借用到汉語中来的。举例如下：

汉字写法	片假名写法	西文原名
加答兒	カタル	Katarrh(德)
瓦斯	ガス	gas
米(或"米突")	メートル	mètre(法)
虎列刺(虎列拉)	コレラ	cholera
淋巴	リンパ	lymph
混凝土	コンクリート	concrete
窒扶斯	チプス	typhus
俱乐部	クラブ	club
浪漫	ロウマン	romantic
曹达	ソウダ	soda

从上举例詞的汉字与西文对音当中，显然地可以看出是根据日譯汉字音来翻譯的。例如gas譯为"瓦斯"，就是因为日譯汉字音的"瓦"字讀为ga；而concrete譯为"混凝土"，則是因为"混"字的日譯汉字音是kon。假如由我国人自己根据汉字的現代讀音来翻譯时，就不会使用这些汉字了。

此外，在这种类型的借用詞中，还可以看出一种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当日本人使用汉字来做为"外来語"的"嵌字"(アテジ)时，曾有意地选擇了一些音义双关的字，例如"混凝土"、"俱乐部"等。

二 虽用汉字書写，而只有"訓讀"，沒有"音讀"的日語詞，举例如下：

汉字写法	日本訓讀法	語义說明
入口	イリクチ	指公共場所大門。
出口	デクチ	同上。
小型	コカタ	一般用来指报紙篇幅或集会規模。
大型	オオカタ	同上。
立場	タチバ	
片艳	カタザセ	紙張品种名。
打消	ウチケシ	
引渡	ヒキワタシ	法律用語，卽“移交”、“移送”的意思。
市場	イチバ	經济用語。
广場	ヒロバ	
取消	トリケシ	
取締	トリシマリ	法律用語。
手續	テツズキ	
場合	バアイ	
場所	バショ	
見習	ミナライ	卽“实習”的意思。
組合	クミアイ	数学用語；又作“合作社”解。
憧憬	アコガレ	因思念而引起的想像。
味之素	アジノモト	調味品名称。
（以上是日本人創造的詞彙。）		
借方 (debit)	カリカタ	簿記用語，卽“收入項”。
貸方 (credit)	カシカタ	卽支出項。
大熊座 (ursa major)	オオクマザ	星座名。
小熊座 (ursa minar)	コグマザ	同上。
但書 (proviso)	タダシガキ	法律用語。
（以上是日本用“意譯法”譯出来的外國語詞彙。）		

上面列举的例詞中，有的是一般用語（例如“手續”、“場合”等），有的是專門术語（例如“引渡”、“借方”等）。而从其来源上来說，有的是日本人創造出来的（例如“片艳紙”、“味之素”等），有的則是用“意譯法”从外国語借来的。这些詞彙，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已經被看做与固有詞彙無异的地道日本語；而它們在現代汉語中例如手續、立場、場合等，也都已經变成日常用語了。

三　由日本人用“意譯法”譯出来的外国語詞彙，在汉字讀法上只有“音讀”，不用“訓讀”的，举例如下：

1）下面一些彼此含义相反或相对的詞，都是来自現代日本語的借用語：

絕对—相对	积極—消極	直接—間接
高潮—低潮	高压—低压（电学）	高溫—低溫（气象）
广义—狭义	左翼—右翼（政治）	主动—被动
主体—客体	主观—客观	乐观—悲观①
肯定—否定	时間—空間（哲学）	直流—交流（电学）
理性—感性（哲学）	暖流—寒流（气象）	优点—缺点
强化—弱化	进化—退化	硬化—軟化
优势—劣势	長波—短波（电学）	內在—外在（哲学）
預算—决算（財政）	可决—否决（政治）	动态—靜态
必然—偶然（哲学）	質量—数量	入超—出超（貿易）
动脉—靜脉（生理）	动力—靜力（物理）	热帶—寒帶（地理）

上水道—下水道（工程）	地上水—地下水（水文）
內分泌—外分泌（生理）	重工業—輕工業（工業）
單子叶—双子叶（植物）	通貨膨脹—通貨收縮（財政）
財团法人—社团法人（法律）	使用价値—交換价値（經济）
显花植物—隐花植物（植物）	火成岩—水成岩（地質）
陽極—陰極（电学）	高周波—低周波（电学）
动产—不动产（法律）	債权—債务（法律）
可変資本—不变資本（經济）	流通資本—固定資本（經济）

2）下面的一些一般用語和專門术語，也都是来自日語的借用語：

石油（矿業）	出版（文化）	仲裁（法律）
支配	分配（經济）	民主（政治）
民族	方案	方針
政党（政治）	政策（政治）	量子（物理）
原子（物理）	分子（物理）	电子（物理）
元素（化学）	保健（衛生）	保証
理事	干事	系統
傳統	連絡	連系
斗爭	国际（政治）	协定（外交）
协会	协議	社交
社会	社团	批判
企業（經济）	投資（經济）	广告（商業）
景气（經济）	配給（經济）	重点
法則	范疇（哲学）	道具（戏剧）
剧場（戏剧）	象征	現实
抽象	具体	前提
揚弃（哲学）	活动	运动（政治）
动員（政治）	阶級	講座（教育）
典型	版画（美术）	干部
性能	計划	进度
历史	派遣	衛生
弧光（电）	調节	調整
細胞（生理）	电流（电学）	电池（电学）
电波（电学）	結核（医学）	地質
科学	流感（病理）	神經（生理）
行政	業务	背景
代表	报告	侵略
警察	番号（軍事）	类型

① “悲观”原为佛教用語，日本人借用来作为“乐观”的反义詞。

倫理(哲学)	原理	生理
物理	心理	气体(物理)
固体(物理)	液体(物理)	流体(物理)
儲蓄	农民	宗教
特务	方式	方法
权利(法律)	义务(法律)	思潮
意識	解剖(医学)	資本(經济)
基地(軍事)	会談	論文
論壇	論战	指数(經济)
指导	軌范	动机
商業	工業	建筑(工程)
机械(工程)	資料	欢送
年度	作品	理想
理念(哲学)	理性(哲学)	理論
現代	現役(軍事)	現金
現象	現实	环球
巨头	关系	作用
幻灯	体操	体育
講演	事变(政治)	基准
宣誓	宣战(外交)	营养
总理(政治)	公債(財政)	信託(經济)
文庫(文化)	电信(交通)	电話(交通)
同盟	世紀	反应
事变(政治)	溫度	溫室(园艺)
溫床	促进	促成
进化	进展	常識
主笔(新聞)	演出	演習
演奏(音乐)	漫画(美术)	漫談
漫笔(文学)	冒进	会話(語文)
命題	假定	假想
假釋(法律)	膠着	时效(法律)
放射(物理)	注射(医学)	紧張
紧縮	动議	大本营(軍事)
入場券	人力車	二重奏(音乐)
代言人	百貨店	太陽灯
交响乐(音乐)	舶来品	牽引車
辯証法	紫外綫	配电盤(电学)
檢波器(电学)	变压器(电学)	眞空管(电学)
血色素(生理)	單行本	謄写版
印刷品(文化)	出版物(文化)	博覽会(文化)
展覽会(文化)	圖書館(文化)	农作物(农業)
巡洋艦(軍事)	驅逐艦(軍事)	运动場(体育)
总动員	常备兵(軍事)	假想敌(軍事)
預备役(軍事)	傳染病(病理)	低能兒
手工業	参考書	所得税(財政)
所有权	手榴彈(軍事)	軍需品(軍事)
圖案画(美术)	高利貸(經济)	悬壅垂(生理)
攝护腺(生理)	催眠术	病虫害(农業)
神經过敏	神經衰弱	国际公法
空襲警报	灯火管制	防空演習
航空母艦(軍事)	土木工程(工程)	意識形态(哲学)
經济恐慌(經济)	生产手段(經济)	生产关系(經济)
交感神經	交战团体	攻守同盟
同盟罢工	新聞記者	

从上面所举的例詞当中，可以看出有許多是同义复音詞（例如“斗爭”、“批判”、“派遣”、报告”、“調整”、“社会”、“方法”等)。由于它們和現代汉語詞彙日益复音詞化的發展趋势相符合，所以才有可能被我們接受过来，并且融合在汉語的固有詞彙里。

3）再看下面一些学科名称，也是从日語中借用过来的。

哲学	心理学	論理学
倫理学	民族学	經济学
財政学	化学	自然科学
物理学	衛生学	解剖学
病理学	下水工学	土木工学
河川工学	电气通信学	建筑学
机械工学	簿記学	冶金学
园艺学	和声学	工艺美术学

4）現代汉語詞彙里凡是詞尾①是“化”“式”“炎”“力”“性”“的”“界”“型”“感”“点”“观”“綫”“論”“率”等的詞，都是从現代日語中借用过来的或是利用这种構詞法創造的。举例如下:

1. 詞尾是“化”的詞:

一元化　多元化　一般化　公式化　特殊化　現代化　工業化　民族化　科学化　大众化　自动化　电气化　長期化　口語化　理想化

2. 詞尾是“式”的詞:

速成式　問答式　流动式　簡易式　方程式　恒等式　西洋式　日本式

3. 詞尾是“炎”的詞②:

肺炎　腸炎　关节炎　胃炎　肋膜炎　心臟內膜炎　气管炎　腦炎

4. 詞尾是“力”的詞:

支配力　生产力　消費力　想像力　劳动力　記忆力　表現力

5. 詞尾是“性”的詞:

可能性　現实性　必然性　偶然性　週期性　放射性　广泛性　原則性　習慣性　感受性　傳統性　誘惑性　必要性　創造性

6. 詞尾是“的”的詞:

历史的　民族的　科学的　大众的　自然的　必然的　偶然的　公开的　秘密的

7. 詞尾是“界”的詞:

文学界　思想界　艺术界　金融界　司法界　新聞界

---

① 这里只是暂借詞尾这个名称，至于是否完全可以作詞尾看，当然还值得探討。

② 这种詞彙都是病理学名詞。按“炎”字在汉語中本無“腫脹”的意思。現代汉語中被用为病名乃是日本人翻譯拉丁文 inflammatio 时所賦与的新涵义。

教育界 出版界

8. 詞尾是"型"的詞:

新型 流綫型 标准型

9. 詞尾是"感"的詞:

美感 好感 惡感 情感 性感 优越感 敏感 紧張感 讀后感

10. 詞尾是"点"的詞:

重点 要点 焦点 注意点 出發点 观点

11. 詞尾是"观"的詞:

主观 客观 悲观 乐观 人生观 世界观 宇宙观 科学观

12. 詞尾是"綫"的詞:

生命綫 饑餓綫 交通綫 战綫

13. 詞尾是"論"的詞:

一元論 宿命論 無神論 唯物論 唯心論 認識論 方法論 推論 結論

14. 詞尾是"率"的詞:

效率 能率 生产率 使用率

15. 詞尾是"法"的詞:

辯証法 归納法 演繹法 綜合法 分析法 表現法 机械工作法

此外,还有一些与"作用""問題""时代""社会""主义""阶級"等組成的詞或詞組,也是从日語借用来的。举例如下:

1. 同化作用 异化作用 精神作用 心理作用
2. 人口問題 土地問題 社会問題 民族問題 国际問題
3. 旧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 金石併用时代 銅器时代 鉄器时代 原子时代
4. 原始共产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 資本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
5. 人文主义 自然主义 浪漫主义 現实主义 封建主义 資本主义 帝国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6. 地主阶級 农民阶級 有产阶級 無产阶級

四 本为日語詞彙,而在借用为汉語詞彙后,意义与原义不同者。举例如下:

1) 劳动者: 日語原义为产業工人。今借用为劳动人民的汎称。

2) 辯护士: 日語原义为律师。今借用为替人辯解者的汎称。

3) 物語: 原义为演义小說。例如《源化物語》、《平家物語》等。民国初年世界書局、中华書局所出版的兒童讀物中,曾把它借用来專指講动物故事的童話。

五 本为古汉語詞彙,后来被日本人借用做为西方近代术語的意譯語,而現在又被我国人从日本借用过来,变成与古义不同的現代汉語詞彙者。举例如下:

1) 索引: 語出易林"索引不得"。日本人借用为index的意譯語,而我們也沿用了这个名詞。

2) 組織: 本为"紡織"的意思。例如《辽史,食貨志》:"树桑麻,習組織。今日汉語中常見的"組織机構"、"政治組織"等則是从日語中借用来的。

3) 經济: 本为"經世济民"的意思,語义实相当于現代汉語的"政治"。現代日語中借用为 economy 的意譯語,而我国亦沿用了这个名詞。又"經济"作"节儉"解(例如"經济菜"、"时間經济"等),也是从日語当中借用过来的。

4) 文法: 本为法律条文之意。語出《史記,汲黯傳》"弘大体,不拘文法"。日本借用为 grammar 的意譯,而我国亦沿用了这个名詞。

5) 意味: 本为有意趣耐玩味的意思,例如說"意味深長"。今日汉語中在"意味"后面加上一个"着"字来当做动詞的用法(例如說"这句話意味着○○"),則是从日語"○○ヲ意味シテイル"的句型中借用过来的。

6) 共和: 語出《史記,周本紀》:"厉王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日本人譯 republic 时借用了这个名詞,而为我国今日所沿用。

7) 形而上学: "形而上"原見于《易經》:"形而上者謂之道"。日本人借用为 metaphysics 的意譯。

8) 宪法: 語出《国語,晋語》: "賞善罰姦,国之宪法也。"日本人借用为 constitution 的意譯,而我国亦沿用了这个名称。

9) 唯心: 本为佛典用語。日本人借用为 idealism 的意譯,而为我国所沿用。

10) 唯物: 語出《易經》:"盈天地之間唯万物"。日本人借用为materialism 的意譯,而为我国所沿用。

11) 地主: 語出《左傳》:"夫諸侯之会,事旣畢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餼。"今日所說的"地主阶級"一語則是从日語借用来的。

12) 知識: 本佛典用語。今日所說的"知識"(knowledge)則是从日語借用来的。

13) 人道: 原义为行夫妇之事。而今日常用的"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則是从日語借用来的。

14) 保險: 原义为憑險自保,权德輿《岐公進爱碑》:"朱崖黎民,保險三代。"而"保險公司"的"保險"則是从日語借用来的。

15) 生产: 語出《史記》:"不事家人生产作業。"今日經济学上所用的"生产"(production)一語,則是从日語中借用来的。

16) 杂誌(志): 本为讀書札記的意思。例如王念孙《讀書杂志》。今称期刊为"杂誌",則是从日語借用来的。

六 汉字的字形和詞义都是由日本人創造,而为我国所沿用者。举例如下:

1) 腺: 日譯汉字音讀为セン,是 gland 的譯名,指分泌某种液体的器官。例如"甲狀腺、淋巴腺、内分泌腺"等。

2) 膣: 日譯汉字音讀为チツ,是 vagina 的譯名,例如"膣加答兒"(cotarhus vaginee) 即是妇女帶下病。

3) 癌：日譯汉字音讀为ガン，例如“肝癌、胃癌、乳癌”等。

4) 粍（ミリメートル 的嵌字）：即 millimetre 的譯名略号。

5) 糎（センチメートル 的嵌字）：即 centimetre 的譯名略号。

6) 吋（インチ 的嵌字），即 inch 的譯名略号。

7) 呎（フート 的嵌字），即 foot (pl. feet) 的譯名略号。

8) 碼（ヤード 的嵌字），即 yard 的譯名略号。

9) 粁（キロメートル 的嵌字），即 kilometre 的譯名略号。

10) 哩（マイル 的嵌字），即 mile 的譯名略号。

11) 瓩（キログラム 的嵌字），即 kilogram 的譯名略号。

12) 吨（トン 的嵌字），即 ton 的譯名略号。

七 下面一些現代汉語詞彙，是在我国人翻譯日文时創造出来的。

1) 基于（○○ニ基イテ）

2) 关于（“○○ニ关スル”或“○○ニ就イテ”）

3) 对于（○○ニ对シテ）

4) 由于（○○ニ由ツテ）

以上为詞尾是“于”的介詞。

5) 認为（○○ト認メラレテ）

6) 成为（○○ト成ツテ）

7) 視为（○○ト視ナシテ）

以上为詞尾是“为”的动詞。

八 在二十世紀初年曾經一度借用，而現在已經不用的日語詞彙。例如：

1) 劳动組合：即“工会”。我国最初成立工会組織时，亦曾沿用过这个名称。例如在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就曾領导成立了“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作为領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机关。

2) 劳农政府：即工农政府，亦即苏維埃政府的意譯。这是因为日本称“工人”为“劳动者”，所以就称“工农政府”为“劳农政府”。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我国报刊上也曾一度使用过这个名称。

綜上所述，可知在現代汉語中，实包含着許多从日語借用过来的詞彙。由于这些詞彙的輸入和流行，不仅使汉語的詞彙更加丰富，同时也給我們在接受近代科学技术时帶来了很大的便利。

回顧在清朝末年时，曾經由我国学者把economics翻譯为“計学”（严复）或“資生学”（梁啓超），把 philosophy 翻譯为“理学”（見新約全書歌罗西書）或“智学”（梁啓超），把 sociology 翻譯为“群学”，把 physics 翻譯为“格致学”。但是，这种引經据典式的翻譯法未能行得通，因为它本身存在着一个無法克服的缺点，就是不可能在古典当中把所有的新事物都一一找出适当的翻譯名称来。所以，行之未久，“計学”（或“資生学”）、“理学”（或“智学”）、“群学”、“格致学”就分別为“經济学”、“哲学”、“社会科学”、“物理学”所代替了。由此可見，日本人在翻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术語时所使用的意譯法，实在是一种与新事物的發展形势相适合的方法。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文中曾經教导我們說：

> 要从外国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份。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国語言，是要吸收外国語言中的好东西，于我們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語彙不够用，現在我們的語彙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們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鮮东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毛澤东選集 858——859頁）。

毛主席在这里所举的“干部”二字，正是一个从日本借用过来的詞彙。所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除了“协和語”式的从日本硬搬过来的詞应当加以排斥外，对于一切已經为我們習見慣用而早已融化在汉語一般詞彙当中的日語詞彙，是应当把它們看做是“好东西”而加以吸收和使用的。事实上，直到現在，日語詞彙仍在不断地輸入我国，例如“电視”（television）就是一个从日語当中借用过来的新詞。而“基本建設”、“居民点”等新詞虽然不是日語詞，却也都是我国人民运用現代日語的構詞法所創造的。由此可見，現代日語詞彙在現代汉語中所發生的影响，是多么的深了。

九 此外，这里不能不顺便指出所謂“协和語”的問題。“协和語”这个名称的起源，是因为日伪窃据东北时期曾成立所謂“协和会”，其中大小汉奸在講話中喜欢夾杂几个日語字眼；人民并無好感，就把这种話叫“协和語”。比如，“町、番地、案內、出張、出荷、郵便、滿員、主催、急行券、放送局”，等等，都曾在东北地区流行一时；可是到底因为是在外力压迫下使用的，同时又不合汉語的構詞規律，所以这类詞語只是曇花一現，东北一解放，很快就被消灭了。因此，不能把“协和語”同本篇所談的日語借詞同等看待。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由于日語借用詞彙在現代汉語中已經有了半个世紀的历史，所以有許多詞彙已很难辨別出是借自日語的还是我国人自己創造的。本文所列举的詞彙只不过是举例性質，其中如有錯誤，希望讀者予以指正和补充。此外，文中所标注的西文原名，除了少数例外，一般均为英文，不妥之处也希望讀者指正。

（上接95頁）

倫理”見于《毛詩正义》，“积極”見于《周易》王注，“心理”見于《文心雕龙》。但也不能証明我們找到的出处就是当时創制这个譯名詞的同一出处，尤其不能保証我們所找到的出处，就是这个詞的第一出处或者唯一的出处。

談現代汉語中的“日語詞彙”

郑奠

在現代汉語中，有不少經过日本学者用汉語汉字翻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新詞，这是近半世紀以来汉語詞彙發展史中很明显的一段事实。虽則当中国学者如严复、章太炎、梁啓超都認为日人的汉譯新詞太濫了；但是这些譯名新詞的使用率高，流行得很广，在接受科学知識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王立达同志这篇文章指出了这段史实，分别举例說明，內容基本上是对的。不过，一种語言的每一个詞的創制权屬于哪一个人或是哪一个民族，要考查得明明白白，本来是不很容易的。对于現代汉語中間吸收和融化了的这一大批日譯汉語新詞，要弄清楚它們的全部以至个别詞的来龙去脉，更是十分困难。兹事体大，不好談。現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借供参考。

中国翻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書，是从明季（十六世紀后期）利瑪竇輩的东来开始。由于中国学者徐光啓諸人的努力，有过不少的成就。到了清世，尤其是在十九世紀时代，中間經过鴉片战爭的刺激，为了吸收新文化以圖富强，对于翻譯事業，比較广泛地开展起来。在北京設有同文館（1862—1902年），在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設翻譯館（1870—1907年）。此外，天津的北洋学堂，上海的南洋公学，海軍衙門，总稅务司，以及时务报、广学会、墨海書館等等都有譯本刊行，不胜列举。其中江南制造局的翻譯館参加翻譯工作的人員有：中国三十二人，外籍十人。共出版了一百七十多种譯著，包括兵書、工艺、理化、算学、天文、生理、政治、史地、法律、商業、农業各种科学，其質量虽参差不齐，而在各科方面或多或少地都發生了影响。日本的翻譯事業，据《日本国志》所記載，自十九世紀开始。日本文化八年（1811年）始置翻譯局于淺草，为和蘭学；安政三年（1856年）改称蕃書調所；文久二年（1862年）改为洋書調所；八月改为开成所，此后才逐漸發展。这时期与中国的同文館翻譯館約略相当，同样使用汉語汉字，造詞定名，其間当有中日交流、相互影响的一段过程。試举“权利”这个詞为例，“权利”是汉籍中的一个旧詞，它的原义見于《荀子》、《史記》、《汉書》、《論衡》等書的，兹不多論，用以翻譯英語的 right 作为法律上的用語，一般人都認为出自日本所譯，实則同文館譯的《万国公法》（卷一有云“人民通行之权利”）于同治三年（1864年）已經开始用了，其后日本的开成所在明治初年（1868年）也接受了欧美“权利”的概念，也承用这个詞了。这是有历史根据的一个例子。試再举“文法”这个詞为例；“文法”在汉籍中的原义，是指文書法令之类（《史記》“舞文法”），其后也泛称为文章作法，至于近代用以翻譯英語的 grammar 一般人也都認为是从日譯来的。但是明季中外学人合譯的一部邏輯名著《名理探》（西洋傅汎际譯义、李之藻达辞）（1627年）其卷一中有云“制言語者有二，一設語言，一設文法”，它所称的“文法”，就是指的 grammar。如其当时《名理探》这書已流傳到日本，那就不能說日本使用汉字所造的新詞沒有受它的影响吧。（这書所用的新詞还多，不列举了）总之，在这一段时期日本学者与中国譯界同时并进，是相互影响的一段过程。但是到了甲午（1894年）以后，中国由于軍事和政治上的失败，引起了向日本学習的一个高潮，在翻譯上似乎变成一面倒的狀态。其实中日关系，从远的說来，中国历代古籍和汉譯佛經的流傳日本，給日本学者使用汉語汉字不少的憑藉和啓發；从近的方面說来，同文館翻譯館等的各科譯著，对于日譯新詞也有过一定的影响。如果沒有大量的古汉語詞彙（固有的和翻譯佛經所發生的）作为依据，同时，这大批有潛在力量的汉語詞彙如果得不到中外学者們（包括东方的和西方的学者）繼續不断的共同發掘和利用，这对于丰富汉語詞彙以适应近代文化的需要，將会發生困难。所以，我們認为这批汉語詞彙的文化遺产，是应該屬于中外古今学人的共同業績，是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結合的产物。說它是日本人借用汉語汉字所創制或繼承的日語詞彙也好，說它是中国人借用日本学者創制或繼承出来的汉語詞彙也未始不可。

日本学者借用汉語汉字所翻譯的科技新詞和一般譯名，在中国有的通行开了，有的不能通行，有的暂时流行而終于廢弃。換言之，中国人对于日本新詞，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并不是毫無条件地全盤接受的。这其中通行与不通行的內在原因，接受与不接受的客观条件，有待于今后大家的深入研究。

如果就日本翻譯的这批新詞加以分析，其中有从中国已有的譯名搬移过去的，有起用汉語的旧詞賦以新义的，也有利用汉語汉字自造成或改造新詞而在汉籍中無出处可考的，不可一概而論。对于这种复杂的情况，將来編著汉語历史性的大辞典，应該尽可能把它考証清楚；研究中国翻譯史的人們也有必要作細致的分析。

关于日本人所譯的新詞，哪些是起用汉語的旧詞，哪些是日本人自造的詞，很难極端肯定下来。王立达同志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像“历史”“倫理”“心理”“积極”等詞，如其在汉籍中要找到和它字面相同詞义有关的出处，那么“历史”这詞見《南齐書》、《魚复侯子响傳》，

（下轉94頁）

我們应該建立"文字理論"这門科学

繆 錦 安

文字理論可以說是一門新兴的科学，有人比照語言学里的普通語言学，想管它叫"普通文字学"；尽管这个名称也可以，但我以为管它叫"文字理論"比較妥当一些。在中国的文献里，文字理論似乎还沒有被正式提出来过。在苏联，有人注意到这个方面，如 B. A. Истрин 在«語言学問題»杂志 1953 年第 4 号里就写有«文字理論的一些問題»一文。因为在国际的范圍內，这門科学只是剛剛在开始，所以，現在还有人在怀疑这門科学是否能建立得起来。他們不相信一般的或普通的文字学，換句話說，他們不相信能从不同环境下發展起来的同一社会現象——文字抽出共同的东西，發現能支配所有文字發展的規律。对于这种怀疑，周有光先生的«文字演进的一般規律»①一文已經給予很好的解答，我們这里就不多說了。

現在的問題是，建立这門科学是否已經具备了必要的准备条件。这是值得探討的。大家都知道，要建立一門新的科学，起碼要具备兩个条件：充分的材料和方法。前者是先决的，后者是在当时的哲学思想影响或支配之下在处理自己的材料的过程中逐漸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当然，这里所指的方法是指各門科学的自己的方法，并不是方法論的方法。）現在讓我們看看"文字理論"是否具备这兩个条件。

前人为了要从不同的文字里找出能支配所有文字發展的規律，曾經尽可能地把各种已存的和現存的文字收集起来。近几世紀以来，經过不斷的考古發掘和偶然發現，古代人类的文字材料已有大量出土。現已肯定的古代文字系統主要有：1)苏馬連系統，2) 埃及系統，3) 赫梯系統，4)中国系統，5)原始厄拉米(Aramaic)系統，6) 原始印度系統，7) 克利丹(Cretan)系統，8) 馬雅系統。由于文字的产生是多源的，我們当然不能說所有主要的古代系統現在都已被發現；但是，即使仅就現有这些材料，假如能好好地利用，再加上字母产生以后向外傳播的材料和近代人所創造的文字的材料，那末，可以肯定地說，还是可以找出一些理論基础的。当然，有些古代文字还沒有被解讀出来，这会造成使用材料的困难。不过，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解讀出来的。

在我們的时代里，任何科学只有接受辯証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才能成为眞正的科学。毫無疑义，文字理論应該接受辯証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至于这門科学的自己的方法，虽然还沒有建立起来，但有兩点是可以指出的：对于同系統的文字，可以进行發生学的比較；对于不同系統的文字，可以进行类型学的对比。要建立一般的理論，比較和对比是很重要的。

早在 1937 年，林柷敔先生在所著«語文学概观»②里已經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不过那时旣沒有明确提出"文字理論"，所談的也未必中肯。在国外，1952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亞述学教授 I. J. Gelb 發表了一部名叫«文字的研究——文字学的基础»的著作，在这著作的序言里，他說："这項研究的目的在于为一門可以叫做文字学(Grammatology) 的新兴文字科学奠定基础。在一般文字历史主要是从描写-历史观点来論述个別的文字的时候，这門新的科学企圖在比較类型学的基础上建立起若干支配文字的使用和發展的一般原理。"他在这里所談到的"文字学"，实际上和我所談的"文字理論"有相似和相同的地方。不管他的观点怎样，这項工作在国外总算已經有人在做了。

我国一向有研究文字的傳統，拥有大批具有高度学术水平的文字学者，在汉字的研究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汉字系統是世界古今文字系統中主要的一支，由于它的几千年来的發展道路还可以知道并且現在还被使用着，因而它在文字發展的研究上就占着重要的地位。我們旣然能在汉字發展的研究上取得輝煌成績，那末，再进而爭取在"文字理論"的研究領域里赶上或超过其他国家，恐怕沒有誰敢說沒有这种可能吧。当然，我們要知道，我們对汉字系統以外的文字的了解是很不够的，專門的研究更是不多。据我所知，介紹过外国文字的情况的只有賀昌群、林柷敔、周有光、彭楚南等几个人。③ 在外国文字的了解和研究方面，無庸

---

① 見«中国語文»1957 年 7 月号。

② 見«比較文字学概論»附录。

③ 賀昌群：(譯)«文字的起源»(海根原著，見«民鐸»9 卷 3 号)；林柷敔：«比較文字学淺释» (东方杂志 34 卷 8 号)，(譯)«比較文字学概論» (葛劳德原著，商务印書館)，«文字学史» («語言学史»中的一編，世界書局)；周有光：«字母的故事» (东方書店)；彭楚南：«使用拉丁字母的各种文字介紹» («拼音»月刊 1956 年 10 月号起)，(譯)«文字» (苏联大百科全書中的一条，И. M. 嘉科諾夫、B. A. 伊斯特林、P. B. 欽扎洛夫原著，文字改革出版社)。

韙言，我們是落后的。我們国內有多少人在研究外国文字，更有多少研究外国文字的專家呢？这实在是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个人認为：要爭取在我国建立起"文字理論"这門科学，今后应該繼續介紹外国文字的情况。① 在介紹的过程中，逐步深入，逐步提高，最好多出現一些研究外国文字的專家。

在搜集研究材料时，要注意的是，文字学方面的文章不一定放在語言学类中，往往被放在东方学类中。同时我覺得，对我們最有用的、和中国的古文字相近的是外国的銘刻学(Эпиграфика, Epigraphy)，而不是外国的古文字学(Пелеография, Paleography)；当然，我們也要留意外国的古文字学。此外，外国的印章学(Сфрагистика, Sphragistics)以至貨幣学(Нумизматика, Numismatics)，都有参考的必要。

目前正在形成中的"文字理論"这門科学要包含一些什么內容呢？这是会在研究的实踐中建立起来的，現在据我的設想，它可以包含如下所列的內容：

(一)总論

1) 文字理論的对象、方法和任务。文字理論的哲学指导思想——辯証唯物主义。

2) 文字理論是文字学的理論部分。文字、文字史和文字理論的相互关系。文字学和語言学的关系。

(二)文字的类型学的研究

1) 作为符号体系的文字。文字和語言的关系。文字發展規律和語言發展規律的异同。

2) 文字的稳固性和演进性。各阶段向前發展的內在动因和客观原因。②

3) 文字發展的阶段性：③ A. 文字的前身，B. 真正的文字，一、語詞、音节阶段；二、音节阶段；三、字母阶段。

4) 文字的將来。

5) 文字發展的阶段思想和發展阶段的先进或落后的思想。

6) 文字的圖形美。文字和美术。

7) 文字和技术。

(三)文字的發生学的研究

1) 文字的譜系即文字的發生学系統和語言的譜系即語言發生学系統的不一致。

2) 文字的多元起源論和單元起源論。

3) 文字的起源。

4) 文字的傳播路綫——某种文字系統能被外族人民接受的条件。文字和文化。

5) 文字的民族形式。

以上是根据我个人所了解的，还不够称为科学体系的一个大綱。我相信將来的研究会表明：上面所列举的內容会不够完备，甚至会有个別錯誤的。不过，这样的列举一下，無非是为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

"文字理論"一旦建立起来，文字学还必將获得重大的改进。假如說"文字理論"沒有出現以前文字史在一定程度上是材料的堆砌的話，那末，"文字理論"出現以后，文字史將会成为系統地叙述文字發展規律的文字史。如果文字的使用和發展，在理論的指导下有了正确的認識，那末，我国的文字改革必將会获得更多的更有說服力的理論根据。我希望大家一致注意到这一門新兴科学的研究，好使它为我們的文字改革服务。

---

① 依我个人所見，下列各書应該翻譯出来帮助我們的研究：

1) I. J. Gelb: «A Stuty of Writing: The Foundation of Grammatology», Routedge and Kegan Paul，倫敦，1952.

2) Ч. Лоукотка: «Развитие письма»，莫斯科，1950.

3) D. Diringer: «The Alphabet——A Key of History of Mankind», Philosophical Library，紐約，1948.

4) В. А. Кочергин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Письма»，莫斯科大学，1955.

5) J. G. Févrie: «Histoire de l'Écriture»，巴黎，1948.

(按上举第四种書，現已有人譯出，即將出版——編者。)

② 这一节中还可以論到文字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③ 我認为汉字的"六書"法則也应該組織进去。

(上接80頁)

新的詞匯，这才使日本的汉語研究者和学習者得到很大便利。本書中要特別介紹的是"常用語彙"(柴垣芳太郎、丁秀山、徐新元；伊地智善繼。1956年江南書院刊《中国語基本語汇》的重刊)，这是按照科学的方法选出常用詞，絕非用記忆或类推罗列堆砌而成的。今后編輯汉語的課本、辞典等时，可以作为一种参考。此外，有《西北方言語彙》(鐘江信光)、《西南方言語彙》(香坂順一)、《中世通俗文艺語彙》(澤口剛雄)。《西北方言語彙》是以倉石武四郎为中心的"北方土語研究会"繼續了三年多研究的成果。"西南方言"是仰仗了貴州的文学家石果的帮助而成功的。其他还有把方言和北京話比較的"北京話和江南話"(松本一郞)"北京話和东南方言"(松本一男、王育德)、"中国話和各国語言的互相影响"(实藤惠秀、熊野正平、高桥盛孝)等。

《中国語事典》可以說是战后十年来日本的汉語研究的一个总結。此外，战后出版值得注目的还有：《中国語虛詞辞典》(鈴木直沼、山岸共、望月八十吉)、《中国語文法的研究》、《中国音韵論》(藤堂明保)等等，一时难以枚举。

其次还有下列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

在京都大学的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的指导下，由較为年輕的研究者执笔写成了《中国詩人选》，現已由岩波書店出版了二卷，所剩的十五卷也將繼續刊行。神戶外国語大学的太田辰夫的《中国历史文法》，是他二十年来埋头鑽研的成績，現已定稿，目下正在排印中。大阪外国語大学中国語学研究室的《簡約中日辞典》具有划时代的內容。大阪市立大学中国語研究室的《日中大辞典》(約五百万字)，也將于1958年出版。

略談汉字的簡化和繁化

——和周有光先生商搉——

明　之

讀了周有光先生發表在《中国語文》1957年7月号上的《文字演进的一般規律》，我們覺得这是近年来談文字發展演变頗有見地的一篇好文章，有許多令人信服的正确观点。但文內有一个論点，不敢苟同，今特提出来就正于周先生和其他同志。这就是关于汉字的簡化繁化問題。（周先生此文虽談文字的發展，但主要还是論述汉字，在繁化簡化問題上更为明显。）

首先，我們来看下一周先生怎样解釋汉字簡化繁化的原因。汉字在历史的發展过程中为什么会簡化呢？这是"写刻频繁，傳習扩大，既要多，又要快"的緣故。我們認为这是正确的，因为要探討文字的变革，就非联系到文字使用者的要求不可；但这仅仅是原因的一方面，是客观方面对文字的影响。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就是更重要的一面，文字自身的發展規律——內因，就是簡化和繁化的相互作用，这絕不容忽視。根据辯証唯物主义的理解，外因是必須通过內因才能發揮它的作用的。

周先生在解釋繁化时，認为这是"極少的例外"，是"美化作用"的結果，幷且举出印章文字为例。但是我們試問，难道几千年来（从我們能見到的甲骨文算起）汉字的大量繁化事实的出現，就只是人們要美化嗎？恐怕未必是这样。周先生所以說繁化是"極少的例外"，因为他把繁化中一个重要方面"同化現象"（周先生認为对双音节兩个汉字說是类化）归納到簡化中去了。但遺憾的是周先生幷不能自圓其說。例如文中所举"巴蕉"的"巴"是假借字，后来因为形声化（类化）加上"艹"头，这不也是周先生所說的在"独体假借字（音符）加上部首（类符）成为合体形声字"的"繁化現象"嗎？同一个字，同一个变化現象既归入簡化又归繁化，周先生把讀者弄迷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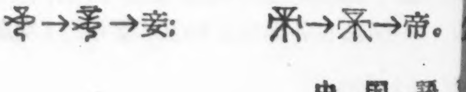
首先，我們来討論一下究竟应該怎样理解繁化簡化。我們認为，說簡化"是構形（即字式——引者）發展的主要方面"是片面的。在汉字的發展过程中，从开始就有兩股相反相成的力量，推动文字的演变，这就是簡化和繁化。这兩种現象从其表面上看是相矛盾的，是相反的不可調和的，因为前者要求"笔划减少"，而后者却"把字的笔划增加了"（見王了一《汉語史稿》上册，43頁）其实我們撥开現象，深入一步就会清楚地看到，这兩个現象是相依为命的，是相成的。沒有簡化就無所謂繁化，沒有繁化就無所謂簡化，这就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矛盾的兩方面。繁化和簡化的关系是錯綜复杂的，但絕不是不可了解的。我們試举"雞"一字为例，看看它們之間的关系：[illegible] 象雞形，后来加声符"奚"，但意符又簡化为"[illegible]"，相合成"[illegible]"。这样，一个象形字变成了形声字。至秦汉后小篆写作"[illegible]"，隶書楷書作"雞"（与鷄互为异体），人民群众又把它簡化成"鸡"。

从这里，我們看到象形的字發展成形声字，这是繁化，但其声符又被簡化成"又"，于是变成不标音的符号。沒有前者产生，就沒有后者的結果。象形→标音→不标音，这是"鸡"字發展过程，也是繁化和簡化相互作用的例証。所以我們認为，繁化是簡化的开始，繁化为簡化准备条件，这是合乎辯証关系的。

我們說簡化繁化是兩股力量，但幷不是說，它們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不相上下的。某一具体历史时期內，有一个現象成为主要，另一个則是次要的。例如在春秋时代的鐘鼎器銘文里，我們就發現許多圖形文字（一称圖画文字，沈兼士先生認为是文字画），与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同样古老，笔划同样繁瑣，有人称之为文字的复古現象，实际上这是文字演变的繁化。

汉魏以降，隶楷大兴，汉字不但字体变了，而且式也發生很大的变化，許多字簡化了，形声字和表意象形字有的已混淆不清了，所以王了一先生說"隶書創造，是中国文字史上的一大改革"，"隶書無論就字来說，或就字体来說，都和小篆大不相同"（見《汉語稿》上册，40頁）。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簡化字增加快。1956年党和政府采取"約定俗成、稳步前进"的則，公布了汉字簡化方案，提倡使用簡化字。現在汉字，簡化無疑地是处于主流的地位。

其次，我們再来討論一下周先生所說的"就汉字單个符号（独体的字）来看，幷不存在繁化的趋向"这問題。我們認为这种說法在事实上是很少根据的。我們只举出几个突出的例証就可說明。例如在甲骨文中凡頂上一横的，后来的金文、篆、隶大都添加一这就是繁化：



还有一个重要現象，也促使單体字中的象形字(另一种为指事字)笔划增多，这就是方塊字的內部平衡規律。有許多字在甲骨文中并不是方塊的，但是兩周以后，为了平衡笔划，就增加笔划，成为整齐的方塊字了，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下显得很空，为了对称，就变成[illegible]。[illegible](乔木之櫟本字，)兩[illegible]之間显得空，加[illegible]成[illegible](金文)。

周先生又認为形声化"是文字制度的發展，簡化是符号構形的發展"，"兩者不屬于同一范疇，因此就不能相提并論，不能認为在簡化运动以外，还有对等意义的繁化运动"。总之，周先生在这里拐弯抹角地想否定形声化是文字繁化的一个現象。我們認为这种說法，有商榷的必要。周先生在这里所說的文字制度是什么呢？这就是指文字究竟用什么方法去表現語言，是表形表意还是表音。我們認为，所謂形声化的字与純粹表音表形表意的字，从文字的發展史上看是屬于同一范疇；但形声字本身就其字式來說，它又屬于構形發展的范疇。我們認为形声字是同屬于文字制度范疇和構形發展的范疇的，看人們从哪方面去了解它，研究它。若是从文字产生(造字)的角度來看，屬于前者；从笔划的增減方面看，又屬于后者。这原本是一个問題的兩方面。

同一事物原屬于兩个范疇，这是常有的，例如人从其身体構造上看，屬于生物的范疇，是脊椎动物中最高的發展；但就其所处的地位、关系來說，人又屬于社会范疇。

据此，我們認为，不能簡單地从范疇不同出發，把形声化和簡化分开，实际上是分不开的。

周先生說："汉字不論独体或合体，都要挤在一个方格子里書写，習慣把單体和合体等量齐观，当作一个單位(字)，所以覺得簡化和繁化同时存在。"我們認为周先生这样的說法是近乎主观臆断的。

其实，合体形声字的出現并非如周先生所說的那样簡單。有一种字增加形符后意义不变，如"典"可写成"䓦"，等等。更多的一种，是为适应語言的日益發展日益精密的需要，为区别那些同音而异义的詞(或字)，这一点在汉字中更为突出。

最后，我們認为，繁化和簡化的关系，有汉字以來就是互相作用着的。繁化簡化是汉字發展史上的兩个重要問題，我們要辯証地去了解，不可忽視其中任何一方面。

(上接59頁)

但是必須切实地作好推行工作，它才能眞正地在人民文化生活中成为大事。而且，我們必須总結人民在实踐中对它的考驗，才能制定尽美尽善的定案。脫离了广大人民对它的使用和实驗，它就將永远是个草案或是修訂为一个不一定能为大家所滿意的定案。第二、为了讓大家使用它，就要及时地、明确地替大家解决具体問題。例如說用它为汉字注音，同时就有标調的問題。原草案中規定"需要标明声調的时候"就用声調符号，然后規定了五种不同的符号。但是，什么时候是"需要标明声調的时候"？这不得不令人惶惑。新草案对于声調符号只規定了上述取消輕声和改正陽平符号的兩点，但对于是否必需标調号、何时必需标調号的根本問題却略而不談。又如原草案里說明知、痴、詩、日、資、雌、思是輕声时，韵母省去，而新草案中不作交代；这就使人要用新草案給汉語詞句注音的时候感到困难。我們要求文字改革委員会早日把这些細节决定幷公布出來，以便在实际工作中有所遵循。与此有关的是詞的范圍和連写問題，虽然这个問題更复杂、更棘手，但必須承認这是个必須解决的問題。如果現在还沒有条件公布一个最后的規范，至少也要在最近期間訂出个試行的規范，并在推行試用中逐步地修改提高。我們知道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以方案拼音，而不是以之代替汉字；但是旣然知道了万里長征摆在前面，何不主动地早早迈出第一步呢？！同时，用注音拼写成段的文章，不但在对外国人或少数民族学汉語上有用，对推广普通話也一样有用的。

我們正在紧張地工作着，积極地准备在1958年內至少出版四种文字的用新草案注音的汉語教科書。一方面可以把新草案通过教科書介紹給国际上的朋友和国內的少数民族弟兄(如朝鮮族和維吾尔族)，一方面也是利用这套有利的新方案把汉語介紹給国际朋友和民族弟兄。我們相信这套字母是可以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上起到它的作用的。我們願意以編印教材作为拥护新草案的具体行动，并且預祝新草案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得到順利的推行及进一步的發展！

加强介紹苏联語言科学的工作

——"俄語教学与研究"扩大征求訂戶——

"俄語教学与研究"是哈尔濱外国語学院的学术性刊物。从1957年起，它准备每期用二、三万字的篇幅，通过翻譯、綜合报导等方式介紹苏联普通語言学方面的成就，57年介紹的重点有以下四方面：

（1）語法范疇、語法意义、語法形式等問題；

（2）詞义与概念的关系；

（3）音位学中的各种学派；

（4）詞匯意义的类型，成語的分类等。

此外，从1957年起还准备連載拉赫曼諾夫教授的名著"作为外語的新西欧語言教学法簡史"。

介紹这些問題的目的是供我国广大語言研究工作者参考，所以希望我国各种語言的研究工作者广为利用。

附"俄語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6期要目預告

論詞的形式……苏联　維諾格拉多夫院士

論复合句……苏联專家　烏汉諾夫

現代俄語中用 кто тот что ито где там 等詞連詞的二項式主从复合句（对傳統副句学說的一点批判）……王玉录

汉俄語数詞某些問題的对比……朱光荻

苏联杰出的語言学家謝尔巴……王武錚初譯

非語言学校俄語詞匯工作的系統性……支星芒

"人"的一些意义及俄譯方法……曾聰明

"俄語教学与研究"出刊日期：　双月廿日

訂　　价：　每期三角

訂閱零售处：　全国各地郵局

每册定价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1月22日出版

中國語文

月刊

1958年2月号

总第68期

1958年2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員会　北京海甸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郵电部北京郵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郵电局、所

代訂代銷处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預定：三个月0.72元，半年1.44元，全年2.88元；寄費1.平郵寄費不計，2.挂号郵費由訂戶負担。　1—20,182册

代号2—44